

看這類人，這却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高叫着：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嚴著，一二四頁）

文明的進步的帝國主義，怎會同野蠻的落後的封建勢力聯合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最反動的理論”！

當然揭破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奴役民衆的真相，在帝國主義者，以及帝國主義的辯護士看來，當然不能不是“最反動的理論”！

剝削中國農民羣衆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外，最出衆的，當然是中國的軍閥。至於帝國主義怎樣利用軍閥擴張它的勢力範圍，軍閥怎樣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而存在，以至軍閥如何徵收苛捐雜稅，如何封馬封牛，如何舉行軍閥混戰，如何屠殺民衆與破壞中國經濟：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多在篇幅去描寫這許多事實，我想完全沒有必要吧。

但是嚴君在他的大著裏却說：

“中國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制度，不但帝國主義盡量想到利用去統治中國擴充自己經濟的勢力即

資本主義的勢力，而中國資產階級不管是獨立的，買辦的，半買辦的，也想利用來擴張自己的利益，然而，結果，不管帝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同書，一二六頁，夢雲加圈）

對於這種違反任何事實的空洞的“理論”，我們當然是很佩服的。然而這是什麼樣的“理論”呢？

實際上，中國現存的軍閥制度，是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把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後，依靠帝國主義，依靠封建剝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在每一軍閥統治的區域內，除了對於帝國主義絕對尊重外人生命財產，對於各種各樣體面商人資本家地主等須互相客氣之外，對於廣大的民衆，可以任意徵收苛捐雜稅，可以任意強迫他們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殺與奪之權。這同封建時代封建諸侯對於他們統治下的庶民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諸侯在他統治區域內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國的軍閥則同時，是某一帝國主義的工具。

但軍閥對於中國民衆的這種剝削，這種特權，在嚴君等



看來，無非爲得要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看吧，在軍閥統治之下，中國民衆不是變成更其窮困，更其沒有出路，中國的經濟（不論是工業或農業）不是更其破產，災荒的區域不是更其擴大，軍隊土匪的數量不是更其增加嗎？但一切這些，說道都是爲得要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有些人說，中國軍閥利用這種剝削方式取得來的錢財，等於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的原始資本的積累。這實際上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中國軍閥的金錢，除了一部分用於爲了擴張自己的地盤，而餒養大批的軍隊外，大部分都是儲蓄在外國的銀行裏，爲得預備一旦失敗後，能夠到租界上過他們優裕的歲月。同時，他們還購買地皮，購買股票等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們並不願意把他們的貨幣變爲經營生產事業的資本。

當然，也有些軍閥，把他們一小部分的貨幣用在開設工廠，但這種百分比幾乎小到不能訴說的。這種生產的事業，對於軍閥們實不過是一種不關重要的副業。讀者試思，中國民族資本家尙且因爲民族工業發展的困難，而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機事業中去，何況軍閥。

至於中國軍閥同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關係的密

切是不成問題的。軍閥制度的存在就依靠這些封建的剝削者。不但這樣，每一軍閥，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買辦，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東三省的那些軍閥，他們不但給日帝國主義當買辦，而且自己還開設錢莊，發行各種各樣不兌現的奉票與軍用票，收買東三省的各种特產，擁有千萬畝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軍閥，必然的是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的代表。

同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然也同軍閥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造成各個區域的市場，所以每一區域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同這一區域的軍閥有不可分離的政治上的與經濟上的關係。在保護當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受他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競爭，尤其在保護他們不受到工人階級“搗亂”的損失這許多點上，軍閥當然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常常提出一些統一中國，發展實業等空想的口號，提供給軍閥，做軍閥相互鬥爭的旗幟！但是不斷的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的競爭，使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工業，沒有發展的可能，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資產階級表示些“不滿意”。然而有

什麼辦法呢？沒有軍閥，他們也就很難存在。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不是呆子，他們也是善變的分子，他們難道不能利用他們的資本，做些有利的事業嗎？當然能夠的。這是說明，為什麼他們的資本，近來也逐漸投向股票，地產，錢莊，銀行等方向去的緣故。

廣大的中國農民羣衆，就是處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的重重壓迫之下，他們的不安分，他們的起來做反抗的革命鬭爭，實是這種壓迫必然產生的結果吧。然而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我在這裏所要說的。

我現在還要說的，就是在中國鄉村中間雖是封建的剝削統治的地位，然而這並不就是說，那裏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的關係。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相當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侵入中國農村，當然使農民內部起了相當的分化，使農民階級內部產生了貧農中農與富農的階層。但是正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占着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的經濟恐慌，所以這種分化一方面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為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

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另一方面，鄉村中因分化而產生出來的富農，也因為同一原因與其把他們所積累的資本投入土地，自己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還不如拿錢購買土地，把土地出租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對農民實行地主的剝削，或是做投機事業與高利貸更為有利。正因為這原因，在中國農村中產生了任君所認為荒謬絕倫的半地主的富農，這是說明為什麼當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消滅地主與平分他們的土地時，他們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對到富農的緣故。

當嚴靈峯君論到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對於中國農民分化的這種特點沒有絲毫的了解。他從一百十一頁到一百十五頁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華林先生的文章（見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前途，李麥之譯，七十一頁——八七頁），所不同的，就是華林以此來證明，中國農村中已經開始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與農民，而嚴君却以此來證明中國的農村經濟完全是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嚴君在這種地方，的確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別能力！……

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資本家，

富農等重重剝削之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現在無疑的，是處在一個長期的恐慌崩潰的時期。世界經濟恐慌，世界市場上農產品價格的跌落，祇是加速了這一過程。號稱數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國家，現在不但要把工業品從外國輸入，而且主要的農業品，如像米，麥，棉花等等的輸入，也逐年增加。據一九三〇年海關報告冊的統計，去年米的輸入，竟達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關平兩。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然而這是農村經濟崩潰過種中必然發生的現象。

農村經濟崩潰的最明顯的記號，莫如災荒區域的增加。所謂災荒，當然不只是水災與旱災，而且也是兵災與匪災等各種各樣的災害。這些災害，當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禍。祇是因為河道的經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興，舊的灌溉事業與開濶等的崩壞，農林的不事講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為水災或旱災。至於兵災與匪災，那更不用說是人禍了。此外，在重重剝削下的農民，不能不年年縮小他們的生產，以至完全拋棄不能給與他們任何東西的土地，而流為兵災，再進一步的來破壞農村經濟。在全中國現在差不多沒有一省沒有災荒區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災而論，受到重大

損失的已經有十六省之廣。今中國現在已經有一萬萬人口，變成了災民，等待着餓死，病死與凍死。

然而一切這些，在任君等看來，都是促進中國鄉村中生產力的發展的！

但是，在我們看來，要發展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祇有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買辦，商人，高利貸，資本家與富農的統治，祇有消滅中國農村中佔着統治地位的封建的剝削。然而這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 七、革命性質與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我們和任君等對於中國經濟性質不同的估計，當然會得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中國的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說中國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綜觀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對於中國土地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實際上沒有絲毫的了解。他祇是把這許多名詞連接在一起，亂七八糟胡說一陣，把一些人的文章亂抄一下，甚至把俄國馬札亞爾的話抄上去當做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話，說這就是“理論”，真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消滅封建剝削。現在任君既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不主張消滅封建剝削（這些東西，在任君看來，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還有什麼土地革命？老老實實說社會主義革命就完了，還講什麼土地革命？這是一。

一切少數派的“著作家”（客氣些，稱他們為著作家吧——夢雲）都認為假使這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那一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必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任君也就是這一類人。在任君頭腦中死也不會想出，除了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紀的勾當”之外，還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紀的勾當！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動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與農民。他們所要打倒的，是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就等於打倒資本主義。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資本主義反而能得到更快的發展。這一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所以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

無論任君與嚴君等怎樣亂七八糟說得天花亂墜，然而

在他們估計中國革命的動力時，他們從沒有把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廣大的農民羣衆放在眼裏。他們除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階級，雖是他們嘴上說些“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的階級相互關係來決定”（嚴著，一五〇頁）的空話。這原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這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從來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們總是這樣的想：既然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反革命，既然中國的革命也要打倒資產階級，那當然沒有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他們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農民羣衆，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是爲了要肅清一切阻礙他們發展生產的封建殘餘。他們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有勇氣反對地主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向他們的私有財產進攻，以至主張，“土地的社會化”，以至擁護“土地國有”的口號，然而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共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爲了想取得他們自己的私產。

這種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的革命，與他們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的觀念，在任君等當然是

不可思議的。關於這一點，他們的“革命大師”托洛斯基先生最近還做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詆爲這是最反動的主張。最反動的，因爲它主張領導這數千百萬的革命農民，先行取得工農革命的勝利！拋棄對於這廣大農民羣衆的領導，坐在自己家裏，空喊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精髓！

在以社會主義革命爲目的之中國無產階級，絕對不能跳過這一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誰想跳過這一階級，誰就會使中國目前的革命，遭到嚴重的失敗，誰也就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爲祇與有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一起，中國的無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組織廣大的貧農羣衆於自己的周圍，進一步的去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

所以不但從客觀的任務上講，而且也從革命的動力上講，目前中國的革命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這是第二點。

土地國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後的一句話，即是土地革命的最徹底的實行，因爲這是消滅中國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的最徹底的辦法。但是土地國有的時候，必然是工農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在主要的許多省份成立的時候，即

是無產階級能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取得革命勝利的時候。所以這口號的實行在那時更將幫助工人階級進一步的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時，土地國有將是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的開始。

根本沒有聞過李銀主義氣味的任君，在這裏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過的下面一段話：

“現在的時候，革命又使土地問題，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爲一個更大更深更緊張的問題了。……戰爭使參戰國落入向所未聞的痛苦，同時戰爭又非常迅速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無產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即指廣大的農民羣衆——夢雲註）不能限止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土地政綱中的土地國有，必然要有另一個形勢了。就是土地國有已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字，而是趨向社會主義第一步的開始。……組織模範式的經濟”。（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二八二頁）

任君想拿這一段話來證明土地國有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話，這真不免太滑稽了。想來任君從沒有

知道過，從二十世紀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政綱上明明寫着土地國有的主張，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以為那時俄國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銀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圖跳過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主張，實是倒置的少數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取消主義者。當然，關於這些是任君等所不願意講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引用李銀的話，祇是為得要反對李銀主義！這是他們的祖宗托先生的慣技！

拿李銀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的話，來反對李銀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說的話，這除了有意曲解李銀主義，對李銀主義實行污蔑外，沒有其他的意義。明明是反李銀主義的托洛斯基主義，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銀的話做遮掩，真是何等的卑劣！

更進一步說來，土地國有雖是土地革命的最後一句話，雖是沒有超過革命的民主資產階級性的範圍，然而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中所能實現的。在某種客觀條件之下，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之內，實現出來，在另外一種條件之下，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才得實現。所以很明顯的，革命的性質，並不以這一口號的實現與否而決定。這關於土

地國有的口號是如此，就是關於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號，也何嘗不是如此。譬如俄國的二月革命不但沒有實現土地國有，而且也沒有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中國則不然，在中國有些工農民主專政已經成立的區域，地主的土地已經完全沒收，而且已經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爲什麼？因爲革命所處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但這是不是等於說，因爲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在任曙君等的“辯證法”看來，這也許是可能的吧。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革命所以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不但是因爲客觀的任務沒有完成，而且也因爲革命的動力是工農的。中國現在所有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中國革命現在所要建立的，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祇有中國目前革命的取消主義者，才會拿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空話，取消目前工農的革命！

說到這裏，我還很想告訴讀者，任君等對於他們所最歡喜用來做攻擊對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本身，同樣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巒靈峯等，祇是利用李銀在二月革命後所說的，政權已經落到資產階級的手裏，所以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的話，以此來證明中國現在用不到任何工農民主專政，因此他們還公開的反對在目前的中國實行工農民主專政。他們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兩重政權：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權力的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數民衆擁護的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在“論兩個政權”中，李銀說：

“我們革命的奇特之點，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兩個政權。這件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不了解這問題，即不能前進。……”

“兩個政權在什麼地方呢？他在這一點上，就是除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之外，還成立了現在很柔弱的處在萌芽時期，但實際上已是無疑地存在着和發展着的別一個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這個政府的政治性質是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不按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而由民衆直接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這並不是

一種存在於國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裏而統治了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頁)

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李銀也同樣的伸說這一特點：

“我們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徵，最足令人深思熟慮的特徵，即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所形成的兩個政權。

“兩個政權，表現於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上：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爾伏夫輩的臨時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權機關。此外還有補充的，附屬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他手中，沒有國家政權的機關，可是直接依靠於顯然的無疑的大多數人民，依靠於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的階級來源及其意義，就是在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那種上述階級的專政”。(同書，五九——

## 六〇頁)

對於二月革命的這一特點，是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所不願意講的，因為這不免違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萬歲”的公式！一切不合於托洛斯基主義的東西，都應該削去或緘默不言，這樣才能把李銀主義曲解或為托洛斯基主義。

“工農民主專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經實現了”，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願了解的。因此，他們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轉變，不能了解李銀主義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後，在“十月革命教訓”一文內，說到十月革命後，李銀主義的“重新武裝”了。（關於這些問題，將專文論及）

因為二月革命有那種特點，所以李銀那時批評了加米尼夫的錯誤。加米尼夫的錯誤，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樣，在於不了解這一革命的特點。他們中間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認為那時還沒有工農民主專政，所以還要求有一個這樣的政權的實現，而任君等則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工農民主專政，而且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一個專政。

可見任曙君等，反對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而想跳過這一階段的思想，實在不是偶然的。但這一錯誤實，

際上等於去取消革命！

我重複說，中國現在所要建立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工農民主專政，當然同俄國十月革命中所實現的，一定不相同。中國不會有那樣自己握有政權，而又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政府的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很顯然的。中國的工農專政將實現很多在俄國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實現的任務，這也是無疑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不同的必然有的。

但是能夠因為中國的民主專政，能實現許多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任務，同俄國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就說那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爲然不！這是我所要說的第三點。

最後，任君寫道：“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而不是‘促進’資本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前途”！（原書二〇六頁——著者加圈——夢雲）

我想這樣不通的文章，祇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那還有什麼土地革命，還有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還說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與土地革命，實際上對於任君這類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們所看到的，祇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祇是爲得要使人相信他們，他們也是主張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這些名詞來亂用一頓，結果鬧出這樣的笑話！

中國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沒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國有，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給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這土地革命，是反對大資產階級的，但對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這土地革命成功後，並不將在中國開闢一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前途，而是將開闢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因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它在革命中，終不停止於工農民主專政，而將進一步的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那時要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關於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我想這裏沒有多談的必要。然而祇有了解到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人，才會了解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

很明顯的，革命的轉變問題，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雖是他們嘴上吹着什麼“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落到

他們的手裏，就會變成“斷送革命論”！這雖是很可悲的事，然而這是事實！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

## 長 篇 落 花 曲 小 說

彭芳艸作 實價大洋六角

因為生活轉變了方向，作品也得着另一種形態。這本長篇小說是作者的生活尚未轉變之前的最後作品。這裏面所描寫的是破落的書香子弟之愛的事實。充滿了火熾的熱情，崇高的理想，惡魔的誘惑，痛苦的掙扎；總而言之，這實在是一部驚人的作品。讀者在這本書裏面所見到的不是春花秋月的玩賞，不是微溫的感情悽愴，不是紳士們的閒情逸緻，而是青年男女的心坎，靈肉之間的爭鬥寫實，在社會巨石壓榨之下的絕叫。原書十萬言。

上海 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 廣州



神州國光社刊行創作書目

低	滬戰中的日獄	戰時日記	所思	一個婦人的供狀	病院中	素箋	沈從文甲集	雲鷗情書集	歸雁	落花曲	寒夜集	厄運
訴												
	陸品清女士著	李浴日著	王禮錫著	張申府著	周樂山著	程碧冰著	沈從文著	黃廬隱女士著	黃廬隱女士著	彭芳艸著	彭芳艸著	彭芳艸著
	實價三角	實價二角五分	實價九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八角	實價一元二角	實價五角	實價六角	實價六角	實價四角	實價四角五分

# 中國農民

## 問題之史的敘述

熊得山

中國到現今，差不多都是一個憑天吃飯的國家，換一句說，多少還是一個受自然支配的國家。這樣，鬧起旱災來，幾乎是遍地赤土，連樹皮草根，都要吃個精光，鬧起水災來，幾乎是一片汪洋，那就只有檢浪滓，撈魚蝦了。幸而還是棲

在一個天惠的地帶，若不幸而位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並低窪的荷蘭，所稱為四萬萬神明貴族的，眼看着一個個將化為蟲沙，將化為魚鼈，將不能再蛻化為人，以這樣的可憐的景象，居然還有人負起五千年來的道統，十六字的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欲以所謂東方文化來抵抗物質文明，且不僅抵抗之已也，直欲將所謂‘聲光化電’，置之於所謂‘道統’掌握中，讓道統來支配，大概這般人的來頭，非將四萬萬人化為蟲沙，化為魚鼈不止，尙有何說？

這次的水災，當是一個大災害，受害的有的報五千萬人，有的報七千萬人，其實中國的災民，何止此數！水災之前有兵災，無兵災的區處又有剝削災，並其他種種，真是那裏說得盡！據我最低廉的估計，中國的災民之由於水災的，或者只打七千萬，其他災民，儘可說有七千萬之四倍乃至五倍，實在這並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中國從洋大人闖關以來，中國人除為豪紳地主的隸屬民之外，就在開始一步一步地國際災民化，越至近年，災民化之速度，直與物體落下的速度為一正比例，加之大人先生們口談東方文化，五官百骸的享樂，頃刻都離不了西方文化，於是越加助紂為虐，越加

地皮剝到五丈以下，大家試平心靜氣地估算一估算，憑天吃飯的中國，除開天之驕子外，鮮有不成災民的。

誠然，爲了這次水災，全國都在奔走呼號，救災！救災！這種呼聲，大概已從國內傳到國外去了，聽說日本的天皇，已解囊捐了十萬，日本臣民，也正在募捐助賑，黃金王的美國，亦似乎有同樣的舉動，中國內地自不用說，其捐助的成績，當有若干萬，當局對於水災之熱心，當然是要超過其他一切，故有的則斟酌實在的底子，而發賑災公債一千萬，有的則斟酌災情，而要發八千萬公債，大概現在已決定八千萬了，合之公家，私家，國內，國外的捐款，打滿了說，或者可到一萬萬罷。惟這一萬萬元。即令只用之於水災災民，每人也才一元幾角錢耳，又那裏濟事？或者有深謀遠慮的先生們，覺得與其拿一萬萬元來買饅頭或餠餅替災民充飢，還不如同時兼籌並顧個治本的方法，即疏江，開支河，修閘，築堤等等，的確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而以工代賑，且是一個標本兼治的方法，但是說到這裏，除去直接賑濟了以外，區區幾千萬元的工程，即令主其事者清白乃身，除拿夫馬和薪水之外，並不將賑款套入腰包，而又能容納幾許災民勞動者？其無工可做的災民，又將若何？此外不屬於水災，而由其他災

害來的災民又將若何？這却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中國的水災，何以這樣厲害？要解答這個問題，與所謂天者是毫不相干的，屬於公一方面的，自必是官吏怠荒水利，侵蝕隄款，未植森林，未興河工，甚至將隄款移作兵費，化作槍械，本來就未曾使‘水由地中行’，怎得不‘懷山襄陵’？再就私的一方面說來，農民早已一層層地被剝削到死綫下，他的直接生物的食慾且無由療治，當然說不上鑿池浚溝，因是種種，水災之在中國，遂成了別國的地震火山，簡直一籌莫展了。嗚乎！半殖民地的中國！

我現在並不想單就這一水災問題來探討，左右中國的問題，現在已屬極頂的問題，我且就中國農民問題，來算一算舊賬罷。

## 一

中國既然到現今都要受自然的支配，那末，在以前更無庸提了，左右中國並不是一個文化中落的國家。那末，中國何以老是落在這步田地？我且引一段話寫在下面：

‘由於以地租結合於生產物及生產自身之特定種類中之所謂物納地租的形態；由於為此種地租不可缺

條件農業與家內工業之結合；由於農民家族之簡直完全自給；由於農民家族離開市場而獨立的那種事實，即由於農民家族離開所行於自己外部社會部分之生產上並歷史上運動而獨立之事實；簡單地說來，即由於現物經濟一般的特徵，此種地租形態，為完全適於如亞洲所見的靜止的社會狀態之基礎的一個形態。

……這種地租，且可達到這一範圍，即於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為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資本論第三卷下第四十七章）。

這一段話，顯然是歐洲中世紀物納地租的一個寫真，却也正適合於亞洲的中國。然則中國農民因貴族地主的剝削，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成為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時，將若何？換一句說，因此而遇到人為的饑荒，並促成自然的饑荒了，將若何？說到這裏，這正是中國史上王朝興亡的契機，即無量數的農民，遇着這個年頭了，不是



立即餓死，就得頻起暴動，於是舊的統治遂以坍台，新的統治於以出現。然而再起的王朝如何？至多對於農民，亦只是輕減了王朝末年的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却是絲毫沒有增進農民的生產方法，因之農民的暴動，也是與王朝末年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那由貴族人口的增加，與貴族分封必有的現象）為正比例的。

這樣一來，中國王朝縱有興亡，而社會之停滯不前仍如故，再就中國地租說來，從周末到明末，差不多都是物納地租，就是終有清一代，地租占現物的仍不少數，因此，知中國一方恰是靜止的社會狀態，一方農民們暴動的時候，就是他們‘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時候，以下試徵引若干史事，以實此說。

### 三

在說明中國地租長期的為物納地租之先，還有一事足以相互證明的，就是中國官吏的薪俸，也是長期的實物報酬，領有金質貨幣的，很占少數。茲據史上所見的，如秦爵二十等，徹侯食縣，其次食邑，漢代以來，大侯食萬戶，小者約五六百戶，這當然就是領主與隸農的寫照，這裏暫且不提，

試述及其他的官吏薪俸。漢代大將軍及三公之俸，月三百五十斛，其他九卿，州牧，三輔尹等皆二千石。四百石至二百石爲長吏，百石以下，則爲佐史斗食等小吏。唐代的俸制，自正一品主從九品，凡十八級，其俸由七百石以至於五十二石。宋代的貨幣經濟，雖然已見盛行，迄未占唯一重要的地位，據端拱三年詔：「……其諸州府募職州縣官料錢，舊三分之二，給以他物，自今半給緡錢，半給他物」，又景德四年：「詔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給薪……每錢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由此看來，宋代官吏的薪俸，乃係實物與貨幣各半。明代官吏的薪俸，也是貨幣雜以實物，正從一二三四品官，爲千石至三百石，鈔皆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五品百七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六品百一十石，鈔皆百九十貫。有清一代，雖然在外的官員，沒有支給食物，然而京官則爲正從一品俸米九十石，俸銀百八十兩，正從二品俸米七七·五石，俸銀一五五兩，正從三品俸米六五石，俸銀一三〇兩，正從四品俸米五二·五石，俸銀一〇五兩，正從五品俸米四〇石，俸銀八〇兩，正從六品俸米三〇石，俸銀六〇兩，正從七品俸米二二·五石，俸銀四五兩，正從八品俸米二〇石，俸銀四〇兩，正九品俸

米一六·五五七石，俸銀三三·一一兩，從九品俸米五·七五石，俸銀三一·五兩，由此，就可以看到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

本來，貨幣不過是交換的工具，一個國度內若僅僅是社會的分業，而沒有技術的分業，那交換就不會頻繁，因之貨幣的用途，必比較實物的用途少，這或者就是憑天吃飯的特徵罷。

對於官吏的薪俸，既是多給食物，因之關於農民的貢賦，不用說，自然也是實物。

#### 四

中國在農村公社(井田制)還存在的時候，完全為勞動地租(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師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自公社制完全崩潰之後，就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與隸農的關係，如秦代，則須納收穫物十分之五於地主，漢代除口稅田稅以外，亦須納收穫物十五分之一於地主(光武曾減到三十稅一)。兩晉則為丁男(課田五十畝)納粟一斛五斗，絹三匹，棉三斤，丁女(課田二

十畝)與次丁之男(課田二十五畝)減半。唐代受田百畝的,除力役外,則納粟二斛,又從其鄉土之所產,納絹綾各二丈,麻布二丈四尺。米則仿唐末的兩稅之法(夏稅從五月起,秋稅從九月或十月起),農民所納之物,分爲穀(石爲單位),帛(匹爲單位),金鐵(兩爲單位),物產(糞秸薪蒸,以圍爲單位)。至明代亦沿用兩稅之法,分爲夏稅秋糧,其徵收之額,除力役外,官田則每畝五升五合三勺,民田減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場地三合一勺,大概這些賦稅,至有明中葉以來(明英宗正統三年),已折徵金花銀,此後遂以爲常。不過所謂漕米的,都是徵收的實物,故有所謂漕運。考漕運,是由東南各省輸粟以供西北,實始於秦始皇,他爲要供給征伐匈奴的糧餉,遂使天下‘飛芻輓粟’,此制歷代都有,如清代還有漕運總督,管轄着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是。並且清代有的賦稅雖然改徵了銀兩,而各省的貢物仍不在少數,茲據蕭一山清代通史四百九十四——九十五頁,錄在下面:

【直隸】 榛粟 黃檣木 芝麻 長蘆白鹽 磚鹽 五色土 寶砂

【江蘇】 銀硃 桐油 紅銅 明礬 黃熟銅 棉布

烏梅 燈草 白蠟 高錫 紗緞 綢綾 槐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正金磚 副金磚 魁藤 棕絲

【浙江】黃茶 芽茶 黃蠟 黃熟銅 桐油 白棉

白絲 架木 桐皮槁 黃花竹 織造紗綾綢緞

【江西】銀硃 桐油 五倍子 紫草 抬連紙 苧布

槐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福建】紅銅 黑鉛 黃熟銅 抬連紙 錫

【湖北】黃蠟 白蠟 黑鉛

【湖南】黃蠟 白蠟 黑鉛 槐木 杉木 架木 桐

皮槁

【山東】闊白棉布 牛筋 黃蠟 黃丹

【山西】毛頭紙 高錫 生素絹 農桑絹 呈文紙

大潞綢 小潞綢

【河南】本色棉布 牛筋 黃蠟

【四川】本色米 本色馬（金川）藏香 黎椒 菖蒲

茯苓

【廣東】降香 紫榆 花梨木 高錫 靛花 白蠟

廣椒 臙黃 沉速香 點錫

【雲南】天大青 石磺 松花 石礫

【貴州】 黃蠟

【外藩】 牛 羊 駝馬 毯 罽 藏香 延壽果 青  
木香 穉蠶

據上所述，這種物納地租的形態，在中國史上差不多是從周末到清代以來的地租形態，即此一端，即可了然於中國經濟狀態之謂何，同時在政治上，亦可知道中國的支配者，常是大地主的新陳代謝，他們相互間的代謝，僅是由於一種上空地帶的暴風，於社會經濟的根本要因的構造上，絕不發生何等影響，只是在同一形態上再生產出來，於是就構成了中國靜態的社會。迨他們敲骨吸髓，達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爲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於是在農民暴動中又颳起所謂政治的上空地帶的暴風來，這就是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

## 五

却說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雖然每次都是落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手中，而搖旗吶喊的，不用說盡都是農民。他



們有時也有如近代的‘怠工’辦法，爲消極的抵制，有時是抱着‘俟我后，後來其蘇’的態度，有時也有積極的自謀的態度，雖然歷史上不會有過農民支配者的國家，然而那是他們被局限於歷史條件的原故，正如羅馬帝國的奴隸謀叛，不能成立奴隸共和國，歐洲中世紀的農民騷動，不能成立土地共有的農民國一樣，實際他們每次都是改元易姓的重要契機，茲試從史實上述及支配者對於農民的榨取和高壓，和農民的運動狀況。

(一)周末至戰國時代 農民在這一時期中，力役與物納地租兩者，都是他們致命的打擊，力役則爲不生產的消費，或築城鑿池，或運糧從軍，得慶生還的已屬意外之幸，至奉納現物也被榨取到死綫上，茲試徵引數節於下：

關於力役方面 詩經齊風東方未明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晡，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風則莫’

又魏風陟岵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關於苛征方面 詩經魏風碩鼠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又伐檀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鵝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此外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尚有更沉痛，更率直的，試如禮記檀號下：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諱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孟子答梁惠王：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答齊宣王：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據以上所述，描寫農民的痛苦，已算盡致，然則農民當時反抗的情形如何？以史料缺乏的結果，關於周末至戰國的情形，約略只能舉出二三，亦不過消極的反抗罷了。

(一)春秋魯僖公二十九年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春秋魯文公三年左傳：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三)春秋魯僖公四年公羊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在這當中，我們雖然沒有很明白的看出農民反抗的情形，然於這個潰字上就可窺見一般。考潰字據左氏的解釋，‘凡民逃其上曰潰’，據公羊氏的解釋，‘潰者何？下叛上也’，那末，所謂民變的情形，即可於此潰字中看出，雖然沒有什麼積極的行動。要之此刻的支配者還要他們來作箭垛，供扞衛，已屬不可能了。

(四)孟子上：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這一節把農民反抗的情形，就說得很清楚了。當然，至戰國以來，土地的兼併，以及攻取的戰爭，殆無日或息，因之農民死於鋒鏑或暴斂的，怕是史上很大的記錄，所以他們一遇着機會，總是要使其舊主人毀滅的。

再如痛惡現在，希望將來的，也是農民常有的態度，故當封建主的新陳代謝時，農民們對於新主人總是‘箝食壺漿，以迎王師’，以為將是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而在這個當間，想登大寶的新主人，雖然對農民所說的，都是不兌現的支票，可是疲不堪命的農民們，一見他怎樣暴露舊主人的罪惡，怎樣宣布他將來對於農民的新猷，至少在精神上也是一個安慰，所以尚書的湯誓和泰誓，滿紙都是這些話頭。然而當他們互相角逐，尚未取得一國統治權時，亦還有許多實際策略。試看：

春秋魯昭公三年，晏平仲答叔向：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筭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

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齊景公繁於刑，多刑足者，所以說屨賤）踊貴（刑足者之屨），民人痛疾，而或煨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由這段話看來，在齊景公一方面，所聚集的東西儘管朽蠹，而凍餒者仍如故，還動輒殺人刑足，在齊陳氏一方面，則以大斗貸出，小斗收進，且還對於有疾痛的大加撫慰，對比起來，人民自必歸之如流水，然而終歸是一個陰謀，一個策略，換一句說，只是他們掣取寶座的一個工具，試看陳氏支配齊國以來，不又是‘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麼？

## 六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他打算在中國政治上開一個創局，即欲由封建變為郡縣。但是這件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牠自有牠的條件。所謂中央集權的，只是經濟集中的一個表現，以該時代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事實上殆無集中的可能。經濟上既不能集中，表現於政治上的，適成為割據的形勢，



所以秦代雖然很當心的把天下的豪傑遷徙於函陽，雖然是銷毀了天下的兵器，然而亡秦的終是豪傑，縱無寸鐵，亦可揭竿斬木，由此即可參透當時的封建性，而所謂豪傑的，亦不過當時大地主，閥閱之流罷了。

豪傑亡秦的時候，搖旗吶喊的，自然是農民，這裏暫且不提，我所欲說的，乃在西漢所謂荆州的‘綠林’，和琅琊的‘赤眉’之純粹農民的暴動。藉觀其暴動之所以發生與其失敗之由來。

當說明農民暴動之先，試先述其起兵的背景。

漢代勦滅羣雄之後，雖然發布了廢秦苛法的皇皇大詔，然而論死刑的時候，竟有流血十里的慘狀（漢武帝時），至於出塞的死屍枕藉，豪猾由‘買爵’，‘贖禁錮’，‘免賊罪’的條例等等，更加武斷鄉曲，加之因園圃而圍地，豪右肆其侵占，在在都是使農民無所措手足的，茲試將皇帝的圍地與豪右的侵占情形，略述於下。

（一）漢武帝欲圍地而築上林苑，東方朔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園用，下乏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

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戶，其不可二也。’

但漢武帝終於起了上林苑。

(二)豪右的侵占 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贖不足，塞兼併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至哀帝時，師丹亦云：

‘今屢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

丞相孔光，大司空武亦奏：

‘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由此看來，漢代土地兼併的情形，已到了這樣的地步，故當王莽攝政的時候，所下的詔令就是：

‘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

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輕減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今更命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於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魍魎。’

到居攝二年的時候，且又‘廢漢諸侯王爲民’，王莽的這種措置，不能不說是徹底的社會革命，尤其想到當時‘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的，實足令人酸鼻，這當然是疲於大地主的搜括之下而奴隸化了的農民，王莽果真能解放這些奴隸，果真能使土地共有化，果真能使階級，閥閱，一筆勾消，而一切人民皆勞動平等化，當然是解決這時期的社會糾紛的唯一的方法，可惜王莽畏首畏尾，一方見好於農民的時候，就想作一番劃時期的事業，又見地主閥閱之終不可忤的時候，終於‘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買賣’，以此知買空賣空的投機家，終於要被兩方打倒，試看更始二年史上所書的‘衆兵上台，斬莽首，分莽身，卽解櫛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就可知道。這當然多少也屬於東漢史官的惡宣傳，要之此亦王莽畏首畏尾的

當然的結果。

王莽的措置，既完全成了一個手段，其不能解決農民的倒懸可知。所以農民直接起兵的，幾有雨後春筍之概，試看天鳳四年（新莽年號），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等起兵，進攻隨縣，即史上所稱為綠林兵者是。又同年琅瑯樊崇等起兵於莒，一歲間即集合到萬餘人，因恐與莽兵混淆，乃皆赤其眉，即史上所稱為赤眉賊者是。

這是兩大股農民兵，而且都有相當的勢力，若是團結一致，自厚其力，亦可與貴族兵相頡頏，可惜他們計不出此，竟爾各樹一幟，互爭長雄，這顯然就是農民小產者間不能超越地方利害的象徵，本來獨立小產者的代表，也沒有緊密的永久的紐帶，相互團結的可能，他們之不能結為一致，正同獨立小生產者本身一樣，他們失敗的朕兆，即潛伏於此，茲且一述他們兩股起兵後的步驟。

他們兩股起兵以來，都似乎覺得自己來自田間，鄙陋不文，不足以資號召，於是在綠林兵方面，則抬出一個春陵戴侯的曾孫叫劉玄的為人望，藉以冠冕一切，在赤眉方面，則又抬出什麼宗室叫劉盆子的為上將軍，以資表率，這固然是幼稚的經濟所反映的幼稚思想，然而只此一點，也就是農民

失敗的一個大關鍵。蓋一方既有了閥閱，他方面當然就是隸屬，不知當時的閥閱，就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外衣，隸屬自然就是農民失掉土地的一個標識，既然以純農民而起兵，抑知農民所亟於要求的究在何處？所亟須剪除的究在何處？他們一開步走就錯了路向，循至兩股火併（綠林兵爲赤眉所勦滅），終爲新興的封建勢力（漢光武）所乘，可惜孰甚！

先是綠林兵與赤眉起兵的時候，所謂漢宗室的劉縯及其弟秀（即後來的光武）亦起兵春陵，其目的乃在興復帝室，故史上大書而特書‘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劉秀且是‘隆準日角’，他們之興復帝室，當然要利用農民，尤其要利用農民的直接的隊伍，而况他兄弟二人，在春陵才有子弟兵八千，其聲勢遠遜於綠林兵，故他們開始，就極力與綠林兵相結納。已而劉秀的兄弟等亦有了相當的地盤和實力，因之關於領袖的問題，綠林兵與宗室兵（劉秀等）就起了絕大的爭執，即地主派欲擁立劉秀爲領袖，而農民派則嫌他閥閱性太重，則欲擁立劉玄爲領袖（史載玄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或許劉玄已有幾分農民化了），終於綠林兵占了勝利，遂皆擁戴劉玄，改元‘更始’。但是地主派與農民派，終歸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綠林諸將，連番敦促更始，要趁早剪除劉秀兄

弟，以一掃農民軍的障礙，在更始還猶豫未發的時候，却是劉秀的部將劉稷等正在打算誅戮更始，更始才將劉縯劉稷殺掉，而劉秀以領兵在外，得免於難。

劉秀在史上，都稱他爲長厚者，其實‘他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這幾句話明明就是一個‘豪紳’的活寫，又何曾是長厚者？試看他已得看了乃兄和其部將的噩耗，還裝着心氣和平似的，向更始謝罪，且飲食言笑亦始終平常，這或許就是所謂英雄們成功的祕訣！？然而這一來，却已哄逼了一般樸魯無私，肝膽相照的農民軍。農民軍因此更拜劉秀爲破虜大將軍，且封以武信侯，以爲劉秀或者不至於叛變他們的。但是，

劉秀的聲勢既大，而一般貴族地主們就包圍更急，要他趁早勦滅農民軍，藉以帝制自爲，我們試看史上所載的：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因留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



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

又馮異對劉秀說：

‘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署，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果然，劉秀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農民軍又似乎有了覺悟，試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這當然是一個明升暗降的辦法，然已遲了。劉秀則藉口河北未平，不能罷兵，已而則逕自做起皇帝來，而農民軍則一日衰弱一日，寢已瀕於解體的趨勢，加之與同一戰線的赤眉，又積不相能，遂於建武元年（光武年號）爲赤眉所勦平。而赤眉既失了有力的同盟軍，又豈能殘喘苟存，果然於建武三年，亦被漢室討平，由是，貴族地主的勢力，又重登政治舞台，而農民軍就此閉幕，而農民又佩上了舊來的鎖鍊。

## 七

黃巾賊的背景 東漢初期，也曾詔州郡檢覈過土地（光武十五年），然而這祇是一紙公文，土地是無從檢覈的。譬之當時河南南陽的土地，多係大臣所占，河南南鄉的土地，多爲

國戚所占，其他富豪助舊，在各處所占的土地，當亦不減於此，又從何處檢覈起？而且終東漢之世，弄權的不是外戚，就是閹官，例如外戚，試舉梁氏一門來看，則前後有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二人，其餘卿將尹校等亦達五十七人，真是炙手可熱！又如閹官，誠如時人說：‘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餓吏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這是何等黑暗！要之當時政治如此，其影響於民間的，自可推想而知。

支配者在此時猶不知毀禍，而當‘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兵戎未輯，四方離散’（陳蕃語）的時候，猶然校獵廣成，流連上林，倉庫既空，則賣官鬻爵，以償愆慝，例如當時公爵的價格為千萬，卿為五百萬，二千石為二千萬，四百石為四百萬（二千石的價格多於公卿的，想係能夠直接剝削農民之故），並且其價格，是隨縣缺的好歹而決定的。這些貪官污吏們在上任之前，既有這大的支出，而在上任之後，自必直接的，或間接的通過土豪劣紳，加倍的取償於農民，我們且試看當時農村中貧富的懸隔，並官吏的剝削。

‘王侯貴戚豪富，舉駟奢以作淫巧，高負千萬。不肯償債，小民守門號呼，曾無忱惕，慚怍，哀矜之意’（見王充

論衡斷訟篇)。

‘使餓狼守庖廚，虎飢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萬，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郡城，奇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見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勢弱力少之子，被穿惟敗，寄死不斂，冤困不能自理（同上昌言損益篇）。

於是在這個氛圍氣中，就出現了農民叛變的所謂黃巾賊。查黃巾的來源，乃因鉅鹿人張角創立一種所謂‘太平道’宗教，分遣弟子傳布於四方，於是十餘年間聚衆至數十萬，凡入教的，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太平道的宗教之出現於此時，恰恰適合一般離開了土地的，與依附土地且不能謀生的農民，這猶之基督教在羅馬帝國之下，適爲奴隸，自由民，窮人，無權利的人以及被羅馬壓制或離散的人民的宗教一樣。不過基督教是在把這般被壓迫的人，解

放在世外，在死後，在天上，而太平道是要把當世被貴族地主壓迫之下的農民，解放在現實，在目前，在地上的，雖然他們的方法疎漏，組織鬆懈，態度猶豫，行動遲緩，却因此而失敗，要之較之基督教終歸積極些，扼要些。

却說張角成立了‘太平道’之後，那些不太平的，被貴族地主壓迫得聲息殆絕的農民們，自然相率而入於太平道，所以史上書着‘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其聲勢不可謂不大。這些帶黃巾的，差不多滿了青徐幽冀，荆揚荊豫八大州，而支持的時間，從靈帝中平元年起，至獻帝四年平息止，約略也是十餘年之久。他們也曾打過幾次勝仗，如中平元年，戰勝朱雋，獻帝三年，又誅袁州刺史劉岱，然而終於失敗的，一因他們自身的環境所釀成訓練，組織，意識等等皆足為失敗的原因，同時，如逐鹿中原的大地主之流亞——曹操，董卓，孫堅，劉備，劉表，袁紹，袁術等不僅器械精良，且組織比較嚴密，自然勝不過他們，而所謂黃巾賊的，遂僅於歷史上留名。

以上係對於漢以前的農民問題的敘述，以下將來再按次考察之。

# 少年時代叢書

神州國光社刊行

奇蹟	蹟上	紫珊編譯	二角五分	科學的故事上	法布爾著 宋易譯	實價四角
發	明上	向今編譯	實價二角	科學的故事下	法布爾著 宋易譯	實價四角
法國童話集	第一冊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藍鬍子	成紹宗譯	三角五分
法國童話集	第二冊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希臘神話	葉女士著 謝六逸校	近刊
法國童話集	第三冊	成紹宗譯	實價二角	科學新話	史廬譯	近刊
世界探險記	上	冰厂編譯	實價二角	希臘羅馬的故事	寄宇編譯	近刊
航	空上	寄宇編譯	二角五分	中山故事	周樂山譯	近刊
少年藝術史	上	木村莊八 洛三譯	實價二角	新年	(世界童話第一集) 冰厂譯	近刊
少年藝術史	中	木村莊八 洛三譯	實價一角	自然	袁子英譯	近刊
少年藝術史	下	木村莊八 洛三譯	實價二角	古今趣談	瘦梅編譯	近刊
蜜蜂瑪雅的冒險		波守斯著 段可情譯	實價四角	世界名人故事	心南編	近刊

# 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

朱伯康

## 一 一個研究的方法問題

無疑的，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極不平均的，極矛盾的，而且是極畸形的！所以，現代中國經濟的性質極其複雜極其含糊。這些複雜而且含糊的現象充滿了中國經濟的全領域，譬如，我們自上海動身向內地任何地方旅行一次，我們立刻就發現有許許多多極不一致的經濟條件與事實存在着；即退一步講，就在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最強盛的上海，在



這五卅烈士曾經流過血的南京路上，在這電車汽車摩托車許多交通利器的紛馳疾駛當中，我們又居然發現了最原始的最相笨的獨輪車尚在推動着。呵呵，這是表示着什麼現象呢？這是在現代經濟領域內表示着什麼意義呢？這不得不使我們說一句慚愧的話，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經濟現象！

我們要是忽略了上述的現象，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的解剖，便摸不着頭腦。

假使只看見上海市場的資本主義化，只看見這紛馳疾駛的電車汽車，而不看見笨重的獨輪車；只看見商品交換之統治農村，而不深究這資本主義化的原動力；只看見中國商人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活躍，而忘却了農村經濟的崩潰，而不深究是其所以然的原因，而不分析這個資本主義化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上的作用；便慢然地下了這樣的斷語說：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當前的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我想，凡是稍稍知道中國社會實際情形的人們，即使他們沒有充分的懂得經濟學，也必然地知道這種斷語是一種偏見而又無常識的蠢語。

反之，苟有人只看見自然經濟的存在，只知道亞細亞的

生產方式的存在，就以爲中國的社會還完全是封建制度的社會，一點也沒有資本主義的色彩，這也是錯誤的，這也是無形中陷入偶像的謬誤中所發出來的一種機械的論斷。

上面兩種的見解，都完全是些不正確的理論，都好像是只見到個個的樹木，而不曾看到全體森林的見解。

我們研究社會的任何現象，不能只看到一面，或是一部，或是一個表象。我們要以純科學的方法，去觀察，去分析，去研究；我想，只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接近真理，或是把握着真理。同樣，在現代中國經濟的研究上也不能放棄了這個觀點。要知道，部分經濟與部分經濟之間，個別經濟與個別經濟之間，有一定的不同的程度，有一定的交互作用，有一定的密切的連繫；即所謂個別的經濟，或統一的經濟，也是由於各個經濟部分經濟聯合而成，但却不等於各個的部分的總和。所以，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要從各種的經濟現象中彼此相互的不能分開的關係上去研究，同時，我們更要從動的變化的方面去研究，這纔不致於錯誤，這纔對於中國經濟的解剖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 二 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

說到中國，馬上就聯想到土地這樣的廣大，人口這樣的繁多，天然富源這樣的富饒，這在我們中國人老是可以驕傲的；可是一回想到我們自己的經濟生活，那就不行了。在邊疆如蒙古西藏青海等處不消說，到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單純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即使有很幼稚的交換，也不過在同一經濟地域內完結。既不生產需要交換的物品，也不和其他經濟團體交換生產物來維持其物質生活。這幼稚的經濟生活，不問而知其為尚在獸獵或畜牧時代；然而，這時代的幼稚經濟也居然在現代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

即在內部十八省的各處，也有同樣情形的存在。如在雲南貴州四川等處的苗族，在廣西的獠民，廣東的黎民，都是在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幼稚生活。我還記得前年在瓊州的時候，親眼看見五指山上的生黎，用石子木棍等工具打着山鹿等物剝皮生食。在這些生活狀況之下，當然沒有交換的事實存在，更是談不到封建制度的種種經濟組織。這只能表示着歷史上的一個階段而已。但這階段不是過去的階段，而是現實的階段，這一階段性之在目前的中國是一般地廣泛地存在着。

可是，廣汎只是廣汎而已，在事實上却不能包括中國全部經濟生活。但這個原始的經濟生活形態，在中國現社會的發展階段上却表示了很大的意義；這個意義之主要的性質是表現着中國經濟條件之不均與其複雜性。

這是很顯然的，這種經濟生活，在原始的幼稚的牧畜方式和農業生產所形成的家族或氏族底血族團體內經營着；即一定的血族團體站在共有的土地或家畜財產之上，經營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生產自己需要的物質，消費自己勞動的利得，此外一點也不曾夢想到尚有較高度的文化生活底存在。

上述的尚在原始共產制之下氏族社會的經濟生活底存在，雖為中國現代經濟說明上有些不便，但我們要了解中國經濟的整個事實，却不可不加以簡單的敘述；這因為與其他部分的經濟或整個的經濟都有相互關係的連繫着的原故。

### 三 單純商品再生產

在上面雖然敘述了中國現代的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的狀況，但是，中國全部的經濟究竟是什麼經濟？這仍然是個不明瞭；是否是封建主義的經濟？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這

個問題在中國全部革命論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必須加以正確的觀察。

除了新疆等處和內地的原始民族以外，最廣大的主要的經濟領域，自然是農村經濟。在目前表現於中國農村經濟而顯出其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只是單純的再生產。機器的應用，集益農場的經營，和墾殖公司等等的組織，在中國還是很少發現，雖然在東三省——尤其是大連有許多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但這請注意，並不是中國自己的，而是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侵略的方式！所以，在大體上看來，中國農村的生產，還是單純的再生產。

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所用的勞動手段，是最原始的，是最粗笨的；換句話說，它只能適合於小規模的生產；再簡言之，它只能適合於小農在一定限度內的單純經營與生產，除此以外便不適合了。這是很顯然的，一切最根本的改變，都是跟着生產技術而決定的。

其次所謂交換形式，大體上都已進行到貨幣交換這一個形態。雖然有不少的所在還是進行着物交換的方式，他們用自己所剩餘的生產品去和別人或另一生產集團去交換自己所沒有而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例如，一個生產者假如拿

了一石米，恰好和另一多餘一疋布而需要一石米的生產者偶然相遇，於是就實行交換，只有在這一種場合之下，交換才能實現。所以，這種交換只是偶然的單純的交換，只是通行於交換尚屬稀少的時代，在現在已是很少的看見了，但我們却不能否認絕對的沒有。其次比較高度的完全（發達的）交換，譬如「貝」已具有了交換的共同性質，已成了一切生產品的價值的基準，此時「貝」的生產，不僅爲了它的物質的特質，也不僅爲了滿足他自己的慾望，而且爲了它的交換價值。於是這貝便成了下列交換的方式。

$$\text{十個貝} = \left\{ \begin{array}{l} \text{一疋布} \\ \text{二個陶器} \\ \text{十枝箭} \\ \text{.....} \end{array} \right.$$

由上面的一個公式，我們便容易明白其他一切的貨物底價值開始由某種物件（例如貝）來測量，來表示了。

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農村中尚行着這一個交換方式嗎？不是的，這種交換早已消滅了，但我們也同樣的不能否認是絕對的沒有。

我們再看看在內地的鄉村間的經濟，大體上仍然是以



自給自足為原則，農家需要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由自家生產自家消費；至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多數農村間是成為稀少的現象，不佔得重要的地位。然而，還有許多地方的農村生產，却已經成為生產商品化了。所謂生產商品化，就是農民一面當作農業的副業，生產手工業的物品，運到鄰近的市場上去販賣；同時，把其所生產的糧米等農作物當作商品運往市鎮上去販賣。這種生產商品化的現象，在目前中國農村自然經濟崩潰之下，更加次第的擴大，而成為全中國普遍的顯著的現象。而且，在市鎮之間，商品生產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即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廣泛地一般地而成為我們普通最常見的現象。這種商品生產，一面供給於鄰近的農村，同時又在都市內販賣，有時還要供給於較遠的地方，形成中國多數都市生產的形態，而這種形態便是單純商品再生產的有力的表現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無論其在農村與都市，都是表示着前資本主義的或是半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們在這種生產方式裏，只能看見舊的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

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總不能像俗學式的先生們執一不化，很機械地去論斷；我們在大體上看來，中國的農村生產，

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農民生產農作物不僅為自己消費目的而生產使用價值，更是為了交換的目的而產生交換價值。

在上述的單純商品生產的進程當中，一般的尤其是特別的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發生了緊密的連繫。這裏所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是指小規模的農業與手工業的原始資本的積蓄。這種資本的積蓄，在現代農村經濟上或都市手工業的生產上，演着重重的剝削方式，使中國經濟很牢固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或是更盡其崩潰作用，使中國經濟一直向後退。現在易於說明起見，先述商業資本在現代中國經濟上的作用。

#### 四 現代的商業資本

商業資本在中國很早的時候便發達了。但為什麼中國到現在的經濟還不發達？這原因只是在商業資本之只有腐蝕的作用，而沒有生產方法的性能。因為商業資本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並不是代表社會的一種經濟制度，也不能獨立的自成爲一個經濟發展的範疇；它只是依着社會生產力改變而改變，它只是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附屬物。

我們現在不來討論商業資本之在歷史發展的各階段的情形和在各種社會的狀況，只是討論商業資本之在現代中國經濟上之作用。

我們知道商業資本存在的先決條件有二：第一須有商品流通的事實存在，第二必須有貨幣交換的事實存在，有了這兩種條件，商業資本不論在某種生產行程上，詳言之，即不論在原始共同體的生產上，或是奴隸制度的生產上，或是小農和手工業的生產上，或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上，都是可以依附着存在和發展的。商業資本祇因其依附着上述的兩個條件的存在而存在，發展而發展，所以，商業資本之性能，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交換過程中之媒介物而已。因為在各種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爲了某種貨物的餘剩，不得不經過一個交換過程，以換得別的貨物；在這種場合底下，商業資本就盡了媒介的作用，也只有這種作用而已，它對於生產方法是不能顧問的。究竟商業資本的範圍有好大，流入這交換過程中的貨物有好多，這些都是要由於生產方式的決定，它自身沒有權力去決定的。因為這樣，所以馬克思也說：“此處不是商業不斷使產業革命，而倒是產業不斷使商業革命”（英譯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二章）同時他又說：“商業資

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的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和社會一般的經濟發達，是成爲反比例的。”（見博洽德通俗資本論第二十一章）這就是說生產方式能夠支配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却不能支配生產方式，同時，商業資本單獨的發展，不但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反成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桎梏。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商業資本之在中國現代經濟上的作用。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可知中國的商業資本，它只能破壞舊生產方法而不能產生新生產方法；它只能破壞單純的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而却不能建立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它只能剝削生產者和消費者，却不能直接支配生產過程；它只是從生產過程中分離而獨立的；它只是剝削生產而不參加生產的；所以，商業資本的蓄積愈多，却愈不能促進生產的發達，然而却巧相反。獨立發展的商業資本蓄積愈多，其所剝削的生產組織愈爲衰退！

在目前中國的經濟領域中，我們只看見商業資本的活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蓄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單獨發展，而却沒有看見產業的發達；又是相反的，只看見原有產業的衰退！最近關於這些現象的表白，在報章雜誌上幾乎日不絕

書。一個社會，一個廣大的社會，甚至只有商業資本在那裏演着重重的腐蝕的作用，而新的生產方法却不能起來代替，這是何等嚴重的一回事！

## 五 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

但是商業資本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表示着什麼作用呢？這，又有一述之必要。帝國主義之對中國經濟的侵略，中國的商業資本是否可以抵抗呢？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否可以緩和呢？並不，它只是增加帝國主義侵略的程度而已！

帝國主義底無組織的盲目的大量的商品生產，在它本國一面爲了競爭的激烈，引起商品價格的低廉，流通的停滯；一面又爲了大量盲目生產的結果，引起了經濟的恐慌，失業的增加；在這兩種嚴重情況之下，要維持它的生存，就不得不竭力向海外找尋殖民地。所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加重侵略是經濟上必然的結果，並不是由於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以及其他上的野心。雖然在事實上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等等的侵略。但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所要透過的手段，它的目的並不是整整的在於此處；它的

真正目的是在於原料的獲得，商品的暢銷，和投資區域的擴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其主要的手段，是資本家的為獲得利潤的購買，詳言之，即在於低廉原料和勞動力的購買，這樣，資本家可以充分的掠奪剩餘價值而獲得大量的利潤。在如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

$$G \text{ --- } W \left\{ \begin{array}{l} P W \\ A \end{array} \right. \dots\dots P \dots\dots W, \text{ --- } G,$$

包括了兩個交換過程，一個生產過程。因為資本家為榨取剩餘價值起見，自須進行生產過程；並且他為預備進行生產過程及實現從生產過程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起見，自須一個購買和販賣過程，換言之，他為了獲得較多利潤的目的起見，自須進行着兩個交換過程。經過兩個交換過程後，所獲得的大量利潤，再加上原來的資本，投入再生產，如是不已，不但使商品盲目的生產成為無政府的狀態，不但使商品的壘積引入恐怖的境界，而金融資本的大量過剩，已足夠使資本主義國家整個基礎發生動搖！它為它自己生命的維持與延續，它為了它的前途的穩定和發展，質言之，它為了解決這當前的最大矛盾，它於是不得不加緊向殖民地侵略，而中國的商業資本便是幫助這種侵略的最大有力的武器。

因為商業資本的機能，只是作了交換過程中的媒介物，



而却不能轉變生產方法；因其這樣，所以才能和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以及金融資本相勾結，共同向中國農村經濟進攻，其結果，造成目前中國經濟的畸形現象；一端有中國的商業資本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的高度壘積，他端有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的流亡和餓死！

## 六 金融資本統治下之農村經濟

中國的商業資本愈是表示着活躍，中國的農村經濟愈是表示着崩潰，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愈是表示着大量的發展，目前的事實給與我們證明了這個前提的十分正確。

商業資本幫助着帝國主義共同向着中國加緊經濟侵略的這一事實，無須乎我們拿高深的理論來證明，即膚淺如金貴銀賤之一例已足夠說明了。因為中國的商業資本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卵翼之下，才能‘興波作浪’，才能‘榮繁發達’，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金價為什麼漲？銀價為什麼跌？這很簡單，因為外國的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統治着農村經濟的原故。假使外國金融資本沒有中國商業資本的降附，還不能造成目前的現象，還不能造成當前的金貴銀賤大風潮，只是在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

後才有可能。但是，金融資本發達的結果，仍不能轉變中國的生產方法，反而只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村既加速地破產，而都市工業除操在外國資本家之手外仍不能發達，而且還有同樣的破產！於是，中國社會經濟整個的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征服所統治，而銀價問題之發生在這種統治關係之下是必然的結果。‘世界各國用金，而中國用銀，’‘金銀供需之不調’，只不過是一種導火線而已，原來中國的農民統治於倫敦與紐約！有人竟謂解決銀價問題最澈底的辦法，是在於籌開國際會議作共同的解決，這只是不明瞭實際情形所發出的一種無識的虛妄之談，他簡直連這一句很普通的常識話都不懂得：‘中國之所利而帝國主義之所不利也’！國際會議云乎哉？！

本來，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範圍擴大，使生產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成為世界的貨幣，因此，中國的農村經濟不能不受商業資本的控制，而商業資本不得不與城市的買辦發生關係，城市買辦不得不與世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家發生關係，即不能不受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統治。

在事實上很顯然的，中國的農村經濟受着帝國主義的

長期剝削而日趨於崩潰了！崩潰的結果，造成目前大量農民的流亡與流寇的發展。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不說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沒有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幫助，還不能造成目前這樣的強度。因為商業資本事實上是帝國主義的買辦，高利貸資本是城市錢莊在鄉村的代理人，而錢莊又是帝國主義銀行的支配物，地主取得了農民的生產物以後，不得不向帝國主義的買辦銷售，所以，中國農村不得不經過各市鎮和上海發生交換，各市鎮不得不經過上海和國際發生交換；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往往又都是三位一體！都是農村經濟崩潰的促成者！！

然而，一切剝削的主動力却是帝國主義，而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只不過做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罷了。

## 七 封建剝削關係

如上所述，我們很顯然的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全領域中都有直接統治的能力，這統治的能力在表面上使我們易於看見的，是金融資本統治了都市，商品經濟統治了農村，其結果使農村不得不依賴於都市，都市不得不依賴於世界市場，於是中國經濟不能不為世界經濟之一環，與世界

經濟打成了一片。然而世界經濟之一環的中國，其經濟的複雜性是世界經濟之他環所沒有的，這種複雜性我們不用費力搜求，只消在農村中放眼一觀，我們即立刻發現有許許多多與資本主義相矛盾的關係，這些關係我們為敘述便利起見，都可以歸納在封建的剝削關係上。

封建的剝削在農村中表現得明顯的是地主對農民之高度的佃租關係。中國是小農經營的國家，農民在全人口上佔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其中除自耕農半自耕農外，佃農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即根據極不完備的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全國農民二千四百三十二萬餘戶，其中佃農佔一千三百八十二萬餘戶，半自耕農一千零四十九萬餘戶，如每家以五人計，那麼實際上在佃租制度之下受剝削的農民人數至少在一萬五千萬人以上。這一萬五千萬人以上的農民受地主的高度剝削，構成中國目前生產關係之重要的樞紐。地主對農民的佃租恆高至百分之五十乃至七十，除繳納正額以外，佃戶還須受地主附加的剝削，例如，“江蘇灌雲等地之承攬約中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田主指揮，並於暇時為田主服役，”（劉大鈞：我國佃農經濟狀況十二頁）這些關係完全是純封建主義時代的領主對農奴的剝削關係，像這樣的關係我不

相信僅是江蘇灌雲等地有之，在全國各地定有很普遍地廣泛的存在着。

我們再看地主對農民剝削所取的形式上有所謂契約制，口約制，包租制，永佃制中，佃農又何嘗有所謂意志的自由，決定的自由。佃租關係如何決定之權，完全操之於地主，地主在這種契約之中可以任便規定聽地主指揮，地主可以任意驅逐佃戶，佃戶不得隨意更換土地；在資本主義工銀勞動制之下尚有形式之自由，但在此種佃租制度之下連表面上形式上的自由都沒有了，所以，中國的佃租制度還是封建主義的。再，在納租制上看，也可以得出封建的意味來。納租制普通恆分為納租金法，納租穀法，糧食分種法，幫工佃種法四種。納租金法雖在於田地較肥價值較昂之區採取貨幣的形式以納租，但其中間却無資本家從中奪取剩餘價值的部份，其關係仍然是地主與農民的直接關係，不過在形式以貨幣來代替吧了。納租穀法中農民所繳納者盡係農業上直接的生產物如糙米，穀，麥，棉，黃荳，高粱，玉蜀黍，山芋等等，其性質仍與中世紀的農奴奉獻給領主的農產物一樣；而在糧食分種法幫工佃種法中，却更十足的表現着極濃厚的封建時代的農奴氣味。例如“南通瀘涇港沿岸的幫工佃戶，

不需資本，只供給勞力，所獲作物與地主按成分配，地主分四成，佃戶分六成。在宿縣俗名此種佃租制曰‘拔牛腿’。（金陵大學一九二六年之調查報告）由這‘拔牛腿’的名詞，也可以想見其意義了。除此四種納租制以外，更有一種很驚人的高利貸的榨取，例如：“崑山正儀等處，若莊稼不豐，佃戶可邀地主在田內察看，估計收成若干，以定減租標準。若地主始終不察，則佃戶不能自行收割，蓋一行收割，佃戶即需交全租也。故此種情形‘佃戶往往不收，以致莊稼盡毀，而租亦不交，若縣內賦稅不免，地主對於佃戶之地租，當然亦不肯免。就實際而言，多數佃戶實無力納租，故地主亦有允許緩交者，惟佃戶須寫一字據與地主，批明佃戶某某，曾借地主某某洋若干元，月息幾分，迨何時交還，決不食言等情。此種字據，俗名‘期票’，蓋此種地主所許緩交之地租，至此時已變成借款，並須付息按期交還矣。”（全上）此例僅是由地租轉變而成高利貸之一種，其他種種高利貸名目繁多，也不能細舉了。像這樣的除正額的佃租以外，尚須有一種轉變為高利貸的嚴重剝削，這恐怕是中國農業經濟中的特色吧。在這種狀況之下，使中國土地構成高度的土地資本，於是生產農民的大部分資財都用在購買土地和建築物上面，只還剩着一



小部分的資財經營農業；因此，改良土壤，整理灌溉，添置農具，購買肥料等都沒有法子可以進行了，這樣，農業經濟不崩潰尚待何時！況且在事實上地主就是農民無上的政治統治者，使農民受到壓迫而不能自由經營農業，這兒就以金陵大學的調查報告作例吧：“江蘇吳江縣之震澤，農人幾全為佃戶，地主對於佃戶之苛刻，實不可以言喻者；觸目感懷，誠不得不令人投筆三嘆也。地主田業公會為佃戶無上之官廳，押佃所為征照佃戶之地獄，顯然為中古奴隸之遺風。地主宛如貴族，佃戶即其奴隸！噫，農村社會中有如此之現象，欲求國家進步其可得乎？！”

其次，封建的剝削關係表示着較為顯明的是軍閥官僚士劣團防之一切苛捐雜稅等政治的剝削。稅捐之繁多與苛重，在中國本是家常便飯，已是令人道不勝道了。據張振之先生在其所著‘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一書中舉出四川的苛捐雜稅，誠令人有毛髮悚然的感覺；他從重慶總商會的代表石榮廷李奎安二君所苦心調查得到的‘各路非法苛捐一覽表’中，舉出其三表作例，總計每表中所列苛捐雜稅的名目有多至一百餘種，其所征去之洋除正稅外已超過其成本之數目，但其所經過之地則不過六七縣耳。表中所列真五花八

門，看了簡直令人要頭痛眼花。（原表很長，不便舉出，閱者可參考該原書）即在十年前據調查所得在湖北的雜稅有：木稅，斗稅，漁稅，捕魚船稅，皮毛藥品花布等稅，洋灰公司的貨稅，紗麻絲布稅，膏鹽稅，商稅等；雜捐中最重要的有：竹木捐，串票捐，稅票捐，夫役捐，學捐，米捐，船渡捐，車捐，房鋪捐，輪渡捐，市廛捐等等。這些苛捐雜稅，各省均各異其名，每省至少都有數十種以上。全國厘金關卡凡百三十八處，最近江蘇浙江江西等省名義上雖已裁撤釐金，但仍舊代以特種消費稅，農民的稅捐負擔並沒有減輕絲毫。中國田賦在最近十年內由十倍增至七十四倍，廣西的田賦佔耕種費用金數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田賦除正額之外，其各種附加稅之多，連財政當局也記不清楚，浙江的嘉善在一九二八年有七種之多，每畝要征收一元三角，民十六年山東萊陽的田賦竟每畝達到七元四角！此外又有預征田賦之例，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四川的郫縣預征到民國二十八年為止，而梓潼一縣則已預征到民國四十六年為止！再，此外，封建軍閥為加重剝削增多收入起見，強制人民種植鴉片，現在中國境內種煙區域之廣，更是沒有法子統計。四川雲貴這些著名產煙之區，姑且不說，就是一向不產鴉片的地方，於今也有了鴉

片！河南的一百零八縣中有六十三縣是種鴉片的，在豫西各縣，更由當局規定每百畝土地中至少要以三十畝種鴉片。一種鴉片，則其苛捐便多至不可勝數，下種時有罰款，栽插時有窩捐，收煙時又有罰款，運煙上市又要交一筆保險費，如果抗令不種又要徵收一次懶捐！像這樣的情形，在拒毒會都有斑斑可攷的報告與統計，不由得我們不相信了。這些苛捐雜稅等等的剝削，都有其政治的基礎，對中國整個經濟生活上有非常嚴重的意義，而顯露着國家封建制度的殘餘，而為資本主義國家所無的。然而在中國的今日，却仍然是廣泛的存在着！這是什麼現象？

## 八 封建經濟歟？資本主義經濟歟？

我們在上面各節中的主要任務，都已指出了中國經濟的複雜性與特殊性；既指出了資本主義成分的經濟，又指出了封建成分的經濟；照這樣的敘述，恐怕又要使閱者有摸不着頭腦之嘆，中國經濟到底是封建經濟歟？抑資本主義經濟歟？此處不怕重復，再說一下。

劃分社會經濟的各階段誰都知道是生產方式。有某種的生產方式，必構成某種的生產關係，而這種生產關係才是

社會的基礎。“無論那個社會的形態，存在一個一定的生產，這個生產優越於其他生產，而其關係，對於其他的一切關係，有指出其地位與勢力之力。這是一個普通的亮光，其餘一切的色澤皆被這亮光所染着，皆由它而修正其特殊性。這一個特殊的以太（Ether）規定表現於其中的一切存在之比重。”（The author's Prefac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種經濟結構中，便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決定了統治與隸屬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生產過程中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祕奧……雖然如此，但同一經濟基礎（同一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能發出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與迷混其本來面目，要瞭解他，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之分析。”（Capital V. III）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已發展到了何種階段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只要分析當時的實際環境，只要看當時的生產方式就夠了。那麼，中國的生產方式是什麼呢？“中國的生產方式主要

的是農業手工業勞動，……故農業仍然是中國的主要生產，而對農民的剝削是中國主要的剝削制度，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地租的收奪。”（陶希聖：中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這些農業手工業勞動的生產方式，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是佔着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我們雖然不否認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否認中國的產業革命有大量的進展，雖不否認城市經濟有領導農村經濟的作用，然而，在全國整個經濟的比重上，却不能不使我們不承認農業生產與手工業勞動佔優勢這一個事實。

實質上，中國經濟是封建主義經濟歟抑資本主義經濟歟的問題未免太機械了，這樣‘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簡單邏輯實在不能應用於中國經濟的剖析上；因為中國經濟根本便是很複雜很畸形的，封建與資本主義兩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若是丟掉此要素而專取彼要素，便不能把握着中國經濟整個的所在。如果有人竟因捨此而就彼或捨彼而就此的見解來爭論着中國經濟是封建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我相信即使爭論到一千零一夜也是爭論不了的。中國這樣複雜的經濟，須得有適當的名詞去概括它，才能把中國經濟的整個性形容出來；在我未想到更切當的名詞以

前，暫名這種經濟爲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若再明白些說，也可以勉強的說是半殖民地之半封建的經濟。

## 九 經濟發展的前途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目前的這一個階段已是矛盾重重再不能平安的發展下去了。它必須有突破目前的矛盾而後才有順利的進展，否則，它只有加深的矛盾，更向畸形的方面發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依這趨勢，中國經濟的發展便有下列兩個前途：

其一，是不能打破目前的現狀與矛盾，使中國經濟趨於完全殖民地化。於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在中國更有長足的進展，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則只有趨於衰落與破產，因此，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便日漸接近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像英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印度，卽其前例。

其二，是能夠突破目前經濟的束縛，領導中國經濟走向非資本主義之路，使中國經濟建設在平等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上以達到爲民所享的目的。然而，這個前途須在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生產關係的問題，而不是生產技術的問題。



目前的事實給我們指出了：在都市，絲業綢緞業麵粉業火柴業等等一切民族工業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日就衰落與倒閉了；在鄉村，一切生產事業如農業手工業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剝削而日就崩潰與破產了；而在他一方面却指出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與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商人資本有長足的進展！依照這個事實的線索，第一個前途有實現的可能。如果中國革命不能復興，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不能根本肅清，那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惟有悲觀！

十，二七，一九三〇。

白沙社叢書之一

## 地租思想史

高昌素之著 王亞南譯 實價大洋八角

地租 (Rent) 問題不獨是馬克思經濟學說中最艱深最困難的一部分；尤其是經濟政策，農業問題中，一個最複雜而爭論最烈的問題。此書係著者對於日本勞動黨之農民政策表示反對而作的，故更饒生動之興味。在目前中國農民問題緊張的時候，此書想能給我們無限的意義與參考罷。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北平 廣州

# 中國社會史短論

王宜昌

## 一 研究的方法

中國社會史中，中國社會底現在階段是什麼，是解決今日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理論的基礎問題，而亦為今日中國人們所爭論着的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史是經過如何的幾個階段？而各個階段，在中國底歷史時代上是如何劃分的？這為的是週到地批判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是不能不被注意着，因而也成為今日人們所爭論着的問題了。從一九二七

年中國大革命以來，這種爭論，便是開始。現在堆積的材料也不少了。我打算來鳥瞰一下這些爭論，從批判裏導去我底短短的一瞥的結論。

首先我們便來看關於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我們知道，在一切研究上，方法是很重要的。同一的對象，以方法不同，可以得出種種不同的研究結果。正確的方法應用到研究上，才容易而且也可以說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可曾提出這方法論底問題麼？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顧頡剛傅斯年底對於古史的研究，便應用着古書的攷據方法，和新滲進了些神話解說等等。而在一九二七年以來，人們都利用着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為根本的指導原理，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但同時是不瞭解清楚歷史的唯物論，或者有意滑頭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們的所謂歷史唯物論。熊得山底“中國社會史研究”，陶希聖底“中國社會史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周谷城底“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長野朗底“中國社會組織”，朱新繁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任曙“中國

經濟研究”，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等著作中，和各種雜誌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據歷史的唯物論這根本的指導原理來的。但他們一般只是應用這一根本原理，而沒有正確地敘述這一根本原理底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如何適用。直可以說他們是沒有仔細底攷究方法論的問題。有些簡直是在糊亂的應用他底所謂歷史的唯物論，而有些如郭沫若任曙應用起歷史的唯物論來，也因沒有攷究方法，而不免失于不正確。

我們來攷究一回罷。

自然，一般地在科學研究上，我們在現在底智識的最高發展這限制下面，只有最高限度的利用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和其應在用人類社會上的歷史的唯物論。但我們所要攷究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是早已不是要不要用 Dialectical method 和歷史的唯物論的問題，而只是牠們更具體的更複雜化的如何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問題。

我們知道：人體的解剖是猿體解剖的鑰匙。因為在猿體中還未發展的部分，在人體中十分發達起來，而在猿體中十分發達了的衰頹了的部分，在人體中還留下了痕跡。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不但是在解剖學上應該如此，而且在研究人

類社會史的科學研究上，也應該如此。我們應該從最高階段的最發展的人類社會解剖起去，而漸次地達到最原始的社會階段。這樣，我們才可以從一事物的結果的存在，推求其原因與發展。反之，我們從原始的階段研究下來，我們將看不清新事物之發生發展與消滅，而迷惑錯謬。這種由果到因的歷史研究，這種由當前現實的研究，這種研究最發展的最複雜的現象底全體與運動，正是科學的即 Dialectical method 的方法。——我們可以記着這句名言：“思索是從後至前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是從當前的現代社會研究起。

自然，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研究法。我們更須知道研究法是與敘述法不同的。研究的思索是由後至前，由複雜分析到簡單，由果推到因的。反之，敘述法却恰與上述的研究法相反，而是由前至後，由抽象的簡單綜合的到具體的複雜的，由因到果的。二者是不能相混的。我在此不指摘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否用上面我們所敘究的方法。我們願意人們反省一下，而且注意一下這個方法。

其次，我們知道，社會底基礎是經濟。在經濟中人的生產力和物的生產力底一定的結構關係，決定着政治的社會

的意識的上層建築物。我們不能從意識的或社會的或政治的上層建築物來說明經濟，以至說明社會自身。反之，我們却應從經濟這基礎以至從物的生產力上來說明社會，政治，和意識。這是歷史的唯物論底根本主張。——我們更須記住這句名言：“在考察這些變更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底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更，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區別出來。”

所以，我們要認識現在底中國社會，只有從牠底經濟基礎上去分析，而不能混淆了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種種因素在中間的。自然，我們也要分析現代中國社會底政治的社會的和一切意識形態的各方面。但這些分析，不是獨立的，而是要從經濟分析來修正牠底內容的。不幸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底目的，在一方固然是在於學術真理的探討，但重要的却是為的認識當前的社會，由理解當前社會底必然法則，從而變革社會。我們要週到地明白地批判當前的社會，我們是不只要求當前社會階段底發生發展



變化消滅的認識，而是又要理解過去種種的社會發展階段，即理解整個的歷史。“沒有沒有實踐目的的科學”。這是作為‘技術’的科學底本性，便是為的人類底積極的適應自然服務的。

簡短地敘述了中國社會史方法論底大綱。另外的節目，容後隨時敘述了。

## 二 現代社會的解剖

我們為表明自己主張的研究法，我們在這短文便抹去了敘述法這科學方法，而以研究法作為敘述法了。所以我先說現代社會的解剖。但在小段中，仍不能不用敘述法的。

我們怎樣解剖現代的中國社會呢？歷史的唯物論要求我們先從經濟着手，而同時，Dialectical method則要求我們觀察全體的運動，把握自身的運動。所以我們便要把握着中國社會自身的運動，而觀察中國經濟。在我們底感性的直觀之中，我們看見大量的商品之交換及其生產。從這商品底分析中，我們便可看見價值律底完成的發展，和商業欺詐底漸次衰頹。看見剩餘價值之直接由資本家榨取這種發展，和剩餘價值之由經濟外的強力剝削之漸次減少。看見平均利潤

率之漸次形成，和重利底漸次消滅。看見地租之貨幣的轉化。而在工藝學技術學或物的生產力方面，我們會看見火車輪船電信飛機的交通，我們會看見大機械鐵木機械的工具。在人的生產力上，我們會看見 Proletariat 底形成，和過剩人口，流氓底存在。自然，我們是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的存在和正在長成了。

我們追跡這個長成的歷史，則大量的商品交換盛行于中國社會中時，是大約在鴉片戰爭前後開始的。此後中國經濟中有鉅大的勾結着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活動着，而又盛行着鉅大的經濟外的強力剝削如厘金，賠款等。這是外來的歷史作用于中國經濟之中，而構成了中國經濟中底一種因素，在中國傳染起資本主義來了。從軍用重工業到輕工業的發展，鐵路投資的發展，興起了許多地主性的資本家。到歐戰後，商業資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充分的動盪了守舊的農村，產業資本家更抬頭起來。資本主義的洋華的對立在此是不須的。

在現代中國社會，從政治上來看時，則牠適應于經濟的發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動時，動搖了農村，而暴發了無數的農民叛亂。同時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侵略而武力

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來。工業的發展中，立憲的帝制在準備着了。而地主性的資本家的不滿，會推開了朽腐久了的滿清皇帝這天靈蓋。商業小資本家和其相應的軍閥政治，歐洲十八世紀君王式的軍閥政治，在歐戰中興起來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華資本主義的爭競才充分地表明了。統一的政治，將隨着交通技術的增進而漸次完成。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則家庭生活，由家族主義的大家庭而轉變到個人主義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連帶的感情，而轉變成商品的金錢計較了。宗教則儒佛道糅雜的多神拜物教，轉化成無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底基督教了。教育是從保守治術的科舉，轉變成為教授專門智識，增進勞力這商品價值的學校了。

在社會心理上，現代中國社會中，是把過去的一切順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機進取了。他們好似商品是流通着一樣，他們是活生生地活動着。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初是有富國強兵的思想，繼着是商戰軍國民的思想，再後是國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現在是和平統一的思想。在學術上所表現的是，在戊戌以來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在五四以來

的對過去文化的懷疑和否定，在五卅以來的新文化的輸入，和現在底文化的批判。

從這種方面，可以看到現代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而却帶來了軍閥的過渡期的專制。五卅以來底國民革命，第一在統一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而第二在於排斥國外的洋資本主義。但雖然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不能用民族來排斥盡了國外的勢力。但在經濟結構上，中國是無分乎洋華資本主義的，而是以資本主義這生產關係統一了洋華的民族和政治的對立，中國底主要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無分乎洋華的），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單就中國本身說，中國底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之統一，是幼稚的。但是資本主義是由國際貿易而來的。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是早由國際貿易時期而進展到世界市場。中國資本主義已漸次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國際交換來維持，而且也輸出製造品了。世界資本主義之達于其最高階段的，停滯的，沒落的帝國主義。由此，也大有影響于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運命。

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沒有其他經濟之存在。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是歷史的產物，過去歷史的種種遺跡，是必然地存留于現在社會之中的。但牠不是以本來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產關係底支配，變了形“染了光”的成爲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這種被支配的生產關係，是正在歷史的沒落過程中，無足輕重的。

中國現代社會中，因爲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龐大地存在的。牠是龐大，但牠是腐朽了，是沒落了。牠底反動是必然有的。但是牠底物的生產力是終于要使牠沒落了的。奴隸制度更是包含于封建制度中而存在着，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會，則從宗族祠堂，從僧侶食堂而表現了。

“批判的感情是激情，批判的本質是摘發。”我們來看石人們的爭論好吧。

Dialectical method要求我們觀察事物底運動，觀察事物底不但由過去之發生到現在底存在，而且要觀察他未來底發展和沒落。即是不只要我們看着過去和現在，而且要緊的是把握着飛揚在空際的未來，把未來的結果拿來完成這事物底本體全體，同被觀察着。但可惜人們在爭論中國現代

社會底時候，只把握了已存在的，而未把握正生成的。只看見過去和現在，而沒有看見將來。例如陶希聖便只看見中國封建政治及上層建築底存在，新思潮派便只看見中國封建經濟底龐大的存在，而沒有看見牠底沒落，和資本主義底正在完成。這種將事物靜止化，凝固化。只不是觀察實際，而是在頭腦中虛構中國社會史了。

在純粹的經濟分析上，不能很隨便地混淆了上層建築物進來。所以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底生產關係時，只有從經濟上去看已存在的是否是資本制的，和其存在的數量的大小。而不能從中分別說：這是中國民族的資本，所以這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那是外國資本，所以不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只能從在中國地域內，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生產關係來說。這生產關係當然不能分為華人的和洋人的。然而在陶希聖，朱新繁，以及新思潮派等，都在經濟上劃分着洋華資本主義而忽視在中國底洋資本主義。這是謬誤的。

封建制度在中國是正在消滅，是變為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陶希聖說中國封建制度早消滅了，但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新思潮派以為中國封建勢力佔優勢，佔支配地位。這無疑地是只把握了存在的封建制度。而且在其為“生產力的束



縛”上，陶希聖誤解為封建“制度”消滅但“勢力”存在，新思潮派則誤解為優勢，為支配了。

人們好從帝國主義來把握中國現代社會。這在研究世界社會時是正常的。但就中國社會研究說，是要把握中國社會自身底運動才正當的。資本主義底外來的侵入，只是作用于生產力底一個外來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唯物論中，是不能不看重這一外來歷史的作用的。這一作用，加入于中國社會中，而構成中國社會運動基礎生產力之一。所以我們不能從國際貿易來把握中國經濟，如任曙一樣。自然更不能從帝國主義從世界市場來把握中國。中國資本主義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來的傳染。但我們更要注意去解釋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自發，而是外來的傳染？爭論的人們給我們怎樣的答案呢？

這個，和追跡在現存社會中正在沒落的封建制度一樣，我們要追跡過去的中國歷史的發展。但我們此處可以注意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現社會的經濟中心，是轉移到東南沿海來，而不復是如過去之在于中原，在于西北了。

### 三 中國底封建社會

我們試看，在現代中國社會中還存在的封建制度，首先便會看見分散的孤立的落後的農村經濟吧。其次便會發見在農村和城市間，在城市和城市間買占着一個地域的商業資本吧，更由此會看見高利貸資本在作用着的吧。在這上面，還有商人行會的遺跡，在這下面，還有農村中的會黨，教徒，還有城市中的手工業行會。在一般的落後經濟中，儒釋道糅合的倫理與宗教，還龐大地存在着。家長，豪紳地主，官僚軍閥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外的如苛捐雜稅重糧加租等的剝削，守分安命的心理，古典的文化等。這些還成爲一個制度體系，雖然是正在崩潰，正在改頭換面的。

這種制度是怎樣崩潰了呢？我們便只有從歷歷上去追溯。在過去地方分散經濟時代的中國歷史上，我們很顯明的便要看到政治溶解于經濟中了的幾次社會大動亂，和幾次外來作用着的歷史影響。如清末明末元末宋末，唐末及五代，上溯至五胡十六國，三國及漢末，及秦末諸時代底擾亂，暨資本主義列強，滿族，蒙古族，金，遼，突厥，五胡等異族之侵入。在這種種動亂時期中，我們很容易地劃分出兩個階段來，一是由滿清末年到五胡十六國底異族之侵入。一是在漢以前底社會內部的動亂。從經濟史上的追溯，會看見中國封

建社會，是起始于五胡十六國的。

五胡十六國底異族擾亂中原，把當時中原的文物之邦的文化幾乎毀滅完了。第一他是打破了漢代遺來的貴族世家的統治制度，打破了以前的奴隸等級。而在擾亂之中，漢代以來的佛道兩教，便在鄉村中組織着農民，而宗教得了培養的地盤。鄉村中爲保衛自己而有莊園的組織，軍事地點加多，商業發源的城市加多。這不只北方是如此，而中原人民底遷移于南方，使南方也如此地變動着社會組織。在隋唐以來，中國統一，國內交通發展，南海海外貿易興起，文化中心漸移于長江下游，而開始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從經濟上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時，初時農業上的主要組織，是地主貴族僧侶們的莊園。這在隋唐兩代底河北各大族可以看出來，而且是從關於唐宋元明各代的記載及小說中，也可以看見莊園這種制度的。在這下面的是農民與農奴的勞動。而在莊園中，又有賤奴僕婢的勞動，這是奴隸制度的遺跡。僧侶也是一種地主貴族了，而僧侶們底公共食堂，同當時底大家族一樣，是保存着氏族共產制度底遺跡的。

在城市中和在鄉村農業中一樣，存在有一種獨立的手工業者，由着交通底發展，和生產剩餘底加多，手工業者和

商人更發達起來。于是城市發展了行會的工商業組織。這在唐宋以來，南方各海外通商城市，及洛陽，長安，夏口鎮，朱仙鎮，景德鎮等內地大城市可以看見的。這樣商工業底發達，增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而更多兼併的地主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這三位一體的東西，剝削着農民，加以地主貴族統治中的政治上的經濟外的強制剝削，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擾亂。農民失去了土地，逃亡出鄉村來。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在龐大的中國地域中，沒有養成新勢力的可能，而且又是為國家抑制着的，這樣底封建經濟的內部的朽腐，沒有新的自長的生活出路，而只有由異族底侵入來重新灌注新生命，重新組織封建經濟了。

北魏復行古代的均田以來，中國土地制度便終結了牠底古代制度，而唐代便對於土地另取租庸調和自由賣買的政策了。宋代王安石底復古，無疑地是不可能。

明代以來更擴大的海外交通，有了更發展的城市工商業階級，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發展紙幣制度。但清代又重新把牠拉退後了。在清代末，資本主義底商品輸入，加緊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的剝削，而又開始了農民叛亂。現在這新的海外通商，把中國過去的限于本國地勢底東南臨

大海，因而不能遠航以發展航海技術的落後保守的經濟打破了。技術是從交通到生產的有了新的器械，而商業資本，是從其封建中支配生產的性質，變為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一分支了。資本主義從商業到工業地在中國發展起來了：在手工業上，便加緊了由行會到手工工廠的進化，以至到機械工廠。在農業上呢？初時是把農業底自給自足的生產打破，而變之為原料的商品生產，漸次在其封建的小規模手工生產方法上，改變之為大規模的，機械的，化學肥料的，電氣的耕種了。莊園是早被商業破壞了，而行會又被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破壞了。

從政治上來看中國的封建社會時，則從五胡十六國直到清代和民國軍閥，都只是地主貴族僧侶的政治。他們底統治，不只是從武力，而且是更進一步的由風俗道德來統治的（資本主義是再進一步用輿論文化來統治，中國還沒有完成的）。僧侶在封建經濟中有偉大的作用，不僅在其發生上，而且更在其發展和消滅上。武士的風習，在唐宋以來，不但是見于雜記小說，而且是見于官家史傳上。帝王，貴族地主僧侶，武士，農民四個身分，是十分顯明的。

在社會生活與思想上說，儒家底階級的折衷的倫理觀

念，是隨後才起的。佛老的宗教，前者是大平原的印度底出世的宗教，後者是大平原底中原的出世的宗教，他們都支配着五胡前後底在擾亂在末日恐懼中的人們底心靈。但在唐宋以來底和平發展，又要轉向于入世，而階級的折衷的儒家倫理，正合于需要。于是在宋代便和佛老糅合起來，成爲不可分的東西了。佛教底地獄輪迴階級之說，和儒家底尊卑家族之說，一樣地成爲道德信條。而小民的安分守命，也是被支配的奴隸道德了。在家族制度上，是承繼着過去底氏族宗族而來的，但在五代和宋以來，特別加重了家長制的家族制度，男女和身分等更嚴了。科舉的攷試制度與教育制度，吸收的是地主貴族和武士的子弟。而家族故舊的感情，地方狹隘的心理，和古典的官家文化，便只如此經濟如此社會的產物。

有人以爲封建社會，中國在秦以前便沒落了。這不過是從中國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現譯 feudalism 的“封建”相混之故。這種不究內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說。若陶希聖認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前沒落，而封建勢力還存在。這不僅是不懂什麼叫封建社會與封建勢力，而且是虛構中國社會史。認爲漢以來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是地主社



會，或小農社會，這無疑地是不明白社會進化的階段的。

郭沫若以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後，即是始自秦代。這我不贊同的。這無疑地要爭論到封建制度底本質和起源問題。如山川均等一般是否認宗教與封建制度的重要的。但我們試看西歐封建制度底起源和其本質，却是宗教占着主要脚色。而一般又忽視外來的歷史作用底異族。但這不僅在歐洲封建制度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這是因爲奴隸制度底崩潰，沒有自己的出路，而是要借異族的新生命來復活的，Engels講得很明。而在中國封建經濟底沒落和資本主義經濟底興起上，也是如此。因爲中國以經濟地理的限制，沒有內海可以發展航海的交通技術，而廣大的內地生產技術，也無由戟刺而發達。所以不能自發的轉變爲資本主義，而必須利用已經發展了的資本主義之侵入傳染了。秦代宗教不盛，沒有外族之侵入。封建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構成的。而況秦漢制度，還可以證明是與封建制度不同的奴隸制度。五胡十六國之亂華和中原人民南遷，才把中國封建社會建立起來的。

在封建社會中底階級，陶希聖所謂士大夫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在歷史事實上，不是如此的。陶希聖是要把人們

欺騙，因而把種種不同的階級糅合為一。所謂士大夫，便是把武士，把優秀農民，把地主僧侶，把破落貴族聯合起來的治者，而流氓無產階級，便是聯合起來的被治者。這種是陶希聖所謂地主社會，梅思平所謂商業資本社會，方岳所謂(?)社會的X階級。不是現實的社會歷史的階級。陶希聖著得“中國封建社會史”，從“水滸傳”中研究得流氓無產者，但可惜陶希聖却不知道什麼是封建社會封建制度封建勢力，而不能從“水滸傳”中研究出真正的封建制度底莊園制度，武士階級。

所謂商業資本社會的主張者，他們是看不見社會的生產，而只看見社會的流通的。這是他們現實生活底反映。他們是遠隔了生產過程，他們又站在今日中國有鉅大的商業金融資本的社會裏，從這種視覺中，只能看出“商業資本”這一萬應如意藥膏的。因此，陶希聖對中國過去社會歷史，是沒有看見還有奴隸社會之存在，而忽視奴隸社會，像波格達諾夫一樣，將奴隸社會包含于封建之中，與封建糅合對立起來，而充分地說着“商業資本”了。

自然，奴隸社會也有其商業資本。但商業資本底社會的性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與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不同

于奴隸社會的。這點兒是談“商業資本”的人們所應注意的。

在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一樣，是直接從氏族共產社會變化來的。這在西歐是如此，在中國也如此。不過前者在廣大的內地，後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濱內海。前者時期遲，後者時期在先，因而前者又承繼後者的遺跡罷了。

#### 四 中國底奴隸社會

從現代社會底奴婢制度的遺跡中，我們可以上溯到古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的農奴賤奴婢僕，同樣是奴隸社會底遺跡，但是，更明顯的遺跡而已。

奴隸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試看漢末三國到晉中間的擾亂吧。當時平民的衆多和窮困，使諸葛亮勸劉備要招收流散的人民來充當軍士了。西漢末年和秦末一樣，流散的人民盡起做賊，而神鬼迷信之說開始支配人民。地主貴族和平民的爭鬥這主要的。再前底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周代，則貴族自由民和奴隸，是很顯明的。這不僅是從秦漢兩代中廣大的奴隸存在可以證明秦漢之爲奴隸制度，從周代以至春秋戰國之奴隸城邑證明牠們爲奴隸制度。我們還可以從根本的分析中去說明的。

中國底奴隸經濟，其地域範圍，在秦漢兩代是以武力征服了長江及珠江兩流域了。而在秦以前，是只屬於黃河流域這黃土層的所謂中原的。在古代居于中原地區如今日所稱為渭水汾水洛水以及黃河新舊道附近的商種族，由甘肅陝西徙來的周種族把他征服了之後，隨着既發展了的淺耕農業，而建立起奴隸制度來。商種族是被周種族作為奴隸，而經營黃河流域的奴隸城市如洛邑等了。奴隸的佔有，和家族建立，土地私有于家族等等制度，在周代開始發展。而奴隸城邑間更發展着商業。古代中原黃河水道及其他水道，是與今日不同。而當時齊魯以扼黃河及濟水等的交叉點，并又為中原交通之交叉點，地又近渤海東海，故交通繁盛，商業發達。鄭衛近于是區，商業亦鼎盛了。

商業的發達，只是增加奴隸貿易，改變為貴族自給的奴隸生產到為商業的奴隸生產而已。齊田氏便是一由商業致富貴的奴隸主人。

秦代以強大的奴隸勞動，統一了中國，建築了萬里長城，阿房宮，巡行天下的大道。但所謂閭左貧民這些平民和奴隸，便斬木揭竿而成為奴隸大叛亂來了。

漢代重新恢復了奴隸的政治統治。漢武帝底遠征的威

力，是奴隸制度底偉大的犧牲。而漢代底商業發展，却加重了平民的土地兼併，和人身即奴隸的買賣。王莽底復井田，禁止奴隸買賣，是不得不失敗于既成的經濟進化。東漢以來，貴族的奴隸統治政治，一仍舊貫，但內部底朽腐不適于社會生產，却增加了社會的不安，而佛教便起初成爲貴族破落的安慰。魏晉底清談佛老，無非爲此了。

已朽腐的奴隸經濟制度，沒有出路，而只有五胡亂華來以異族的力量而復活，但不能復活成奴隸制度，依賴異族底氏族組織，而成爲封建制度了。

從政治上看中古奴隸社會，則周代的統一，只是種族聯盟的所謂天下之“共主”而已。西周末葉的周召共和，只是自由民的政治。而秦漢的統一，才加強了的武力統治。在奴隸制度下面，是從吃殺俘虜直接遺下來的武力統治奴隸。而不是封建社會之以風俗道德，資本社會之以文化輿論的。春秋底五霸和戰國底七雄爭長，便是“共主”周室到秦漢帝政統一的過渡。

在社會生活上面，則中古奴隸社會中，家族制度，正在形成氏姓，而不嚴格。在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之下，賣淫制出現了。宗教是消滅在奴隸統治之下，而沒有力量，道德風

俗漸次地形成階級尊卑等差。而貴族，平民子弟，識字的便做官吏或治者了。

在學術思想上商周以來的思想，形成易經底辯證哲學，而後由老子承繼起來。再後，則齊魯商業繁盛的地方，沒落的貴族，寄生在奴隸勞動上，而發展了儒家的階級倫理和奴隸文化。隨着中原各地商業的發展，到了戰國，各國都有了哲人詭辯之士出來了。春秋戰國成爲文化很發達的一個時期，便是因爲奴隸制度極盛的一時期。漢代一方是在治術上發展，再一方又開闢了黃老方士的宗教，再後佛教也輸入來。但這宗教初時不過是貴族們的安慰品吧了。隨後才漸次侵入于一般人民心中的。

郭沫若尋出了中國奴隸社會之存在于中國古代所謂爲“封建”的周代。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但他以爲中國奴隸社會，在秦便完了。這是誤解了。因爲郭沫若從文化革命來論斷中國社會變革，所以認爲儒墨道諸家是在春秋戰國時開始了封建制度的革命。這是把文化來誤解經濟社會的結果。實在，文化最發達的時期，只是經濟發達到最高點的時期。春秋戰國只是奴隸社會底最高點，而在其後還有秦漢魏晉幾代。這好似歐洲奴隸經濟在希臘以後還有古代羅馬一樣。



同樣，在希臘以前，還有波斯，希伯萊，亞述，巴比倫，埃及等奴隸社會。中國也有許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奴隸國家的。

在漢代許多制度，和唐代對比起來，是十分不同，但和周代却近似的。再我們如果只唯物地承認思想是不能十分地玄構，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時，則我們對於古代歷史底材料，便要盡量利用漢代雜出各家之記載了。我們如果把周秦與漢同歸于奴隸社會來看，我們便可以解決許多無謂的記載真偽的問題。同時更容易從文字記載上去證明漢代之為奴隸制度了。

陶希聖和許多人，簡直沒有看到社會進化史上奴隸社會這一階段之存在。同時也忘記說中國還有奴隸社會。然而，他却根着波格達諾夫所說，將奴隸包含在封建之中，把奴隸和封建混雜起來。把春秋戰國的奴隸城邑看作莊園，而說春秋戰國是封建制度了。這真笑話。如果就班固漢書食貨志中所記載的來看，則當時所謂邑里等地方，都是奴隸居住的地方，早晚把他們放出來，有看守的人監視在門首。這是莊園麼？陶希聖不能從“水滸傳”中發現莊園，而却從“左傳”中發現了百雉之城為莊園，這不可不謂為中國社會史研究上可驚異的事情了。

## 五 中國底原始共產社會

最後，我們來追究存在于現代社會底家族和寺院中的共產制度的歷史。

現在中國大家庭中底共產制度，是已變形了的，只是不動產的共有制度。即宗族祠堂底共有財產，也是同樣。而僧侶們底共有財產之下，還更有共有的會食食堂。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共有的情形更明顯的。古代奴隸社會裏，則在宗族家族中底共有情形，遠較在封建時代的僧侶底共有為明顯。

家族制度，和宗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是和共產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的。共產制度底歷史，主要地是與氏族相連，而家族發展分裂了氏族，便把共產制度也破壞了。

中國原始共產社會的歷史，我們還不能用確切的材料來敘述出來。我們只好就神話傳說，以及古器物，和西歐歷史來綜合地說一說。

中國地勢，是處于北緯三十至六十度中間，正當北溫帶的。東南有太平洋的暖流，西北有高山大漠，而中央有黃河長江兩大河，東流入大洋。黃河流域中部，正當肥沃的黃土層，而西北又連接中央亞細亞草原的。人類最初在亞熱帶森

林發生起來，向平原的遷移，便由新疆而入于黃河流域了。黃河渭汾洛濟之交，地勢平坦肥沃，水陸交通便利，人類最初在這些繁殖起來。以前漁獵羣的稱爲 Horde 的人羣，現在是開始定居，而以母系爲中心的氏族制度組織起來了。以黃河流域的適宜的地利，男的牧畜，女的種植，安居生活着。但西北民族，以地利和天時的變換，從甘陝，從河北東南下，而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起來了。神農工共蚩尤黃帝等，在今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地的爭戰的傳說，也是可有的事。而此後黃河底氾濫，成爲傳說的堯舜禹和盤庚時代底洪水。由定居到淺耕農業，和由戰爭到奴隸發生，以及剩餘生產品之種族間交換的發達，由動產的私有財產到不動產的私有財產發生，于是小家族分裂了氏族，父系代替了母系。而原始共產社會便崩壞了。

氏族制度中，姓從母系，弟兄及姊妹羣婚。這在中國傳說古代帝王是如此的，近日已確攷的商代帝王，便是如此制度的遺跡。在這制度中的神權是很大的，商代巫風甚盛，可以如此解說。

關於原始共產社會，中國有井田的傳說。大概是在夏代山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氏族的土地分配，和生產物的分

配，是“五十而貢”，商代河南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七十而助”，周代陝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百畝而徹”。這一傳說，許多人以為是不可能的。我解說如下：

井田可以有兩種解說，第一，是指古代共產氏族分配土地與小家族時，應用輪耕方法，于是以土地的形式名田，兩年輪耕的土地形式如(甲)圖，稱為“田”，三年輪耕，如(乙)

(甲)	<table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ext-align: center;"> <tr>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耕</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荒</td> </tr> <tr>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荒</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耕</td> </tr> <tr> <td style="padding: 5px;">第一年</td> <td style="padding: 5px;">第二年</td> </tr> </table>	耕	荒	荒	耕	第一年	第二年
耕	荒						
荒	耕						
第一年	第二年						

(乙)	<table style="border-collapse: collapse; text-align: center;"> <tr>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春</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秋</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荒</td> <td style="padding: 5px;">第一年</td> </tr> <tr>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荒</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春</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秋</td> <td style="padding: 5px;">第二年</td> </tr> <tr>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秋</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春</td> <td style="border: 1px solid black; padding: 5px;">荒</td> <td style="padding: 5px;">第三年</td> </tr> </table>	春	秋	荒	第一年	荒	春	秋	第二年	秋	春	荒	第三年
春	秋	荒	第一年										
荒	春	秋	第二年										
秋	春	荒	第三年										

圖的稱為“井”。第二是說古代耕田時，擇取水源，以水源為中心，而向四方擴張經界成井字形，水源在中心，故稱為井。至古代何如畫正方形？則是為謀分配平均，及古代幾何術劃分的便利。文字是正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形成，第一說的井田解說，可以有根據，而西歐社會進化史上，也是此如的。

而助貢徹也可有其解說。原始氏族制度，氏族大家庭是共居的。在最初底幼稚農業上，每小家族分配的土地很少，而且各小家族仍是共居的。所以執行分配的氏族長老，便取各小家族所“貢”的一部分以生活。而農業底進步，每一家族

耕地却廣，遂使小家族離開大共產家庭而居住起來。氏族長老不能勞動，于是各家共同耕種長老的田。這是所謂“惟‘助’爲有公田”了。更進一步的，則井田底共產性質已變，種族的權威統治興起，成立所謂國家。統治者不復要“助”的公田，而是從十抽一的“徹”法了。

郭沫若對於商代和周代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但直捷了當的否認井田，這是還值得考慮的。

## 六 幾點結論

我們現在依據上面簡短的敘述，可以結論幾點：

第一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自然條件上去注意。我們知道歷史的唯物論，是 Dialectic 地綜合各種史觀的，自然，地理的因素也被看作一個重要的因素；而 Plehanoff 竟是充分地承認地理的條件的。黃土層，黃河水利及河道變遷，黃河長江底直入大洋，內海的缺乏，這些對於中國社會是有很大的影響。Morgan 及 Engels 以爲西大陸美洲，受動植物產及地勢影響而滯留于原始社會。我們可以說中國以缺乏內海，面臨大洋而停滯于封建社會了。資本主義不能自發這歷史的事實，只有由這自然條件而說明。

第二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人種條件和外來作用的歷史影響上去注意。這同樣是歷史的唯物論所看重的。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停滯而不成整個中國社會的衰亡，不絕地異族的侵入而加入新生命，是很重要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侵入，是更值得注意的生產力底大變動。

第三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社會條件上去注意。中國社會中，以物產底豐富和種類底殊異，而發達了不同的技術，又中國以種種自然人種的差異，而表現差異的政治形態，表現差異的風俗習慣，以致差異的心理與學術。這些是要反作用于經濟的。牠們在前一時代為被經濟決定的東西，而在後一時代則是決定經濟的歷史的前提條件了。如奴隸政治，封建政治等之沒有出路而成為朽腐的統治便是。

現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到底是從那些方面去注意中國社會呢？是單從一方面或幾方面，如像庸俗的社會科學家底偏面玄學的見解嗎？還是要本着歷史的唯物論的Dialectic地綜合全體的觀察呢？我想，假如是要把中國社會史弄成“科學”，而不弄成“假科學式”的“玄學”，我們不得不從作用于社會的種種因素去研究；而決定這些因素怎樣地作用？其作用程度為何如？是怎樣被經濟統治着的？



因此，我們不但要充分地了解人類積極適應自然底“生產力”的概念，而且要充分了解生產力底“變化的各種原因”，如自然，地理，人種，人口，技術，科學，生產關係等等。從中國社會這最具體的最複雜的現實，出發去思維牠底進化，我們是不能不達到這最抽象的最簡單的生產力的概念。

更進一步的，一切理論，都可還元于，而且在思維上必要還元于抽象的思維法則。于是我們不能不達到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 的思維。我們也不能不究心于這 Dialectical method 了。

假如我們只是隨便地應用庸俗的社會科學上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無疑地得不到結果，至多只有支節的而且是歪曲了的發現，如一般統計調查的人們，他們輕視理論，不了解理論，說要免去成見，然而却把他常識上的謬誤成見，溶合于他底研究之中去了。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們，便是如此。

假如我們只用一知半解的“自己的”歷史唯物論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也無疑地得不到什麼結果。而在此歷史唯物論的假面具之下，是更容易養成一般人的謬誤觀念。這簡直是罪惡了。那些鼓吹中國沒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在秦以

前便完了，秦至今封建制度消滅而封建勢力存在，和商業資本主義的人們，警醒些吧！

歷史的唯物論，是無疑地要聯繫到Dialectical method的。牠底正確處，正在於其由全體的，由運動的方面，去觀察最複雜的現實，而將其中的種種因子，從其發生的因果關係上決定他們的作用程度。假如我們只是簡單地應用一兩個死公式，且不是把全體觀察破壞了嗎？又且不是把觀察運動破壞了嗎？

本文簡短地寫完了。我是大胆地如此寫下去，文中有許多地方字句也沒如何修正，只率直地提出意見來。錯誤之處，尚望讀者指正。好在現在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可以大家來討論的。

一九三一，六，十八上海。

# 封建制度論

王亞南

- |                 |                      |
|-----------------|----------------------|
| 一 引論            | 六 中國封建制度與日本歐洲封建制度之比較 |
| 二 封建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 七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原因    |
| 三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其崩潰 | 八 論證今日中國尚爲封建社會之無根據   |
| 四 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     |                      |
| 五 中國封建制度之分解     |                      |

## 一 引論

在數年以前，中國學術界，曾軒然大波的，掀起玄科之戰。戰爭下來的結果，科學家固然說他勝了，但玄學家，也像

在說他勝了，至少是沒有敗。不過，自經過那次戰爭之後，玄學鬼確沒有以前那樣猖獗。固然革命勢力北張，他們不由得不銷聲斂跡，但那次玄科之戰，多少總不免給他們一點懲創吧。

近年來，學術界又提起了一個爭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現在的社會，究係什麼性質。是封建社會呢？資本主義社會呢？抑是既封建化了，又資本主義化了的一種複合性質的社會呢？在過去一兩年間，國內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很有一些爭論。不過，這時，參加論戰的人數還不多，而參戰者，也還未正式短兵相接，一種前哨的引戰罷了。到最近，據說，這論戰，將擴大範圍，並且，參戰學者諸君，將把讀書雜誌做戰場，各各大顯身手。論戰看看要白熱化了，我們觀戰者也感到有幾分緊張。

玄科之戰，是五四運動後，科學精神逐漸伸張起來必然的結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是近年來革命碰壁，致一般人懷疑革命，因而回頭探究革命對象之必然的結果。這兩種論戰，各有其時代背境，各有其獨特意義。不過，前者專屬於學術的範圍。而後者則不免因學理的論爭，而牽涉到實際政治方面，這是兩者性質上顯著不同的地方。再，玄科之

戰，學者們雖各擎旗幟，號於有衆，但在一般青年學子，究不甚關心，況玄學者離奇吊詭之談，所引愈博，所窮愈晦，而對於青年學子迷醉的力量却愈弱。若這次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其影響就兩樣了。目前政治上的紛擾，一般直接感到切膚之痛的學生，已在苦悶的摸索了，他們正切望有一種清新的理論出來，作他們思想的嚮導，作他們將來從事實際活動的指標。所以，在這次作戰當中，參戰者應特別小心慎重；爲了攻擊而攻擊，爲了作戰而作戰，那不獨沒有意義，且恐給予青年以不好的影響。

在我，一向對於中國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是頗爲隔膜的，至少，是沒有一種清晰的觀念，或正確的認識。我也和其他的青年學子一樣，正渴切等待着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指示。所以，論到參戰，我是沒有資格的。我寫這篇論文，目的在泛論封建制度的性質。其中也許不免涉及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吧，但，那是附帶提到，頂多，是當作觀戰者的感言提到。我自信不是怯戰，但自信非鬥士，且無戰鬥力也。

## 二 封建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不拘什麼問題，在實際，儘管是非常明白的吧，一導入

理論領域，就異說紛拏，似乎不可究詰了。並且，實際上，彼此的意見，雖漠然無大出入，到了理論起來，却便硬像是尖銳的對立。名辭之眩惑學者，抑學者之捉弄名辭，姑且不問。在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對於封建制度這個用語，是應當費一番研究的。

大英百科全書中解釋封建制度說：“封建制度之關係，以封土 (fief) 為基礎。所謂封土，通常皆屬土地，然亦有以他物為分封之資者，如職位也，金錢貨物之收入也，徵稅之權利也，開設磨坊之權利也等是。受封土者，隸身於其主人，而為其附庸。……附庸之能保有其封土而享其權利者，即在誠實履行其稱臣時所允負之義務。彼果能盡其義務，則彼及其子孫，永得以封土為其財產；而同時對於其所屬佃戶，又不啻為實際上之地主。稱臣受職之儀節，為封建制度契約之起點，兩方所負之義務，普通無特別規定，但就當地之慣例決定之。”(參照世界史綱譯本下冊五三九面)

由上面這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得出封建制度的幾個特徵。

第一，封建制度主要是以封土為基礎。

第二，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保有一種從屬關係，且負有



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如爲主人謀利益，爲主人守祕密，爲主人防衛堡壘等。

第三，領受封土時，須經過一種稱臣受職的儀式。這種儀式，乃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之服從關係的開始，同時也正是對於其領有關係的開始。

第四，受封者得以封土爲財產，永遠傳授於其子孫。

第五，封建制度最注重等級。首長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從者。從者對於附庸的從屬關係，一如附庸對於其首長的從屬關係，其發展形式，如金字塔然。

以上這五個特徵，雖就歐洲封建制度之體制而言，但推之於中國所謂封建制度，表面上亦似無大出入。不過封建制度一辭，原係對於一系列事實所加之概括稱謂。換言之，不過理論上之方便說法耳。如必謂封建制度爲一種實際有秩序有系統之制度，却未免遠於事實。所以大英百科全書上說：  
“吾人之用‘封建制度’一語，爲便利計耳，若謂其含有系統之意味，卽爲失當。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其爲物也，實一種略具組織之混亂耳。各地所流行者，頗不相同，故無怪各封土間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同上）

單就歐洲而言，各地所流行者既頗不相同，各封土間既

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則封建制度一辭的實際含義，就頗費解釋了。在歐洲如此，在日本如此，在中國亦如此。吾人如欲執此因時因地而異其含義之抽象術語，以繩墨中國社會，自無怪主張中國社會尚為封建社會者，振振有詞，而力說中國社會為非封建社會者，亦言之鑿鑿也。因此，吾人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單在字面上解釋，必進一步考察該制度在各該社會所形成的實況。歐洲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然後返觀中國古代之封建制度，比較其異同，參驗其變遷演進之跡象，庶可瞭然於封建制度之本質，而尚論中國現代社會。

### 三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其崩潰

歐洲之封建制度，係發生於西羅馬帝國之廢墟上，而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第一，當西羅馬帝國崩潰時，時局混亂，匪盜橫行。個人之生命財產，一無保障。由是人皆迫而依附較己為強之人以自保。蠻夷之酋長，強大之主教，羅馬舊時之官吏，竊位攪權之奸人，擁有土地之地主及世家望族等，皆成為時人依附之中心。其他若自由民或墾地褊小之貴族，則選擇較若輩為強大者而附屬之。諸侯之附庸益衆，

則其保護之能力益強。保護者與隸屬者之自然結合，發達極速而成爲一種制度，是即所謂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在蠻族侵入西羅馬帝國以前，此種制度已在高盧境內，頗有進步。不過，一種體制完備之封建制度，則是見於法蘭克人侵入高盧以後。

第二，當九世紀時代法蘭克人已成爲高盧的征服者，其王乃以征服地大部分割歸自領，而將殘餘部分分給有功諸臣。其後阿剌伯人來侵，王權日趨衰落。時有執政大臣加爾·馬丁，鑑於阿剌伯人之侵擾不已，乃改革王國之政治組織及軍事組織，以王畿領地大部，分封功臣。受封者的義務，於平時則練兵養馬，戰時則爲王効忠。在當初裂地分封時，封土原非世襲，迨王權侵削，世襲遂由僭領而演爲慣例。王以國土分封國內大諸侯，結爲君臣關係，大諸侯又以封土分給其下級者，結爲隸屬關係，推而至於僧侶，亦依樣畫蘆，割其寺領。於是封建制之範圍擴張，而其體制乃漸臻完備。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知道：封建的體制，雖然是這樣秩然不亂的，組成了一個體系，但實際的情況，殊不如此。各諸侯間，各領主間，各僧侶間，排擠離合之狀，實司空見慣。小侯不能自存，以領土貢獻君主或大諸侯，而結爲君臣關係者

有之。僧侶不能自存，以寺領拱奉貴族，而結為隸屬關係者有之。加之，畜牧部落一經進入了原始封建國家，經濟的分化，便因領土的定住和私有制度的成立，而益加顯著。這時，因為地廣人稀，每個人尚不難由廣漠的未墾土地中，盡量取得他所必要，所願得，所能耕的數量。唯其如此，所以當時鬥爭也，分讓也，攘奪也，雖說是爲了土地，同時還更是爲了農民。農民粘附於土地之上，從事勞作，有了農民，領有者爭奪的目標即地租，纔可由土地生長出來。不過這所謂農民，不是自由取得土地，自耕而食的自由人，而是一般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僕役奴隸，和擄掠回國來的無土地的農民。所以奧本海末爾說：“公侯帶領有僕役及奴隸……但是僕役奴隸們是沒有法律地位的……他們不能夠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因他們必需土地以爲生，他們的主人便替他們取得土地所有權，使他們定居於其上。其結果，游牧部落的公侯愈富，則他所變成的土地領土愈有權力。”又說：“從此以後，封建國家的對外政策，不復趨向於取得土地與農民，甯趨向於取得無土地的農民，擄掠回國以爲農奴而重新移植之。”（見陶譯國家論一三八——九）農奴愈多，則所收地租愈多。地租愈多，則愈能畜養戰鬥的扈從，而增大其勢力，而兼併其他

的封領。總之，封建制度就是在推行甚廣，形式上極稱完備的時候，大役小，強凌弱，割讓兼併之事，猶層出不窮。無怪大英百科全書上說：“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

這制度在歐洲，以第十世紀為其極盛時代。法蘭克國開端於前，繼而行之者，有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陸諸國。此後還推行於英吉利。然自十字軍興，社會經濟方面發生根本變動，而各國封建制度，亦遂因而崩潰。吾人夷考當時封建制度崩潰之原因，蓋不外下列各端。

第一，封建諸侯領主，跋扈專橫，入民不堪其剝削侵擾，正待乘機起而反抗。

第二，諸侯領主勢力日盛，國王時時感到威脅。為要抑制領主，恢復王權計，國王遂利用當時國人嫉惡領主之心理，竭力扶植其勢力，使與領主對抗。凡以前給與領主們的種種特權利益，現在轉以給與有組織有力量的人民團體——特別是市民團體——由是領主之勢日蹙。

第三，十字軍興，一般流氓無賴，不重朝而變為騎士，品類不齊，騎士之聲譽乃大減。加之，軍興不已，領有封土之諸侯騎士，乃不得不迫而出賣其封土於普通人民，結果，封建

之基礎，遂發生根本動搖。

第四，封建之支柱，爲具有戰鬥力。能捍衛封圉之騎士。自第十四世紀火藥銃炮發明，騎士遂頓失其在社會上之地位。從而封建制度就不免因騎士失勢，而益形薄弱其存在之基礎。

第五，十字軍就一方面言，雖爲破壞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又爲建設的。因爲大規模的遠征軍，由西方一再運往東方，東西的交通，從而，東西的商業，乃際遇時會，而有捷足進步。富之蓄積增進，交通貿易發展，於是工商階級之勢力抬頭，而封建制度之弔鐘響矣。

歐洲封建制度發生發展及其崩潰之情形如此。現在且進而考察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

#### 四 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

日本之封建局面，始於源賴朝之開鎌倉幕府，而終於德川幕府之倒壞。前後蓋經歷七百餘年。不過，在德川時代以前，史家稱爲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而稱德川時代，爲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

日本封建制度之確立，表面雖說起於源平二氏之政權



爭奪，究其實，要不外由於社會經濟狀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方面之動亂，不過指示經濟進路上又碰着障礙罷了。

日本古代施行氏族制度。皇族爲一最大而最尊貴之氏族，以天皇爲之長。全國佔有相當土地，擁有相當奴隸，而爲史家稱爲部落之大氏小氏，則均受治於天皇。往後，因時勢推移，各氏族利用奴隸，開拓新境，同時，大氏又兼併小氏，其勢益張。爲挽救此混亂局面，遂有大化新制之頒布。新制禁止土地私有，解放技術奴隸，並將身分與官職區別，簡派國司郡司治理地方政務，是即所謂郡縣制度。郡縣制度實行的結果，國司郡司因遠離朝廷，且乘國家多事，乃私自豢養奴隸，私自墾殖土地，一時地方豪強及中央權貴，尤而效之，卒乃開莊園之風氣。莊園有大有小，大者兼併小者，小者依附大者，私相割讓吞併，無有甯日。結局，朝中最有身分最有勢力之貴族藤原氏，乃得從容統一宮廷諸貴族之莊園。並憑其守衛武士，對於地方豪族大張撻伐，於是強者被鋤，弱者請附，天下莊園，儼然由藤原氏造成了一統一局面。而同時國司郡司輩在各地方無情的榨取，人民生活不得，乃相率棄離鄉井，流歸那些以藤原氏爲中心之權門的莊園。就這樣，他們成爲自由勞働者了。一方面開墾荒地，一方面耕作熟田，

較之屈伏於國司或地方官吏之下，不知道要自由好多，舒服好多。這樣一來，國司支配的戶口，既日益減少，公田也就一天一天疲敝起來，由是，以奴隸為中心的經濟組織，完全解體，而以土地為中心的經濟組織，乃逐漸形成。不論是中央權貴，或地方豪族，他們再也不甘心沒有勞働者可用了，所慮的，是土地搶不到手。所以，從經濟的觀點說，氏族制度郡縣制度的基礎，是奴隸資本制度，而封建制度的基礎，則是土地資本制度。土地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既徐徐起而代替了奴隸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而孕育於氏族制度郡縣制度母胎內的封建制度，也就必然要應時脫穎而出了。

不過，在土地資本制度發達的初期，封建制度的實體，也不見完固。所謂分權的封建制度時期，嚴格說來，不過郡縣制度轉到德川集權封建制度中的一個過渡時期耳。日本封建制度之完成，實始於德川時代。

德川氏封建制度下之支配階級，全為武家。就中如幕府，如大名，如旗本，御家人等，要皆為支配階級之中軸。此外，相當於歐洲騎士地位的，還有一般武士，或即所謂藩士。

德川幕府，實為此等支配者中之支配者。從社會的立場說，這幕府就算是日本邦土中的大國家，大盟主或霸者。從

經濟的立場說，牠又是大地主，大產業管理者。至若相當於諸侯地位的大名，牠亦有其特異的支配權，牠是次於幕府的國家，大地主或產業管理者。

就法律的觀點言，德川氏不過一官吏耳，其上尙戴有天皇。但考其實際，德川氏實全國唯一的支配者。關原大勝而後，全國大名，皆俯首唯命是聽。以前一萬石以上之大名二百一十四人，總石額爲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三千二百石，德川家康乘戰勝餘威，削去大名二十六人，併減少總石額一百四十五萬一千一百石，而幕府所領，則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增加至五百萬石。幕府之勢益大，而諸侯浸削矣。計德川氏掌幕僅二百六十餘年，大名(舊有者及新封者)因種種口實失脚者，已有二百八十九家之多。可是，德川氏一方面雖發揮威力，使集權封建制度有很好的成就，無奈封建制度崩頹的徵候，却正在這“很好的成就”中，呈現出來了。這種徵候可得而言的，約有左述各點。

第一，在封建制度下，以土地爲唯一生產資本，以農業者爲唯一生產階級。農業者的運命如何，封建制度便直接蒙其影響。德川氏柄政以後，對於農事所採的是一種農業本位政策，而非農民本位政策。農民的大業，祇在耕田出賦。國

家財源既完全取自農業方面，所以使農家爲盡此義務計，舉凡農事以外的一切知識，農民素朴生活以外之一切享受，皆非嚴厲禁絕不可。農民陷在這困苦壓制的境地，又益以不時的兵災水旱和過重的剝削，所以，不得不離鄉別井，或流爲浪人，或成爲城市的小工業者，結局，農村荒廢，封建制度乃受到致命打擊。

第二，在莊園發達期內，各莊園領有者，皆於適當地方，建築堡壘，以備敵侵攻。嗣後強吞弱，大兼小，領有之範圍愈擴，而領有者駐節所在，不獨爲其勢力集中之地，且爲一般經營小商業小工業者輻輳之所。積之以漸，而都市興焉。又，前述備受壓迫，以致離棄農村之農民，大都皆麇集於市鎮。市鎮人口增加，從而，小商業者小工業者需要的增加，一方面鄉村棄業者，固可得到出路，而同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亦漸有發達機運矣。

第三，各城鎮各市集之商業增進，結局，勢必要擴大商業範圍，使各城市間交互進行貿易。特交通不便，和對於金錢剝奪的障礙，往往不免令一般商人裹足。爲解除此困難，適應此需要計，於是國內金融匯兌制度發生。此匯兌資本制度，合前述商業資本制度，高利貸資本制度，而概稱爲貨幣

經濟制度。貨幣經濟制度與土地資本制度，乃不得不由變動而趨於崩潰。加之，

第四，封建制度之支柱，實為武士階級。武士以義勇精神，為幕府諸藩効力，幕府諸藩則贍給其生活，以資酬報。德川氏中世以後，藩府之財政，異常窮乏，益以農村凋敝，賦稅無着。於是武士輩之生計，乃因而發生問題。這時，農民窮，藩府窮，告貸無門，勢不得不低頭於他們素所賤視的町人階級之前。町人階級不獨是武士的債權者，且為農民乃至藩府的債權者。他們生活闊綽，趾高氣揚，而一向尊貴，榮譽，莊嚴的武士豪貴，却反而相形見绌，暗然無光了。社會的視聽，都集注到了町人身上，從而，社會一般的傾向，也就無形離開了古舊的達官貴人，而竭力把自己變做此新興資產階級之一員了。

第五，到了德川幕府末造，內患外憂紛至沓來了。為要安輯國內的災黎，為要鞏固邊防的軍備，財政遂愈加不可收拾，而一般武士的生活，乃愈益陷於絕境了。要打開這當前的難局，一部分下級武士們已覺到非別圖發展不可。所以在勤王倒幕運動當中，他們一方面順應當時的大勢，一方面依着町人階級的支援，居然成就了那回天偉業了。

綜上五點，要不過說明了一件事實，即，在土地資本制度母腹裏，既逐漸孕育好了貨幣經濟制度——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匯兌資本制度之總稱——所以時機一到，建立在土地資本制度上的封建制度，就不免隨其下層建築——土地資本制度——的崩潰而倒塌下來。因為伴隨封建制度而發達起來的生產力，已與這種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衝突了，換言之，原來促進此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現在已反過來成爲其發展的桎梏了。當着這種關頭，要想生產力橫受桎梏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祇有讓那能夠容納而且促進此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這舊生產關係——封建制度。

日本的封建制度，就是這樣依着必然的經濟法則而崩壞了的。

## 五 中國封建制度之分解

中國的封建制度，自何時始，至何時終，這個界線不劃分清楚，必無從把捉住中國封建制度的真相。但要劃分這個界線，又不免惹起許多爭論。因為有的人說，中國封建制，起於黃帝時代，周之封建，不過折衷夏殷諸代而定妥的吧了。



日本高桑駒吉云：“中國之封建制，據云起於黃帝之時。黃帝之爲天子也，大約一面令那些歸服了的各部君長使各安於其舊領土；一面對於那些有功勞的，各各分給以征服地。於此，我們纔認出了封建制度來。世言舜定羣后朝覲之制，又言夏禹王爲塗山之會時，執玉帛者萬國，又言武王伐紂時，諸侯之來會者八百，那麼，我們便可知道唐虞夏殷之世，也是在行封建制，所以中國的上世，封建制已行得很久。周之封建，是折衷夏殷遺制而定妥的。”（見李譯中國文化史第三五——六面）此說當否，容後再行論及。而在另一方面，現在又有人說，中國迄今還是行着封建制度。若是，中國自古至今，就澈頭澈尾是一個封建的國家了。爲避免理論的混淆，我關於這點，也暫不欲置辯。言中國封建制度，以見於周室者爲代表，更進，以周室施行的封建制爲標準，來衡定周以前是否有封建制存在，周以後是否尙爲封建社會，我想，這總該是可以的吧。而且，要把中國的封建制度，與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比較，也非先提出一個標準的中國封建制度不可，換言之，說是非對於周之封建制度，加以檢討不可。

周武王伐紂成功，卽位天子後，乃採用封建制，大封宗室功臣及前代帝王之後。其制，係將諸侯分爲公，侯，伯，子，

男五等的爵位。公侯與以方百里之地，稱大國，伯與以方七十里之地，稱中國，子男與以方五十里之地，稱小國，不滿五十里者稱附庸，使隸屬於大國。大國置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中國置二軍，小國置一軍。又中央地方千里，是爲王畿，以充王官之采邑。計大國九，中國二十一，小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而畿外五國爲屬，二屬爲連，三連爲卒，七卒爲州，天下共分九州，州有伯，卒有正，連有帥，屬有長，使之制馭地方，故周之初期，有謂諸侯之數，凡千八百國云。

周室把全國土地，依着這個制度分給大小諸侯。但各諸侯對於其所轄境內的人民，保有怎樣一種關係呢？申言之，人民是在那種形式上對於諸侯曲盡其課加的義務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周之田制及其稅法，窺知一個大概。

田制在夏殷以前，無可稽考。太古時，田野未闢，人民各自開拓其土地，故土地或係私有。此後不知在何年代，土地悉收入官，然後再轉貸與人民，於是納貢賦而班田收授之制以起。夏行貢法，以田五十畝爲一間，以十間爲一耜而授之十家，使各各上納其五畝之收穫。殷採井田制，行助法，將一區七十畝之田九區卽六百三十畝，區劃成井字，以中央的一區爲公田，其餘皆作私田。凡八家，則與以一井之田，使共耕

公田，而以其收穫上納。至周，乃折衷夏殷之制，而行徹法。其法與殷大概相同，不過周之井田，每區爲百畝，每井爲九百畝。人民年二十，則受田百畝，至六十乃歸還其田，次子稱餘夫，年十六即受田二十五畝。田制之崖略如此，再看其稅法。

周之稅法，有種種名色。其由公田收穫納入的，稱爲粟米之征；別有令納絹布若干的，稱爲布繆之征；又每年使用人民爲夫役，則是力役之征。此外又有所謂山澤之征，漆林之征等等。這一切稅收，都是人民照例貢獻諸侯的。

中國歷代法制，以周爲最完備。其關於封建設施，若網在綱，秩然有序。吾人今日看來，猶不能不承認其嚴密而整秩。但制度之體制雖如此，實行起來究竟是怎樣呢？

西周盛時，王權大張，所謂封建制度，一時或曾如實施行。然武王封分之後不久，其親弟管叔蔡叔即輔紂子武庚以叛，弄得周公居東三年，方始蕩平。這是成王時事。成王之後爲康王，康王之世，海內尙稱乂安。可是一到昭王穆王，周室就開始衰微了。厲王爲國人所逐，幽王爲犬戎所弑，王權之失墜，已可見一斑。陵夷至於平王，竟因戎狄的威逼，而東遷洛陽了。不過，王室雖然一天微弱一天，有些諸侯，却正乘

着王室日微的機遇，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了。周之初期，諸侯差不多有一千八百之數，到了春秋時代，大併小，強兼弱，看看只剩下一百六十餘國了。往後，周室益加不振，諸侯就益加攘奪兼併得厲害。以子爵僭稱王者有之，以侯爵降為男者有之，降及戰國之世，所餘者僅七強國及二三小諸侯而已。前此謹嚴之封建制度，早已完全破壞無餘了。

不過，周室之衰，雖不免予衆諸侯以兼併攘奪之機，致封建制度趨於崩壞，但周初千八百諸侯，至春秋時只剩百六十餘國，至戰國時更只剩七國的這個迅速遞減過程，就王室集權的封建制度說，雖在日益崩毀，可是就諸侯分權的封建制度說，却又無妨說是在長足的發展。由千八百國併合而為七國，其勢力膨脹，該是何等雄厚。然而這種“成也毀也”的經過，都是表面的，限於政治方面的現象。若一探究當時社會經濟變遷之實況，我們就知道封建制度之不能維持，那是有牠必然的命運的。現在且就左列諸點，加以說明：

第一，周之封建制度，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制即所謂井田制度為基礎。井田制對於封建制度有幾種作用：一，土地公有，按人分配，農民乃不致因過富過貧，離去鄉井，使諸侯賴以生存享樂之稅收無着；二，獲取公田收穫，作為粟米之

征，乃最省事之稅法。三，周之兵制，即以井田爲準。比如王畿地方千里，約可得井田六十四萬，卽一萬甸（六十四井爲一甸）。而方里爲井（八家），四井爲邑（三十二家），四邑爲丘（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五百十三家）。當徵集時，以丘與甸爲基礎，則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夫二十五人，總計凡百人，故天子有兵車萬乘，號稱萬乘之君。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云云，要皆依此計算。總之，井田不獨爲封建諸侯所託命，且能在徵兵取稅上，給予封建諸侯以極大的便利。然自兼併攘奪之局面成，井田乃日趨破壞。下逮戰國，魏李悝昌言盡地之力，秦商鞅更乾脆的廢井田，開阡陌，各國尤而效之，於是井田之制蕩然，而封建之步調亂，封建之根基動矣。

第二，不過，井田制度對於封建諸侯之徵兵納稅，雖有不少的便利。但同時對於封建諸侯任意徵兵，任意收稅，却又似乎成了一個妨礙，所以他們也樂得把這種制度破壞完事。可是，井田制破壞之究竟的結果怎樣呢？其一是封建諸侯對於其被剝削者農民的直接榨取關係，開始隔離，在他們兩者中間，插入一個專以聚斂爲事的中間層，有如陪臣宰官

之類，往後，封建諸侯的兵力財力，就完全操在這般人手裏了。他們一有機會，立刻就能夠把封建諸侯推翻。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基於這種事實。此外，還有一種結果是：諸侯間無有止息的戰爭，固然怪不得他們對於布粟之征，力役之征，分外強制的苛求，但井田制既壞，那些陪臣宰官對於農民的苛求，就加倍厲害了。因為，他們一方面要多徵多收，以取悅於其主人——封建諸侯——同時又要多徵多收，以爲自己中飽。這樣下來，農民除了死，就只好跑了。所以“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到後來，諸侯輩的錢糧兵馬，也無出處，秦之得以兼吞六國，這當然是一部分原因。

第三，封建諸侯們的相互構怨，相互混戰，爲了什麼呢？很顯明的，“闢土地”，或者“爭地以戰”，“爭城以戰”。“有土此有財”，這是他們的口號。不過，依我想，春秋時代的戰爭，主要雖是爲了土地，到了戰國之世，小國變成了大國，對於土地一層，似乎不甚急切。要緊的還是耕植土地的農民。當時載籍，雖不見“爭民以戰”之文字，但各國諸侯對於“民”的要求，却是非常緊迫。梁惠王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由這一問，我們就知道他是在如何努力“爭取人民”。孟子是一個頂會觀風講話的人，他很了解各國國情和時君心理。他不論見了梁惠王，齊宣王或滕文公，總是大講其保民的仁政。並且鼓勵時君說，王欲行仁政，則“民之歸之也，如水之就下”，或者：“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立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大意如此，記不清原文——南）總之，當時諸侯，已十分感到無民之痛了。但他們欲固其封圉，或欲闢土地，又只有盡量搜括現在的農民。農民日益減少了，他們的搜括却並未減少，甚且要增加。結局，民益窮，財益匱，待到變法圖強，休養有年的秦兵一來，封建諸侯的命運，就於是乎終焉。

第四，封建諸侯們無止息的爭奪戰，對於農村雖破毀備至，但對於商業，却有不少的貢獻。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一，封建制度的社會，最重等級。左傳昭公十年，芋尹無宇說：“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攸，以待百事。”又管子云：“士之子恆爲士，農之

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這種階級制度，不僅決定了一個入本身的命運，並且連其子孫的命運也決定了。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是重農輕商的。商人的地位，當可想見。但自諸侯輩爭奪起來之後，存亡興替，就沒有定準了。昨日的公侯，今日說不定變成了窮光蛋，今日的窮光蛋，明日說不定要成爲大人物，餓牛的富戚，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鄭國商人弦高，不都跳上了政治舞台麼？總之封建的階級，是漸漸打破了，一向被人輕視的商人，這才抬起頭來。不過，徒是這種心理的改變，還不夠促進商業。二，古代商業，都爲現物交換性質。迨封建之局面成，百里一大國，五十里一小國，國境的限制，又加以交通的障礙，所以商業只限於小的範圍內，頗難發達。自各國兼併起來。國境既經擴張，商業範圍，亦隨之拓展。而且軍事對於促進交通，甚有效力。交通便，範圍廣，商業游刃有餘地了。加之，三，當時農民被迫離鄉者，一部分死於溝壑，一部分變爲匪盜乞丐，還有一部分則聚集城市，借點小資本，經營小工業小商業。城市人口集多了，且爲浪費的統治者駐節之所，無怪商業很快的發達起來。商業資本的膨脹和高利貸資本的流通，那已經表示封建制度所由建立的土地資本，失其原來的作用了。結局，封建社會的解體，就

成了一種必然的現象。

上述四點，我看，已夠解說周代封建制度崩潰的原因了。在根究中國資本主義，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並確認中國現代社會，是否仍爲封建社會之前，我想先把中國的封建制度和歐洲日本的封建制度，一加比較。

## 六 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日本封建制度之比較

歐洲的封建制度，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其成立，發展乃至崩潰的軌跡，我們已在前面分述其梗概了。現在要大略加以比較。怎樣比較呢？先抽出這三種封建制度的共同點，然後再看中國封建制與日本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又，中國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有什麼不同。比較的結果決定了，再進而論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的原因，這樣，我覺得是一瀾必應遵循的順序。

(1)三種封建制度成立，發展及其崩潰之共同點。

A.在體制上雖然完整，在實行上則非常混亂，這是三種封建制度大體相同的。

B.三種封建制度，均建立於土地資本制度之上，而以土地資本為其經濟的基礎。

C.領有土地者，均圖擴張領地，增加收入。所以相互侵攻，演成混亂局面。（不過，德川柄政以後的日本封建局面，略有不同。）弱者受併於強者，強者又受併於最強者。

D.戰亂不已，剝削榨取益甚，農民或農奴不堪其苦，乃相率離棄鄉井，結局，農村荒廢，剝削者亦慘遭打擊。

E.封建制度成立之始，最重等級，以後戰亂相尋，興替日有，於是等級之制蕩然，而封建制之支柱又折了一個。

F.在社會多事之秋，農業雖然破產，商業却緣以崛起，（原因均見前，茲不複贅）。默化潛移，貨幣資本制，已暗中代替了一向土地資本制的重要地位。封建制度於是乎告終。

## （2）中國封建制度與日本制度之相異點。

A.中國周代以前，如夏如殷的牧伯羣后，略與日本氏族制度下之氏族相當。但中國至秦廢封建而為郡縣，日本則是由郡縣制改為封建制，往後又廢藩置縣。

- B. 日本封建制之發展，是由分權的，趨於集權的，反之，中國則是由集權的趨於分權的。所以日本封建諸侯，漸為幕府所削弱；中國封建諸侯，則因兼併而益大。
- C. 日本保衛封建諸侯的，有分地食祿的武士階級；中國封建諸侯之武力，則是由徵集而來的民兵。
- D. 日本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是稱為大名，旗本等的武家，他們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中國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在前也是封建諸侯自己，往後井田制破壞，他們就不能不把這麻煩的職務，委託其代理人了。大約所謂‘宰’，所謂‘陪臣’，就是指着這些傢伙。
- E. 日本封建制破壞，外人勢力侵入，加了一番刺激或力量，中國封建制之崩潰，則純由於內戰變動的結果。
- F. 日本在封建制度發展中，不但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發達，匯業資本亦頗發達。但中國當時因貨幣尚極幼稚，故不聞有匯業資本存在，同時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亦因此大受限制。

### (3) 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封建制度之相異點。

- A. 中國的封建諸侯，歐洲的封建領主，同樣是依存於土地，而吸取農人的勞働剩餘價值。但中國這般勞働

者，是計口受田的自由農民，在歐洲，却是原來的奴隸，和擄掠得來的敵人。因此，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就是土地制和農奴制。領主的收入，不是取決於其所領地的面積，而是取決於其農奴數。這與中國井田的封建制度，是絕不相類的。

B. 歐洲封建制度下，有一個和日本武士地位相當的騎士階級；也同日本武士一樣，他們食祿受土，駕凌於農民之上，而為其寄生剝削者之又一個特殊羣。若中國，則沒有這個階級存在。諸侯們有必要時則徵農入伍為兵；公事畢，兵又返鄉為農。

C.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是由於西羅馬崩潰，人民無法律保障，乃羣相依附豪強世家望族以自保，依附者多，保護之力益大，於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新的秩序，即所謂封建制。若中國之封建制，則是起於天下大定後之一種政治設施，所以歐洲初期的封建制，是分權的，中國周初的封建制是集權的。

D. 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歐洲的商業範圍擴張到亞洲了。中國封建諸侯不斷內鬪的結果，如前所述，商業是有了發展。但在大體上，却仍不免是鎖國的。



.....

在上面，我已把中國，日本，歐洲之封建制度的相同相異點，大略比較過了。現在，我要進而根究：中國封建制度崩壞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何以不能接着發達起來？

## 七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 原因

歐洲封建制度崩潰後，接着就是重商主義的天下，商業資本之發達，那是無待細說的。往後重商主義之惡影響，雖曾引起重農學派的反對，但近代式的工業資本主義，却就在重商主義發展的基礎上發達起來了。

其在日本，那種發達是更為迅速的。日本封建制度隨着廢藩置縣而宣告終局以後，她那孕育乃至成就於封建制度下的貨幣經濟制度，不久，就讓渡其支配的地位於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了。

歐洲由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過渡到工業資本，約計起來，不過一兩百年間事，在日本，這個轉變，竟在幾十年內完全成就了。中國怎樣呢？

如前面所講的，秦併六國，變封建而為郡縣以前，中國

的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不是已有相當的發達麼？固然，“由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所形成的貨幣資本，要轉化為工業資本，在鄉村，會受封建制度的妨阻，在城市，會受基爾特制度的妨阻。”（英譯資本論第一卷八二三面）但中國封建制度既經破壞，基爾特組織又無何等勢力，宜可早速轉化為工業資本國家。然秦後至中英鴉片戰爭以前，歷二千年，仍沈滯淹留於商業資本狀況下，而莫有起色。這原因，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曾有種種說明。但我覺得，以次諸點，確是妨阻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要因。

第一，缺乏外來有力的刺激。歐洲姑不具論，日本之迅速成為工業國家，主要是由於“黑船”之汽笛，驚醒了她的昏夢。她一方面受歐美物質勢力之威脅，一方面又為歐美物質文明所迷醉。所以，一經由衝動而企圖維新，歐美成法俱在，模仿就得了。封建破壞了幾十年，就有這樣的成果，她不能不歸功於西人。中國四境，向為一些游牧部落的民族。他們動不動侵擾進來，搶奪什物財寶。他們是野蠻的，與他們接觸一次，除了一些惡印象外，就是增大自己的傲慢，或者說，助長我們自己不求進步的暮氣。元代馬哥孛羅東來以後，至明時復有利瑪竇艾儒略等踵至，而中國東南海岸，且有葡萄

牙人之經商。不過，那時西洋的物質文明，尙未十分發達，雕蟲小技，實不夠折服我們。總之，中國所以長久停滯於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狀態的，沒有外來有效的刺激，也算一個要因。

第二，傳統思想妨害自然科學發達 自漢武帝崇尚儒術，罷黜百家以後，中國學術界全以孔子之思想為思想，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固然，推崇孔道，既已是由於當時的客觀趨勢使然，但孔道推崇的結果，却把那種趨勢變得更僵了。孔子不言利，不講力，更聽不起形下之器，尊孔者遂變本加厲，排斥一切物質文明了。謬種相傳，演為故智。直到明時，大儒紀曉嵐對於利瑪竇之二十五言猶說：“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幻變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又對於艾儒略之西學凡說：“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不可究詰：是所以為異說耳。”對於這異說，這位先生又有幾句案語曰：“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朝廷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有深意。

……”曰‘異端’曰‘異說’曰‘器數之末’曰‘支離神怪’，所以‘禁傳其學術’。不過，我們應知道，這並不是紀先生個人的意思，中國的聖人之徒，全是如此想法。他們對於技術科學，既具有這樣的成見，誰個還肯冒大不韙去研究牠呢？科學技術不發達，工業方面當然難得有何等改進。

第三，沒有獎勵工業的政策。這一點，與前兩者是密切相關聯的。中國統治者的統治術，一向是請教儒者，儒者又老是那一套意見。加之，鎖國幾千年，從沒有一個有力刺激，使其向工業方面注意，所以工業政策這類字樣，從不曾在統治者的治國大經中出現過，但發展實業，又非有政府的協助獎勵不可。日本工業發展之迅速，雖說有西洋為其仿效的榜樣，但政府督勵之功，實關重要。獎勵金補助金之設置，實業公債之發行，實業專門人材之造就，保護關稅之實施，銀行制度之改善，舉凡一切便利工商促進工商之事項，無不努力推行。日本之有今日，固非偶然也。

第四，土地投資之普遍化。井田制破壞後，土地之流動性異常之大。經商發財的，做官發財的，苦於錢無用處，只好買土地；農民因兵災水旱弄窮了的，貴族官僚因政變或浪費陷於困境的，若有了土地，就只好賣土地。土地買賣之風盛

行，對於實業發展，為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為資本都向土地上了，實業方面，就沒有發達的可能。可是一般人為什麼不肯向工業上投資，却把資本購置土地呢？這因為是：一，中國社會是常常發生動亂的，而中國戰爭的目標，又多半是在“取城”或“占領城市”，至若城市以外的地方，那不過經過一下罷了，攻者守者，都不在乎。小工業商業都在城市方面，而且工商業的財產，又沒有土地那樣穩妥確實，所以中國商人一發了財，他除了用以放債取息之外，就把大部分資本拿去購買土地，甚至連商業也不幹了。至若利得微薄的粗製造業，儒者固然恥之，商人亦不屑就也。二，土地可以裝飾門面，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縉紳先生是要土地的，因為未達時，他可藉此過隱士生活，且可藉此武斷鄉曲。在朝的達官貴人也是要土地的，因為一旦“致士”或下野，便非有莊田別墅無以保持身分。商人的地位，本不大高明，有了土地，他就可伍於儒林，威加有衆。三，中國土地的產出量非常之大，多半的土地，每年可以收穫兩度乃至三度。加之中國統治者對於農田水利，向頗注意。產額加大，地租必多。有利可圖，無怪人皆樂於投資土地。四，在中國，高利貸的風習，與購買土地的風習，同樣普遍。究其原因，這兩者實有相輔相成的關

係。因為購地收租，即可抽出高利貸的資本，高利貸的結果，借方——一般農民及少數窮貴族——愈益貧困，卒至以其土地作為抵償。達官貴人——中國達官貴人放債的事例頗多——商人，都是有錢出借的，所以他們結果都成了大小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與土地投資資本紐結一團，對於工業發展遂成了一個有力的阻礙。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因，或不止此，但主要原因，總不外這幾點。

## 八 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 之無根據

要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論證者一定有所根據，申言之，他一定是把過去中國歐洲或日本實行封建制度時代的社會實況，來與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比較，比較的結果，他發現了：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簡直與那時一般無二，至少是大同小異。於是他斷定，中國今日，尚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尚是一個封建社會。

我很盼望他的結論是這樣推論出來的，因為要這樣，我們才有話可說。如其他離開事實，於上述三種封建制度以



外，擬想一種與中國今日現狀相類的體制，而稱之曰封建制度，然後再用以確定今日中國爲一實行封建制度的封建社會：那方法，對於他當然是很有效果的，但對於學理沒有幫助。不幸得很，今日中國竟有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採用這種方法，所以論來論去，總沒有抓住要領。

歐洲有歐洲特殊的封建制度，日本有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中國亦有中國特殊的封建制度，這，我在前面已比較過牠們的同異了。歐洲人日本人以他們各別的封建特型爲根據，來考察今日中國的社會，並指證今日中國尚有封建制度存在，那也許有他的理由，或者有他的必要，用不着管。但生而爲中國人，照理，總得把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來做根據吧。況且，即使抽扯東洋西洋所有封建制度的特徵，來比附中國現代社會的實況，那除了張冠李戴之外，也是一樣柄鑿不入的啊！

現在，姑且假定一切中國社會之尙論者（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於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有相當認識，都是以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爲根據。但推論下來的結果怎樣呢？在我想，他們總該承認：今日中國實沒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並非封建社會。如其他們硬抽出了相反的結論，那，我

就只有驚怪，只有說他們沒有根據。

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我在前面已論述其大概了。此刻，我還想就其主要特徵補述幾句。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是無可徵考的。但由唐虞以後至西周之初，那又是完全靠得住的麼？關於這點，現在正有許多學者在懷疑；從而，周初那個秩然有序的封建制度本身，究否存在過，實施過，也就發生問題了。不過，為避免理論支離起見，這裏無須談到此點，還是依着史籍，把那當作實有其事的好了。

前面講過，所謂封建制度，就是以土地資本制為基礎，申言之，就是以土地領有者對於其所隸屬之土地耕作者的榨取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政治組織。在這種意義上，無論是中國的，歐洲的，乃至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說得通。不過，中國封建制度，不同於其他封建制，特別是歐洲式的封建制的地方，却也正可從這裏看出。歐洲的封建制，是完全建立在土地制及附着於土地制之農奴制上面。農奴沒有自由，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權，更不能離開土地：他簡直是定着於土地的一個特殊機能，而不像是人。農奴由土地收穫多少，都是屬於領主的。除了領主許與他的最低生活費之外，

他不能取得一點。所以，領主對於土地支配權的大小，不決於土地的面積，而決於農奴的頭數。像這樣一種制度，自始就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那能談到什麼均平。

反觀中國的封建制度，那却比較進步多了，合理多了。中國周代封建制有一種特色，就是：牠的基礎，乃建立在一種頗有理想頗有組織的井田制度上面。如前所述，井田制的神髓，雖然一方面在禁止人民私有土地，同時，並使統治者易收統治之效，但就在這當中，人民也不是全無利益。他們對於其統治者或地主應盡的義務，一是上租，一是當兵。依着井田制，人人對於這兩種義務，就會不偏不倚的平均分擔，而統治者對於享有這兩種權利，也就有所限制，而不能任意加租，任意拉差了。因為粟米之征，只限於公田；而徵集兵夫車馬，亦是按着井田攤派。這樣一來，我們雖不能否認統治者對於農民的剝削，但比較上，總算剝削得合理一點，公平一點。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的一個大特色，抹視了這個特色，即無從認識中國的封建制度。簡單一句話：中國周代的封建制，是與當時的井田制相為始終的。當時那種封建制實施的範圍如何，實際究竟維持了多久，我們無從稽考，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是：中國井田制開始破壞的那天，即是中國

封建制開始崩潰的那天。井田制破壞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隨之告終。至若對於此後漢之分封同姓諸侯，唐之分封藩鎮等等，亦抓住字面形式，稱為封建制度，那就牛頭不對馬嘴了。歷史上一切所謂制度，都有其特殊的經濟基礎。若不問經濟發展變遷之次第如何，只一味羅列比附表面相類似的政治形態，或政治用語，結果，必大遠於事實。固然，在另一方面，經濟條件或社會的經濟關係無大改變，亦不容以某種政治形態表面的更動而遽認其實際情況之變遷，但一種政治形態，如果完全建立在某種特殊經濟組織上，那種組織崩潰了，我們就無從斷定其上層建築的政治形態之依然健在。是的，周室分封諸侯，致釀起春秋戰國割據，兼併，混亂的局面，此後西漢分封諸侯，西晉分封宗室，唐代分封藩鎮，都曾或大或小的演成頗相類似的混亂，迨至民國，因開國時各省置有都督，卒乃有今日這個場面，這分明是一貫的封建制度的作祟。不過，我們對於周以後這歷代的政治花樣，如果硬要稱牠是封建制度，那也不妨，因為人各有運用名辭的自由。可是在運用這名辭時，應當表明那是與周代封建制度截然兩樣的東西。周之封建制度有井田制做牠的經濟基礎，而周後歷代的分封，則只限於一種政治設施。周初受封的公侯伯

子男，對於其領地的農民，是統治者，亦是地主；若此後由歷代分封的王公藩屬，不獨沒有地主資格，有的且連政治統治者亦說不上。這原因，這區別，就是由於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為基礎的。徒徒君臨於一定面積土地和一定數人口之上，而於土地人民不發生直接的緊密關係，換言之，他的生活，不是由其所領土地直接上租供給；他的兵力，不是由其所轄人民直接抽丁充當，那很顯明的，他頂多不過是統治人民的大官吏罷了。爲了擴大統治的範圍，爲了增進實際的支配，他也戰爭，掠奪，傾軋，但他勝利了，掠得的土地，却非他的私產，土地仍是人民的。他也向人民榨取，剝削，乃至壓迫，但人民對於他的孝敬，早變却方式了。不是上租，而是納稅。總之，我們討論封建制度時，當特別留意其經濟基礎；經濟的觀點拿準了，就知道周之封建制度，早隨井田制破壞無餘了。至遲，秦以後就全沒有封建制度存在。然而現在竟有人說，今日中國，尙是一種封建社會，並且，他們的根據，都是實際經濟問題上的事實。這是頗值得注意的。

原來這種意見之發生，並不始自今日。所謂‘封建軍閥’‘封建思想’一類術語，早就頗流行於一般文人學士口耳之間。不過，進一步根本的論證今日中國尙爲封建社會，那却

是近年來由蘇俄幹部派發端的。幹部派這種意見，頗為反對派即杜洛斯基派所反對，迄今兩派論爭猶烈。中國思想界受此影響，故對於中國今日社會性質的問題，亦有兩種正相反對的意見。贊成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者，所提出的論據，大抵得自外人，忘却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特質。而且，即使依日本的或歐洲的封建制度來權衡，亦不免有冒為比附之嫌。茲先將他們指稱今日中國為封建社會之論據，分述於后。

一，就農業問題考察，現今中國農民中，有五成是租借土地。有一畝至二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占全體農民四成九五，總其所有土地，不過全體耕地一成五九。有二十畝至四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居全體農戶之二成二七，有全體耕地之二成二八。合而言之，則此兩者占全體農戶之七成三，而其所有地，却祇三成八。

二，中國地主，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他們不獨持有經濟的權力，且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許多省份的農民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屬於他們的。

三，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此種形式，是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的遺制，與農村資本主義一定的



發展(抵押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相織而成。這在中世的歐洲也是特徵。

四,中國現在之軍閥,即屬一般封建諸侯。他們君臨於其所統轄的省份,常為大規模的大地主。為了徵收租稅,他們利用國家機關,及自己的一切權力,強征豪奪,誅求無厭。他們對於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土地不是他們祖宗的遺產,也不是他們的財產,但在實際,他們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為私財。

五,帝國主義商品侵入農村,使中國農村的半自然經濟漸漸破壞,廣大的農民羣衆急劇破產,其結果,一方面促進中國農村中階級之分化,極大多數之農民陷於貧苦深淵,同時發生極少數之富農份子。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維持中國之封建勢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因之,使中國農村經濟停滯於半封建關係之下,致資本主義之發展,極成困難。

上述這諸點,大體上雖屬蘇俄幹部派之主張,(參照新生命第三卷第五號方峻峯先生所著: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但中國主張此說之歷史社會學家,亦多恃此為擁護其意見之有力根據。茲特依次逐一批難,以明究竟。

就第一點說，中國佃農對全體農民的比例；中國小自耕農所有地，對全體耕地的比例，實際是否如此，還大是疑問。現在我們就退一步認定這個統計數字是正確的，這於論證今日中國為封建社會有什麼幫助呢？封建制度下沒有‘自耕農’‘佃農’這些名色，耕地者在歐洲是全沒有自由的農奴，在中國却是計口受田的農夫，他們的統治者，同時就是他們的地主。即使更退一步漫然的說，封建制度係以土地制度，即領主對於其所屬農耕勞働者之榨取關係為基礎，一國土地既有百分之五十為地主所佔有，即全土地面積之一半，已結有這種地主對佃農的榨取關係，那末，這個國家就分明是一個封建國家，至少是一個半封建國家。然而要證實這似是而非之理論的不當，我們頂好看看大家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實況，就以日本為例吧。根據一九二七年的農業調查統計，日本全國乾田水田總計起來，自耕地為五成四二，租借地為四成五八；又自耕農，佃農及自耕兼佃農對農家總戶數的比例，自耕農為三成一二，佃農為二成六九，自耕兼佃農為四成一九。就日本這個農民農地的統計數字看來，比之前面那個對於中國農民農地任意作成的（也許可以這樣說吧？）統計數字，相去也就有限了。然而我們仍不妨稱日本

爲資本主義國家。況且，其性質，其經濟基礎與領主或封建諸侯絕不相同的地主，就是再多一點，其土地就是再廣一點，我們也不能即此確定一個社會的封建性質。

就第二點說，中國的地主，確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但正惟其如此，就可證明中國土地的流動性；所謂“千年田地八百主”，那正是中國社會土地流動狀況的寫實。地主持有經濟權，那是十分明顯的，地主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即此就能與那既領有其土地，復統治或奴役其人民的封建領主混爲一談麼？

就第三點說，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但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現今也還是行着‘米納’的佃租制。況且中國的佃租制，實具有投資的性質。蘇俄反幹部派拉狄克氏說：“中國農民之半數是佃農或半佃農。此種佃租制，不是半封建的佃租制，而是新的資本家的佃租制。大地主是投資農村之商業資本家，商人或官僚。他們以自己的錢，借貸於農村。……在中國投資於工業是很危險的，而投資於農村的事情却很簡單。政府在四年前預徵農民的賦稅，然而農民無處可逃。窮極之農民，不得不向商人借錢。這商

人做了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從農民收取五分六分的利息。  
(見前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  
中國的地租形式，已經不是什麼封建社會的遺制，而是結合  
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而形成的一種投資形態。

就第四點說，君臨於各省的軍閥，有的確是大規模的大地主，但同時我們應知道，他們不但是大地主，且是大商人，大實業家呢？中國大點的新式公司，規模像樣的工廠，殆莫不有軍閥乃至他們御用屬僚的股份。他們投資土地的動機，與投資實業的動機一樣，牟利而已。他們已經不靠土地來維持他們的身分了。土地到現在也實在不能抬高其身分。況且，他們的土地，也還是購買得的，不是誰個分封給他的。其畝數雖再多，比起他所統治的面積來，那真是九牛之一毛呵！他戰爭，他企圖兼併，但他的目的，與其說是關土地，倒無寧說是奪城市。是的，他對於統治地方的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但在實際，他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為私財。不過，對自己購得的土地是收租，對人民自己的土地，畢竟祇能徵稅，收租徵稅在充實軍閥官吏腰包的作用上，雖沒有區別，然而一棍究其來源，那却是一個社會是否尚有封建制度存在的指標咧！

就第五點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中國社會確有了根本的變化。其一，以前商人投向農村購置土地的資本，現在轉而用在城市新式的工商業方面了，資本既由農村流向城市，於是舊式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周轉的形式破壞了，農村由經濟停滯緊縮而陷於困境，農村失業者乃因以加多；其次，因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開工廠，大投資本發展中國工業，所以舊農村經濟關係破壞下形成的農村失業者，都有了出路，農村過剩的勞働，亦遂隨着資本向城市移動；再，都市工業發達的結果，農村一方面變成了都市工業品消費的場所，同時又是都市所需原料供給的場所。農村對於都市的關係，已經是被動的附屬的了，換言之，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從重在工商業發達的城市了，土地這種商品，再已沒有前此商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令人垂青；最後，隨着都市工商業的發達，銀行資本勢力，也漸漸扶植起來，金融圓滑的活動，更使帝國主義資本容易向中國排洩，並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發生密切聯絡。在這種種情形下，我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侵略，造出了中國農村不少的失業羣，但同時我們也難否認農村失業者，由工業發展所得的救濟。帝國主義者延長中國軍閥的生命，致阻礙中國工業資本之發達，那是事實；

但牠破壞中國舊式商業資本，促進中國工業資本之發展，那也是事實。這誠然是一個矛盾現象，無奈帝國主義本身發展，就是一列矛盾現象的展開呵！

由上面討論的結果，我敢說：論證今日中國尚有封建制度存在，尚為封建社會，那實在沒有根據。中國近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是被動的，殖民地的，但總不能不說是變相的資本主義；也許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頗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體上，全國確是為資本主義勢力所支配，這，我們可以由種種事實，種種可靠的統計材料來解說，不過這裏是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多講了。

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的中外學者，每喜歡把‘封建社會的遺制’，‘封建制度之殘餘’，以及‘半封建制度’等話頭，來撐持其意見，但，這已表示他們的自信不堅了。此外，有的學者主張：中國封建制度早崩壞了，但中國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比起所謂‘遺制’，所謂‘殘餘’，所謂‘半’來，‘勢力’二字，當然更有躲閃餘地，但同時也就更有斟酌餘地。因為，如果有人詰問‘封建勢力’是什麼，那恐怕比‘遺制’‘殘餘’還要難得答覆些。而且嚴格的說，如果承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同時也就不得不承認維持此‘勢力’之封建社會的‘遺制’或‘殘餘’



的存在。這一來，反對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便和主張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一鼻孔出氣了。

我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制度，我同樣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勢力。

一九三一年，六，一，于東京。

## 世界王者誰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會編

陳辛木譯

實價一元

現代三大資本主義的國家——美英日——互相衝突着，而這衝突正是世界第二大戰的預示。然而輪們之間的衝突，到了什麼程度；世界第二大戰，究以何種方式爆發；這都是每個研究國際情勢的人所難以預想的。這本書對這方面，貢獻了許多確切的意見，讀此書後，對於眼前的國際糾紛之癥結，以及最近日本之武力侵華的原因，均可瞭然了。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廣州

# 中國官僚政治的殞落

戴行軺

## 一 緒言

一種政治組織，祇能適應一種的經濟基礎。全時我們也可以說，當經濟的基礎搖動季節，舊的政治組織不得不破壞，當新的經濟基礎樹立之後，新的政治組織也接着成功。這幾句話，就是演繹馬克思的話：“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的經濟的構造，而為真正的基礎；其上則有法制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即上層建築之一），而一定的社會的意

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又適應于此。”這差不多是我們的至理定論。

在原始社會時代，所成下層的基礎的漁獵經濟，生活是不能安定，因此只能產生民族，代表執行政治的權力。在奴隸社會時代，生活略能安定，代之而興是自由民所有的國家。在原始時代沒有官僚，其執行政權的人們，是氏族集團內選出的負責者，他是對氏族全體負責，罷免之權也掌握着各個人手裏，所以執行政權的不是官僚。在奴隸社會時雖有執行政治的人，實際上就是自由民，是壓迫奴隸的自由民，所以也不是官僚。產生官僚却是在封建經濟崩壞之後。封建國家以農業為基礎的，是其政權的執行是在領主的貴族，他是自己上馬來治理農民的。封建組織搖動之後，貴族的權勢也一落千丈，可是封建階級為着延長生命，不得不借重民間的分子。這上進的民間分子，就是官僚的先身。可是一方面貴族勢力未全衰，還得有勾延的日子。以後的商業資本繼續發展，封建勢力侵蝕完了，貴族勢力也完全勢力，代之而興的過渡國家，稟承着專制君主的使命，官僚的氣燄才日漸高漲，有時專制君主還受他宰制呢！所以說過渡社會是中國官僚政治最發達的季節。直至資本主義上台，官僚才失了經

濟基礎，而漸趨沒落。

官僚爲什麼發生于過渡社會呢？自然有他的特殊背景。因爲“（一）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生存賴賦稅，其身分信仰由於階級的獨占。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同的利益，一方面却與生產組織任何利益不同。（二）中國士大夫與庶人間流通性極大。選舉或科舉制度蒸發庶人中優秀分子加入士大夫。與士大夫通婚者及士大夫的近親，常取得士大夫的身分。曾有官階者，無論其由捐買或考試，都取得士大夫身分。士大夫的子孫常繼承父祖的光榮，所以庶人很容易化升爲士大夫。”（見陶希聖：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新生命一卷九號）於是士大夫——就是官僚成功了。別個的社會，多少些和這個經濟基礎不合，所以不易發生的。我們就可以下列各時期爲準則，從有史以來述到今朝的官僚發生及沒落史蹟。

- （一）原始社會時代（自太古起至殷止）
- （二）奴隸社會時代（自殷起至周初止）
- （三）封建社會時代（自周初起至秦朝止）
- （四）過渡社會時代（自秦朝起至清鴉片之役止）

### (五)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自鴉片戰役起）

## 二 原始社會時代

原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政治組織的。有之不過是氏族，是圖騰。詳細些說，“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政治當然是國家的產物。在氏族社會之內，沒有什麼階級，都是各取所需，各任其能的工作着，沒有什麼私產制。因為沒有階級，所以隨着階級而起的政治制度，自然也沒有發生的必要。所以氏族制度社會的下面，決不會有國家的產生，更不會有具體的政治組織。商朝在盤庚以前，所有的情形，大概是政治與經濟組織的不分化，政的首領就是經濟的首領，其行使權力的範圍甚狹，祇限于在氏族之內。不過有武力，有文德的氏族首領，又常駕御好多的氏族，所以有人疑地是國家的帝皇，然按之實際，則相差尚很遠呢！”（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第三卷第九號）

在上面一段事實裏面，我們對於那時的官僚制度，可以作這樣的說明。氏族的分子大概不是衆多，其需要領帶，需要督察，需要分配，固是事實，可是分子的寡少，祇須一個酋長足矣，不必費多少的官僚啊！而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會割

分的原始社會，其組織的需要還在經濟方面，政治的需要薄弱，所以組織異常簡單，祇要一個人就能勝任愉快，用不着多數執政者。何況執政者終是分食階級，他們決不能再幹生產工作，在生產力薄弱的原始社會，怎能豢養衆多的分食階級？其執政者有時揀用老的，一方面是取他有威信，一方面也取他本是分食階級啊！

這種有文德或武力的氏族領袖，管理數個至數十個的氏族的時候，他的管轄的地方既大，管轄的人口既多，一個人的能力于是不配擔當，因此有用人協力的必要。不過這裏的協助統治者，和官僚大不相同。他們有評議會的組織，這裏不是現在的選舉出來的賺錢爲目的的官僚，乃是各氏族的首領或族長兼領，沒有什麼公費的，更沒有薪俸的。由評議會所產生的大酋長，大多數就是有文德或功武的酋長，是憑着義務，執行其政權，沒有什麼土地，更沒有那時候所沒有的金錢報酬。由大酋長所委任的協助執政者，大多數是由酋長，或是有特殊才幹的充任，其報酬也一些兒也沒有，不過有權享受氏族間的分子的生產品。所以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居在“土階”之上，穿着“布衣”吃着“不和之羹”，並沒有什麼奢侈利慾呢！



因此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清廉的，而人選也極其慎重，而協助執政者也極是寡少。所以我肯定的說，那時候沒有官僚的。

### 三 奴隸社會時代

自原始社會遞演而為奴隸社會，在中國是殷盤庚以後的事，那時候的政治制度，稍見萌芽，國家也已確立。這種奴隸發生于殷時，強大的人無緣的壓迫弱小者，當時國家就成強大者壓迫弱小者的工具。周民族不久由西方殺來，商民族因之結束了生命，外來的周民族自己站在自由民地位，對於原來的商民族，加以力竭的壓迫，因之政治的組織更形需要，國家的基礎方才完全打定了。那時“自由民是政治上的壓迫者，奴隸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自由民是經濟上的非生產者，奴隸是經濟上的生產者。自由民因為是非生產者，不得不壓迫奴隸，奪他們的收穫，以供自己的用，由是政治就這樣的決定了。這真如恩格斯在他著作上說：‘在社會內部有了各種利害的分裂，社會自然就發生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最初是以執行社會的事務為目的，隨着社會的內部階級成熟，就變成一種以人的支配為內容的權力。’這種權力

逐漸變化，應於階級對立的構成而為國家權力。跟着生產力之發展，在社會內部構成階級對立的過程，與最初以執行事務為目的的那種權力，逐漸變化成為國家權力的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就是說國家的形成過程與階級的形成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前揭拙著）

基於上術的那時候國家的形態，我們可以窺見那時候的執政者與協助執政者的情形。國家起原既是為着階級對立的關係，所以自由民掌了政權壓迫奴隸，要是自由民採取過渡時代的制度，對於協助執政者的官僚不限資格與身分的話，那就是叫奴隸來做協助執政者，你想他願意麼？在這種他不但有損自己的威嚴，並且自己的目的完全背馳了。所以那時候協助執政者是十分的需要，在國土擴大，人民增多的時候，但絕對是不願任命奴隸為官僚。而願把一切都在他們羣中的掌握，一切大小官僚都是自由民。所以這種實是一個貴族政治的先聲哩！

總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時代，政權是完全為奴隸所有者自由民的獨攬，對於奴隸取完全的壓迫態度，所以所有協助執政的全體人員，自然不允許奴隸的干政，也就是不允許除了自由民以外的人干政的意思。

## 四 封建社會時代

下層組織逐漸向農業社會移動了，以畜牧為基礎的奴隸社會便不得不倒塌，建設封建社會以適應經濟組織。這個時代的政治已不是自由民所擅權，而改為貴族所領有了，這就是貴族政體。一方面從政權的形態說是地方分權，是以地方分與諸侯成了封建制度。“在那時候，社會上一切的人員，除了貴族外，都是被壓的。就是他們附屬於他們的首長（小封建主）而有納貢的義務，君長在戰爭時候，須保護他們，在困難的時候須援救他們；而其代價，則為奪取其剩餘勞働，用了力役，或租稅的形式。小封建的諸侯。又是大領主的臣下，一面受其保護，一面則當納貢，有時且須用他的兵力，幫助大領主。有最高的主權，有支配大領主的力量的，便是王或者是皇帝。”（拙著前揭篇）

基於上述的那個國家形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代的平民，還和從前一樣的，是奴隸變態的農奴。國家是封建領主為着壓迫農奴而設立的，所以根本的原則，是不許農奴參加政治，否則農奴為了爭自己的地位，將有有利于農奴的政治設施，要破壞封建階級原來的慾望。所以那時候的政治完

全集在封建的領主上面。我們若再仔細的考察下去，我們將知道所謂封建領主，無論大的小的，公的男的，都代表帝皇的勢力，不是帝皇的子姪伯叔，便是帝皇的外戚，隨着帝皇發難的功臣，和歷代最大曾長的後裔却是絕少，所以那時候的權力雖是分散于諸個人的手裏，可是間接直接都與帝皇關係。封建的領主既是如此，那麼協助執政的官僚，自然不會引用別人家的勢力，祇知道叫別人家耕種，還有教他升官發財的企求麼？所以那時候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其力量比奴隸社會時代高得多了。

那時候的協助執政者，我們總可以看出幾個顯易的事：第一：那時候的職官漸次增添，第二：大權差不多在幾個貴族職官的手裏，第一個我們可以明白那時候的社會漸趨複雜，壓迫階級的需要更屬需要。從前的職官是出為實際上的需要，譬如在舜典的上面，有司空以治洪水，有后稷以獎勵生產，有司徒以布廣道德，有執法的官，有分工的官，有山澤的官，有教樂的官，有說禮的官，有納言的官，這種九種協助執政的都是出於實際上的需要，其人員是絕少的。可是到了奴隸社會之後協助執政的多了，有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以祀鬼神，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司士，司寇，以統治奴隸，有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以奉養自由民，有六工曰：土工，木工，石工，金工，獸工，草工，製造自由民居宅百物，可見那時候的執政者目的已不在人民身的上了。入了封建社會之後，這種制度還是大體的用着，中央政府設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治理農奴，每官底下用着六十個貴族，所以全組織就需用三百六十個貴族。六官之上，又有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這是不理政治的，不過是顧問官。在地方上的官制是這樣的，二十五為閭，閭有閭胥，百家為旅，旅有旅師，五百家為黨，有黨正，二千五百家為州，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為鄉，有鄉大夫。那都是大小相屬，直到中央政府為止。所以通典上記着唐堯時候祇有協助執政者六十，夏禹一百二十，殷二百四十，（這是依着鄭元的話）到了周代便有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其中執政中央的有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零三十二人，這真的多呀！這些貴族階級這樣就有出路了。

第二個是協助執政者雖是這樣的衆多，但是政權爲了不至於分散起見，其權力仍是集中幾個有力的貴族。周朝初年其權力差不多都在周公旦，召公奭的手裏，以後周公旦

死了之後，畢公繼起，這都是貴族有力者啊！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候確是一個真是的貴族政治，其原因也是易于壓迫農奴而使之然呀！

自周室衰微以後，成了春秋時代。這個時代是諸侯目無法紀，力竭的攘奪大權。其結果使政治實權淪於貴族的手裏，自己却是東西奔波講究聯盟，締結約章。有時這種貴族得着諸侯的盛命奔波於外，因此結連外國勢力，以為後援。於是諸侯成了尾大不掉的樣子。如宋的公族，魯的三桓，齊的陳氏（後改姓田氏），晉的六卿，勢力之大，一世莫能與之京。但宋雖有公族之亂，幸不至滅國，魯雖有三桓的橫暴，幸不至失國。齊國的田氏却是殺了君，執了大政；晉的六卿，也逐出了君，執了大政。在這個貴族勢力極長的時代，自然是有危於官僚的發展。

到了戰國的時代，官僚的命運到了。至于貴族執政却是來了一個大打擊。官僚在那時候大概是由下列數種構成：“（一）貴族鬥爭中的失敗者及其子孫；（二）由商人階級出身者——管仲，百里奚，寧戚；（三）由解放後的農奴出身者。”（梅思平：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這些分子是這樣的發他展的勢力了：“第一時期，大概都為大



貴族作家臣。……第二時期，大概作地方官吏。因為貴族互相併吞之結果，大貴族的土地非常廣大，不能直接統治，所以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吏統治。這種地方官吏，魯國叫做‘宰’，齊晉都叫‘大夫’，楚稱‘公’或稱為‘尹’。……第三時期，則為中央高級官吏。如管仲相齊，以官僚而為卿相，在春秋初年，實在還是少見。孔子以布衣而為魯司寇，在春秋末年也不多見。到戰國時代，則此風大盛。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乃是最著者。”(全上)可是那個時候的貴族勢力還沒有全衰，齊國的孟嘗，趙國的平原，魏國的信陵，楚國的春申，還是大權獨攬。不過他們為着鞏固勢力起見，不得不招致失意的人們，象養起來。食客數千人的事實，不是在我們的眼簾映着麼？可是他們也不能忘却官僚勢力了。

總之：在封建時代的社會，最初的執政的協助者，差不多完全是貴族。直到商業資本發達之後，貨幣經濟的增加，而形成官僚政治的萌芽。這實是時勢所造，不是人會造成的啊！

## 五 過渡社會時代

官僚的發達，是過渡社會事。官僚的命運，是隨着社會

過渡相終始。所以我們敘述一部官僚政治的殞落，最該注意的是這個時代。我曾解釋那個時代的政治是“士大夫階級取得政權完全是靠他獻媚帝王的本領，最好是倚附新興的集團，替他們天子幫忙，事成之後，論功行賞起來，一定佔了極大的便宜。所以中國的政治，常在‘一治一亂’之下，而不能平平安安的過活。一方面士大夫階級爲着維持自身的利益，對於民衆多方的加以抑壓，民權根本是沒有的。一方面他是不勞而獲的階級，對於農民的剝削是異常利害，田賦徭役是多麼重而且繁，而農民永遠呻吟着。所以士大夫階級政治是一個武力政治，是一個專制政治，是一個階級政治。我們要推翻武力政治，專制政治，階級政治，勢非打倒士大夫階級不可！”（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三卷九號）這個士大夫階級就是官僚，這是從政治上說。所以我們要了解過渡社會政治，第一點就是明瞭官僚。

士大夫階級所以在那一個時代得佔着最大的勝利，也可以用我從前的話：“在封建時代，大小諸侯或是大小地主，就成了官僚，到了秦漢以後更發生了官僚階級。因爲中央政府看見封建諸侯，勢力太大，于自己不利；同時爲了報酬功臣，不得不採用封建制度，因此便設立官僚，以爲實際統治者，

一方面又與諸侯以虛名，給以錢帛或少些土地，於是官僚或士大夫階級便應運而生。”（前著）要是詳細的分析起來，那個的原因有兩重，一是屬於統治階級需要官僚，一是屬於官僚需要統治階級：

（一）在封建制度崩壞以後，國家漸由地方分權，進而為中央集權，諸侯的競爭是多麼利害，在戰國春秋的史蹟上是充滿着戰爭的慘景。結果政權却淪落於擁有軍權實力的將領，於是“彼可取而代也”的將領們慾望達到之後，把殘留貴族殺盡了，恐他們的死灰復燃。一方面需要治理萬民，於是引用非貴族的戰士，和智識分子。他的勢力便這樣的存在了。因為官僚是幫助統治階級的功臣，有這樣多的人口，有這樣大的土地，統治階級不是三頭六臂，怎樣管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呢！而官僚則大可以幫助他。如史記淮陰傳侯說：“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如失左右手。’”如吳志周瑜傳說：“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如魏書任城王澄傳說：“沖對曰：‘臣既遭唐虞之君，敢不辭元凱之譽。’”又如元史明宗紀說：“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左手，樞密則右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關政，則以御史台治之可乎！？”所以官僚是統治

階級的左右手，是同有骨肉關係的。那麼，你想，統治階級有不利用官僚的麼？這是屬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官僚。

(二)奧本海末爾論述人類求生存的方法，一為勞働，一為剝削。(見氏著國家論)官僚階級自然不是勞働階級，而是剝削階級呀！官僚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要是有不織而衣，不耕而食的可能，人家自然會樂於歸從的。史記上載着一個民謠：“倚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真的商人貿遷有無，是很可以給人羨慕的。農人的子弟，終歲勤勞，要是去歸附統治階級，做一個官僚，自然是轉易于剝削階級，這是多麼適意啊！如宋史王欽若傳說：“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洪邁宏齋隨筆說：“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夏文莊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可見所謂官僚除了是世襲的游惰分子以外，大多數都是來於農村。他離開農村是爲着什麼呢？這是沒有什麼明文的記述，但是終是厭棄這個苦孤的生活，現在投諸統治階級可以“安坐而食”，這是多麼的喜悅啊！這是屬於官僚的需要統治階級。

在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階級是有互相爲用的，就是統治階級少不了官僚，而官僚也是少不了統

治階級。需要既是這樣迫切，那末統治階級是怎樣求官僚？而官僚是怎樣獲得統治階級的青睞？這裏是很重要的。方岳曾說：“秦漢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帶有立體組織的‘豪族，強宗’。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由立體組織蛻化而為平面解剖的一個身分，所謂‘地望，名門’。唐宋以後，再蛻化成純平面解剖的士大夫層。此後士大夫身分取得與維持，已漸由與族姓勢力沒有關係。但族姓的勢力可以助長士大夫力量。”（見氏著關於士大夫身分幾個問題新生命二卷二號）其實我們就一般的看來，這不過是屬於一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如重“地望，名門”的社會裏面，固是王謝兩家霸佔勢力，劉備三顧茅廬的事情也會發生，難道諸葛孔明有“地望，名門”麼？在重“豪族，強宗”的社會裏面，固是大族名家嚇然存在，如方岳所舉的例如前漢書游俠傳說：“郡國豪傑……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道，莫足言者。”但是也會有廿二史劄記說：“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的現象。所以我說。官僚要得統治階級的

任用，就是統治階級任用官僚的標準是有奴隸的學術，有奴隸的行爲，且待我分別說來：

(一)奴隸的學術是很重要的，在這學術裏面告訴我們怎樣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這種道理要是奴隸之極，才是可得而用，否則如反奴隸的，便該視做洪水猛獸。孔子的學說是極其奴隸，極含有統治階級意義，別的且不說，單就論語中的話：“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說：“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這是多麼具着奴隸的行爲呀！他所想的學術自然也是極奴隸化。他固夢想着大同世界，可是他倒退一步想出小康世界，這小康世界，就是專制政體。所以歷來的帝王都是崇奉他的學說，就是漢高祖在未得天下時會溺於儒冠，得天下之後便與儒學了。有了這種奴隸學術的人，便會做起奴隸的事情。所以開科取士就是這個意義，得取的人，不消說對於奴隸學術有深養的人，使他們去做官僚，不消說是很得其當。因此唐太宗見了進士列隊歡迎，不禁與高采烈說：“天下英雄，已入吾彀中矣！”（唐書）賦這種詩的：“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復向社前歸，人雲大廈無棲處，



更傍誰家門戶飛”的人，自然奴隸欠充分，于是落第了。歷代帝王所以用這類人的原因就在如此。在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多近儒條說：“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閭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不是我好證據麼？其用這批人原因，就在盡忠於君，你看該書裏面有元末殉難者多進士一條看：“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興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引，死于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于賊；王十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潯州死于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秦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這也是一個證據，證明有奴隸學術的人，是統治階級所樂用，于是他們研究奴隸學術了。

(二)除了上述的一點以外，奴隸的行為是很重要的。本來統治階級需要這種的人物，才可以統治他們，督理他們；否則，官僚的勢力一長之後，統治階級的命運就要壽終正寢了。當他們攫奪大權的時候，便會喪失了的。所以他們需要這種人物，你看廿二史劄記的南朝當以寒人掌機要一條，不是說：“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于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宜力勤，便于驅策，不黨倚之為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于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延，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這是統治階級明瞭用人的大道理者啊！劉備三顧諸葛亮於茅廬，也是個寒人，他不但能：“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并且還能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俱見蜀志諸葛亮傳）這就是他們奴隸的精神哩！李白當布衣時求見韓荊州不是說：“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倘急難有

用，敢効微軀。”所以統治階級喜歡極了，不久之後，他就當了大權。元史裏有拜住傳載着拜住當任官僚時，他對統治階級說：“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職年少不克荷負報上聖恩。”這真奴隸極了。所以凡是奴隸的行爲人們，統治階級必爲笑眼開了。

除了上述兩點以外，此外也有宗族或親戚的背景，因爲一個人上了大官，總該把他的子姪帶了上去，或者他的親戚也帶上去幾個。這種的制度在魏晉時代最可看出，那時因爲門第制度極盛，所以“上品無寒身，下品無勢族”的事情很明鮮在映着。以後的社會這種制度還是明鮮的，不過無此種的盛況吧了。如顧亭林日知錄北方門族條不是說：“今日中原地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與江南相去蔓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自金元以來，陵夷至今，非一日矣！”可見這究竟是“登仕”的方法啊！不過沒有前述兩者的勢力，便會低減起來的。

官僚霸佔了政治之後，貴族與封建的勢力因此失了勢，官僚的行爲是怎樣呢？從一方面看官僚正如家奴，不過還是在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季節；要是在農村不安定，農產不豐收的季節，便有反抗朝廷，甚或降服新興勢力。這邊是爲

着他自己生活問題，不得不然啊！分析來說吧——這二點：

(一)官僚類似一家奴僕——在過渡社會的天下，正如孔子所說的家天下，就是說這許多江山，這許多子孫，是屬於帝皇一個人的。他們所用的官僚，正如看門的狗。在明夷的官制議說：“天官之庶使百職，乃無一治國事民事之人。合此庶司百職，皆以奉一君。甚且六卿中六大六少之職，皆以奉君事神事為主。其餘百官，其專為事君者尙多。自是古所謂設官以治民者，則皆為設官以事君矣！今以周考之……凡此百有五之官職，皆于民治無關，于國事無預。又冬官闕六十職，則統周官所有，但地官，秋冬及夏官之半，百七十二官為治國事民事者耳！……自蘇綽倣其制，而唐六典宋開寶禮因之，凡一切祭祀，朝賀，喪記，會同，皆使三省六官分任其事，遂至今為定制。”（見新民叢報）啊！啊！官僚真是一家的奴隸啊！中央官僚固是成了家奴，但歷代的地方官，也是家奴，周谷城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親民之官，概是站在統治階級的一方面，對統治階級負責任的，其出其管理軍政，民政，財政等等，也祇是替統治階級鎮壓民衆，剝削民衆，或指揮民衆，替統治階級預備生活資料，所以概是統治階級的家奴。”（見中國社會之結構）不過這個家奴却是有時世的不同。在

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時候，政治能夠平安，而這般富有倚賴性的官僚們，會死心塌地的崇拜統治階級，替統治階級効勞。如唐玄宗不過一朝在農村安定的前幾年的姚崇宋璟是“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此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唐書）如房玄齡杜如晦輔翼太宗，唐書稱爲：“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功不足進焉。”這種真是奴隸極了的官僚。尤其是東漢的季節，“蓋其時輕生尚死，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入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期，尚有可恃以撐拄傾危。”（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條）他們是成了統治階級孝子順孫了。

（二）官僚習近趨炎附勢——在過渡時代的國家，既成了家天下，官僚在死心塌地的奉承統治階級，固是可得着求食的門經，也足以仰事俯畜。可是一到某統治階級失了勢，他自然是淪落了，因爲敵人的看門狗，誰都不願意再行僱用。如李密之類究是少數。所以他們爲了求生存，他也學得趨炎附勢的習慣。在某一集團將作統治階級的時候，他們便會如蟻之附羶一樣，雲集而響應。某一階級將失勢的時候，

固是有忠臣即奴隸化官僚，可是大多數終不是降伏，便是退隱，在小學纂註註說：“忠臣不事二君，此千古人臣之大義，而後罕知者。漢世崇尚經術，而新莽之篡，祇一樊勝不食死。唐朝三百年養士，而賊溫之禪，止一孫供奉者不下拜。降而歷事五朝之徒，風益下矣！”可見忠臣即奴隸化的官僚究是一部分呀！南宋滅亡禍在秦檜，明祚淪落禍在李自成，呵！呵！這是趨炎附勢的彰人耳目者呵！其他如新興的集團，便會有多數官僚前來歸附，而和統治階級共定天下的，自然位更高望更重，引用他的機會更多，如齊書劉懷珍傳說：“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可見他是重視共同平難的功臣。所以帝王常常慰藉功臣說：“國內平定，汝等之力為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替此，勿替初心。”（元史木華黎傳）這樣官僚那有不忠心事統治階級呢！於是我們有這句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道破官僚的真正精神而無遺！這種的習慣是官僚求活的好方法，不過這是偶而用之啊！

官僚的性質既是如此，我們可以知道官僚的統治階級的走狗，是幫助統治階級壓迫平民的人，于是成了一家奴隸。但全時却又生趨炎附勢的蝙蝠，于是政局常受他的操



縱，而這樣潔身自好之士，便不願出來幹事，因之政治更趨于腐敗。所以我說官僚不是個好東西，是害人的東西，分析的說，是有四點：

(一)政費增加——沒有不吃的人，當這個統治階級用了這一些人之後，便該支出多少的款項，大的官僚，薪俸自多，小的官僚，薪俸也不寡。國家政治的行政費便這樣的增加了。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冗官冗費條不是說：“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尙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延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不但如此，還有：“向方鎮有公私錢例私以自奉，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則復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或亦滯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所以冗官之上更加着冗費呢！這固不是普遍的現象，但是這是自然的事，用了官僚，自然少不了支出的。如“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縑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孫採樵自給是也。否則必取給于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接，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給于人，寬以善于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廿二史劄記後魏

百官無祿條)或是如：“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為永制。”（全上書明官俸最薄條）但是官俸就是沒有，或者是低薄，但他們還有取入的方法，就是在于貪贓枉法。貪吏固是不可為，是少不了人家的揭發，但是他們是常常做的。看“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銅物皆鳴，人喜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南史江祿傳）“左手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物錦室照澈青雲。”（南史佞幸傳序）“德正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其元賂是也。”（北史高德正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鎖無所遺，官曹籬壞，吏將易之，鑿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故鑄家錢遍天下。”（唐書王鏐傳）這種的事情在歷史上書不絕書，固是到天下太平，國君有為的時候，對於這種貪贓枉法的官吏，有所懲

戒，可是這不過是短時期而已！人民們在絕長的時期，不知受他們害了多少！？

我們不必再說其他，單就簡單的事實看來，我們已可驚心了。官僚的數目，在統一的時代大概在萬人以上，如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員，元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員，有時竟在二萬人以上，如宋二萬四千員，明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如東漢竟達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到清代的數目大概也類此。倘如祇就一萬兩萬想來，也許說祇有這一些。但我們就每一個官僚所仰事俯畜的以及什麼妾，什麼僕之類看，我們一定覺得可驚！要是更從人口數目來比擬，更是不得了。例如西漢的十三萬餘官僚，每家以六個人計算，約有八十萬人是分利階級，可是人口那時祇有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那就是每七十四個人民養着一個分利階級，這是多麼可驚啊！實際還不祇此！這樣的事情，小民是多麼可憐啊！那時候的生產既是微薄得很，而人民們半數是屬於不能生產者，生產與消費的原則不能適應的時候，小民惟有挺而走險了。

(二)政令苛刻——官僚們要是祇個溫飽，人民祇要養他得當好了，可是他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所以他的政令

是多麼的繁苛，使人們個個感到痛苦。這自然尤其是親民之官的地方官，更容易壓迫，因為離民衆較近的緣故。他們的殘酷到什麼地方呢？後漢書酷吏列傳序說：“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至于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穿，漂血十里。”隋書酷吏傳序也說：“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蒞，莫不凜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視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之罪，事非極惡。其所笞箠，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奸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這裏我們可以知殘吏的凶狠了。其實他們的行爲不祇加民罪，而且還有強要民錢，強收民租，如：“趙王擅權，使卽縣爲賈人權會，入多于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漢書趙王彭祖傳）又如“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諸受藏二千萬以上不自守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豪右大振。”（後漢書王暢傳）“侵虐百姓，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吳志薛綜傳）又如“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唐書李叔明傳）其他他們是主張用法令的，這法令自然不是正當法令，法令既繁，自然人民容易犯法了。如：“令公卿以下，郡縣黃綬

吏，皆報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繁劇。”（漢書食貨志）又加：“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阮穿塞路，舉手掛羅網，動足蹈機埒。”（後漢書袁紹傳）又如：“弄法徒文，傷人實甚。”（唐書韋嗣立傳）其殘暴的程度，不是我們能窺見的，因為離時代是遠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說得很澈底，他說：“自吾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餘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耳，而吾以捕蛇者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呵！呵！官僚是這樣的害于人民，是這樣的壓迫人民呢！我們回憶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不寒而慄”呢！呵！呵！

我們不要過於責難官僚。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老子所謂絕慾，是絕對做不到的呵！他們固已是乘了政，在地位的立場本可以壓迫人民，榨取其生產了。可是他的慾望怎能滿足呢！可見官僚清廉的不多，實有這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們要知道統治階級何曾忘記慾望呢！他們設官的目的，除了供養

自己以外，就在於剝削人民，來滿足他的獸慾。官僚一方面設統治階級設法，一方面替統治階級剝削。前者屬於知的，而後者屬於行。所以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這種剝削人民的官僚，不是罪惡，倒是合法。聽史記酷吏列傳序的話吧！“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者，天下之綱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建嚴酷，惡能信其任而愉快乎！？”這真是家天下的流弊喲！

(三)政權在握——官僚大多數是智識階級，統治階級大多數却是非智識階級，知的一方面，官僚既是勝了統治階級，而行的方面，却是在官僚而不在統治階級。這樣官僚不是可掌握大權麼？就是有的天生睿明的統治階級，也往往被他們所迫脅！何況有的是母后臨朝，祇是一歲二歲甚或祇有三月的幼主，他們一切都不知道，政權自然落在官僚的手裏。所以除了幾個，如梁啓超所說的：“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曰武帝，曰光武，曰照烈，曰吳大帝，曰秦苻堅，曰宋武帝，曰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曰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曰成祖，曰清朝



聖祖，世祖，高祖。”其次“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清朝仁宗，宣宗，文宗。”一千年時代，前前後後多少帝皇，而自己有統治權力的，祇有這少數！別的是怎樣呢？“不能自有其全權，或委政於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任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其專制權，則一也。”（見論君主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母后外戚在這裏是不能說，而這還在少數。最大害于統治階級的，是掌握政權的官僚。害處大的，統治階級至于身亡國亡，害處小的行動總多少受了阻礙。所以最簡單的說一句，官僚一方面看來固是統治階級的走狗，他方面看來，又何嘗不是剝削統治階級的蝨賊呢！

你看，統治階級是該統治官僚，而結果却是官僚統治統治階級！如宦官的禍在唐代所見的，是：“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由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源禍始，實由于使掌禁兵，管樞密……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

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于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卽人主廢置，亦均在其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宦官所立者七君……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宣宗之立，由馬元贇等之力也……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昭宗之立，由楊復恭等之力也。統計六七代中，授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此可見下陵上替之極也！……卒至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于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依李茂貞；致朱全忠圍攻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之彥等十人。城門既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羽百餘。既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于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朝宦官之局，至始終結，而國亦亡矣！’（見廿二史劄記唐代宦官之禍條）啊！宦官的勢力竟有這樣的偉大！唐代亡國的原因，間接直接都有宦官關係。這是統治階級被官僚所操縱的一會事。

除了唐代宦官操縱統治階級以外，統治階級的生命站在官僚上頭的，又何可勝計！這裏我不殫煩，再舉了元代的例：“……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剌哈斯之力也……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文宗之立，由雅克達穆爾之力也。……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疎屬庶孽如額嚕布格阿南達等從旁窺視。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應立之人。蓋開國之風氣淳，故宗親將帥推戴，咸于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弑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取誰何，遂任意易置，此為後世鑒也。”（廿二史記劄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條）從這裏我們不是替統治階級擔心麼！你叫他來幹事的官僚，現在却是被他們支配了。呵！統治階級真沒有能力呀！

唐之宦官，元之權臣都是亡國的直接人物！表皮上是盡忠報國的臣子，有的竟也至於亡國的罪人！“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為檜罪。而後知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

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求和，而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又如：“有明末造亦然……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囂，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俱見廿二史劄記明末書生誤國條）不過這類人物目的是在擁護統治階級，其實不明時勢，以致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恨，未始不是官僚所作的罪惡！

總之，官僚並不是好東西，並不是完全是統治階級的走狗。祇要權柄淪落在他的手，他的慾望增長，而會高漲氣燄，說不定是會位在統治階級之上，統治階級成了個傀儡呀！

（四）政治黑暗——在官僚政治的下面，他的黑暗程度是極深，朋黨為奸的事情，時常達生，僭越地位的事情，也時常出現。所以政治是極黑暗的，這已在上面略有敘及了。政治的黑暗結果，使潔身自好的人們，不敢入了官僚階級的队伍，其結果使統治階級的行動，少了有力的助力。在國家危機四迫的季節，少了這種的人，是容易淪于滅亡，則國家昇平的季節，固是無關大體，可是少了他便會少做幾件有益的事。這是誰的造成啊？不消說是官僚啊！

你要做官僚麼，除非你一味向統治階級作乞憐的勾當。

如通考選舉考引用江陵項氏的話：“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驪，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于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以爲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問，則有執贊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不但如此，他們尚有可恥的行爲呢。所以這潔身自好的人，不敢效這種無恥的舉動，於是退隱山野。政治因之更黑暗了。人民因此更痛苦了。

這四點就是官僚政治的弱點，官僚政治所以得以引用而不墜者，自然是經濟的原因，而有些奴性深的官僚，股肱統治階級，所以才生統治階級引用之心，不管什麼失敗不失敗的。奴性的官僚是使統治階級挽回殘喘的一息，如：“呂后之亂，而有平勃；武后之亂，而有狄梁公；安史之亂，而有郭李，建中之亂，而有李西平，潼淵之役，而有寇萊公；土木之變，而有于忠肅；宸濠之亂，而有王文成；洪楊之亂，而有曾文正；庚子聯軍之禍，而有李文忠。至于關壯穆，張睢陽，宗留守，岳武穆，文信國，余忠宣，盧忠烈，史關部，功雖不成，而正氣塞于兩間矣！”奴性的官僚，是爲護衛統治階級的，如：“朱雲折檻，張綱埋輪，張陵叱梁冀，申嘉圖折鄧通，禰

衡罵曹瞞，略賓王檄討武嬰，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真卿罵李希烈，段秀實笏擊吳泚，范承謨罵耿精忠，柳伉請誅程元振，陳東請誅蔡京六賊，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呂祖泰請誅韓侂胄，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楊繼疏劾魏忠賢，郭秀疏劾明珠余國柱。莫非忠義激烈，足以懾服羣奸也。”奴性的官僚，是協贊統治階級的，如：“董子之策賢良，賈生之策治安，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鮑宣之上哀帝書，蘇氏父子之上皇帝書，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魏徵之十愆十思，姚崇之十事要略，孫嘉澹之三習一弊，陸宣公之奏議，劉蕡之對策，杜牧之罪言，賈讓之策治河，趙充國之策屯田，江統之論徙戎，王朴之策平邊，韓退之之原道佛骨表，歐陽廬陵之本論，顧亭林之論風俗政事。並為經世之文，有關於社稷大計，主德民風者也！”又如：“其運籌帷幄，言聽計從，如子房之于漢高，孔明之于昭烈，公瑾之于孫策，王猛之于苻堅，鄒侯之于肅代，青田之于明祖，雖功業不同，而知遇則一也！其身係天下安危，如霍子孟，郭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千載曾無幾人！”這些的官僚確是統治階級的股肱，但是不過是這些而已！大多數的官僚都是目中祇有自己，不管什麼統治階級不統治階級。因之中國的歷史上一治一亂，循環不已的表



現着。

這一治一亂，循環不已表現着的政治，是誰的罪惡？不消說就是官僚。官僚是造成過渡社會的功臣，却也是表現過渡社會醜態的人物，他的歷史和該社會相終始，是唯一值得敘述的事。

## 六 資本主義社會時代

鴉片戰爭是中國和外國以武力接觸的第一次，中國誇大的中國，抵不住外力的壓迫，外國資本主義就儘量的輸入，把中國也形資本主義化了，在過渡社會發展得很的官僚政治，到這個新的經濟基礎來到的時候，也不得不轉移方向。他的情形，有如陶希聖所謂：“其一為鄉村經濟之破壞。因此士大夫個人賴以生存的地租不足供個人的生活，舊來門第遂不能長久維持，達官大吏的子孫易流為流氓地痞。從前官吏俸所得常以土地為投資的方法，自鄉村經濟日益破壞以後，土地漸不宜於投資，較富的官紳遂流為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其二為自由競爭的激烈。在都市中，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驅市民於商工業的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中，過去士大夫維持一己生存的身分，沒有存留的餘地。所以士

大夫的社會地位逐漸淪落與商工業者等量齊觀。同時商工業者依其經濟地位之高，在平民眼光中，反嵌入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把持行政，武斷鄉曲。其三為民族資本的不振。若資本主義能盡量發展，則士大夫將大量吸收於生產組織之中，不復全體集中于政治地位的爭奪。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自由發展的可能。初則因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商店侵佔本國的銷場。次則因外人設廠於國內，帝國主義在國內發展產業，妨礙中國產業的發展。末則外資輸入，一切產業非倚賴外資，即不能夠圖存。所以官僚資本家除了為外資經手者外，又多陷于破產之中。”（見氏著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官僚在那時候存在是還存在着，不過他的手段已由土地的主人而變為倚賴外資的人了，破產殘落的悲運，又時時的映在我的眼簾。這就是由上面的話裏，所得的結論。

從政治方面說，統治階級既是換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是倚賴外國資本家的買辦階級和軍閥。他們不需要這種有政治素養的官僚，常以引用私人為能事。所以官僚的一部不得不化為政客，在各大軍閥和買辦階級乞憐而搖尾，買得歡心，軍閥得勢的時候，也許可以做些大小官吏，擄劫一些民

脂民膏以肥私囊，失勢時候做海上的寓公，做一生適意人。一部分官僚却是沒有交了如此好運，淪入于農工羣衆及流氓社會之間，做搗亂社會的勾當。他們門第不必說了，連身分也不能成立，漸漸的消失他的特點。

不必說歿落于社會底下的官僚，單就政客說，他比爲人上人了，但他的痛苦却比從前高得許多。與伏無常的軍閥，使這般政客們爲自己担心，所以投機的衝動是十分的活現。又是智識普及的結果，使官僚們失了一種身分的倚據。和他競爭的更多，何況自資本主義侵入後失業的羣衆，是加得許多，也有趨向於官僚的路上。因此政客們的生機愈是迫切，而利用軍閥的心理更益高漲，一人如此，千萬如此，於是政治的局面不能安穩，人民生活更是痛苦了。

這次國民革命軍的勃興，他也許能夠打破這種局面吧！總理的民權主義，提倡政權治權的劃分，在握治權的人們，固有考試制度牽住這種無智識的人求進，監察制度監督貪賊枉法的官僚。但是莫過于政權中的直接選舉權，和直接罷免權，人民有了是項權力，那怕官僚的專橫呢！？所以正如陶希聖所說：“如果，政府和一切官職，完全黨和民衆直接選舉和直接罷免之下，那末，這種環境中間，決沒有復活官僚和

官僚政治的可能。公職的任免在黨與民衆的自由，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決沒有瓜分公職的餘地，也決不會再有因瓜分地位而引起的政爭。中國數千年來，後封建時期的官僚國家，這樣才可以完全打破。”(氏著官僚政治及其摧毀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

## 政治學綱要

高一涵著

精裝實價大洋二元二角  
平裝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高一涵先生曾在北京大學，北京中國大學，及近在上海中國公學，法政大學教授政治學有年。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洵為各大學最真好教本，并為研究或教授政治學者之最好參考書。

上海神州國光社刊行 南京廣州

# 對於“詩書時代的 社會變革及其思想 的反映”的質疑

周紹濤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第八，九，十一，十二等號上，載有杜衍（即郭沫若之筆名）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一文，其要點係以中國生產的進展，去分析吾國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和其思想。這種研究的手腕，并非我懷疑的所在。但其研究的結果的解釋，實有不能使我無疑

者。杜先生以爲吾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時期：便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爲奴隸制；和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在東周以後。再以其幾段重要的結論，介紹於左：

“農業在轟轟烈烈的發展起來，文明也就一天一天的燦爛起去，我們單就表面上看來，所以謂文武周公成康，真真可以讚美的了，然而這兒掩着一個很大的悲劇；農業的發展，就是奴隸制的完成。……”

又說：“周公這位老頭子，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隸制的完成者，這是可以承認的。”

又說：“……古來的經學家講皇帝王霸，以中國古代歷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的關鍵。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的神話時代，帝是原始共產社會，王是奴隸制的社會，霸是封建的社會。”

“……然而事實上西周完全奴隸制的國家，……而自秦以後的經濟組織，在農業方面是成了地主與農夫（雖然沒有農奴的稱號，然而事實是相等）的對立。秦以後的郡縣制實際上就是適應這種莊園式的農業生產，與行



帝制的工商業的真正的封建制度。”

照着他的結論看來，以為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奴隸制，霸道（即春秋戰國以後）的基礎為農奴制。故以為奴隸制發生於封建制之前；而農奴制發生于奴隸制之後。他的見解，適和我相反。我以為奴隸制，為封建制度搖動後之產品；而封建制度的發生，即在農奴制發生之際，所以說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農奴制；霸道之基礎，為奴隸制。至若我所解釋的，也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的事實，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說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實，和其解釋的理論。我對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辯；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據的事實；發表我個人意見，否認杜先生的根本觀念。究竟誰是誰非，尚希讀者諸君，予以誠懇的批評。

## 一 周之統一

周之封建制度

吾國的封建制度，開始於夏，到周代已為極盛的時期。因為由唐虞到夏，已由新石器時代，進入於銅器的時代。生產的技術，已表示相當的進步，也就是證明了生產物，已有發展的趨勢了。吾國係以農立國，當然以農業的發展為最早。農業的發展，必引起土地

和勞力二者的需要增加。但是農業區域的人民，最富有保守的思想；而經濟的狀態，為自給自足的現象，因而封建勢力，也容易附着於其上。同時還有兩方面的理由，證明封建制度，已開幕於夏。

1. 以經濟史的發展說：最初經濟的發展，為河面經濟的時期，例如埃及之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之幼發拉抵河，印度之恆河，和吾國的黃河流域，這都是古代經濟發展的根據地。我國古代農業經濟之發展，確實首推黃河流域，故夏殷周的封建都城，多建築於這一個流域的附近。當時人民既藉天然力的灌溉，而發展農業；那末必然發生很大的集團，出來料理河工，如築堤修閘等。但是擔任這種工作的人，又非普通的農民所能濟事；必須有真確的知道洪水的記錄，定期的氾濫，雨水的調節，以及架橋修閘等技術。還要知道天文數學之學，方可擔任這種工作。然而這樣說來，又非分工不可。即一面為專事生產者；另一面為完全脫離生產的領域，而專做技術和學識的修養。此即所謂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開。因而發生勞心者治人和勞力者治於人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形成。統治者既不事生產，則其生活費，必仰給於一般直接生產的勞働者——農

民。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剝削的雛形。

2.再從統治者的系統看：自黃帝至唐虞年代既不易考，而系統也難明。並且夾着了什麼禪讓的問題。至若說到封建制度，自有其封建傳統的思想。所以君王的寶座，一到夏禹就毫不客氣的直接傳授己子。這就是封建傳統的象徵。由前說明，可知封建制度，確已起於夏了。夏到周時，統治者的特權，更因世襲的結果，而越加根深蒂固。同時在周初發生鐵器，生產的工具，又已由銅而鐵質了。鐵較銅更堅，於是生產方面，又放了新異的彩光。生產既有了特別的進步，那末經濟聯繫，也益為廣被。因之各地封藩和中央關係，亦就密切起來了。同時勞働者——農奴——的集團也會漸次擴大。勞働力增加，更為生產增加的源泉。

却是當日農民的生產的目的，完全為着消費。即自己的消費，和領主的贍養費。領主對於農民，一面行使指揮權，監督他們生產，以取得農奴勞力的結果，為其對上納貢稅的<sup>用</sup>，和自己的開支。同時還有力役之征，以加重農民的負擔。這就是封建制的農奴制由來。土地的領主，因有大塊的土地，和大量的勞働者，所以確立莊園制。周代的統一，不過各大小莊園，所形成的邦聯似的國家罷了。因為地理上和歷

史的關係，致使莊園的發展不一律，莊園既有大小的分別，則其實際的統治權，也會難得一致。對畿內大莊園，大概為直接統治之關係，對畿外各莊園，實為間接的關係。至若周之莊園土地的形成，大概有下列三方面的原因：

A. 王畿內的大莊園，其大地的領主，由二方面而來：

一，血族團體的代表，或軍事長官（即軍事貴族），利用世襲自己的特權，而使一般領民——農奴——負擔納貢稅的義務。又因掠奪而把土地移為己有，且占有那土地上的住民，以為農奴。

二，征服敵對的種族，把被征服地移為己有，並隸屬其住民。

B. 畿外的莊園大地的領主，也由二方面而來：

一，王的扈從之有功者，以恩賞而從王得着采邑和封地。

二，被征服者的場合，被征服的酋長或王，在統治的必要上，不奪其特權，并給他們以采邑和封地。或不奪其大地，而使其仍舊維持。

C. 其他莊園的領主：

一，非以征服的結果，實以沒有武力的，向着有武備的

求保護而服其支配；并且將其所有地讓渡於保護主，自己單是一個土地的佔有者，對於保護主，負貢稅及力役的義務。

二，已成的土地所有者，不但有土地，而且得有大批的勞働力——農奴，因而都紛紛開墾荒地而佔為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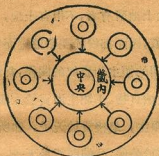
至若各莊園的領主和農奴的關係，為直接的關係，而農奴對於領主，須納貢物。小領主進貢於大領主，而大領主再納貢於較大的領主，最後貢於天子。即所謂庶人貢於卿大夫，而卿大夫貢於公侯，公侯則貢於天子。這是土地所有權與統治權，打成一片的特徵。但周代的交通，還是不便，故各莊園的經濟，為自足經濟的狀態。我們看下列老子所說復古的話，就可以證明當時的經濟狀態：

“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不遠徙；雖有周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當時的莊園既為自足經濟狀態，則各莊園的領主，自兼有直接統治的特權。因而知道周天子之統一，也不過維繫各莊園的外表罷了。其形態即前面所說的邦聯政體似的，對外則用整個的名義，對內還是各自為政，不過發生納稅的關

係，其實際的統治權，爲各莊園的領主。中央政府也僅是名義的統治。再以圖解說明如下：

周之統一的形態



周王對各莊園的領主，爲間接關係，而各莊園的領主，對內爲直接的統治者。外圓的大圈，即周之統一的外表。對於各莊園的領主，不過予以名義上的封號。後世之傳古代封建有萬國，三千國，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實則爲各種的莊園耳。

周征服商以後，對於舊來諸侯，並沒有一律殘滅。左傳十一年：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周公及成王之世大封姬姓：

“兄弟之國，十有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昭廿八年）分以殷之遺民。左傳定四年，襄弘說：

“昔武王克商，成王室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



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而封於少墟。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畸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而封于殷墟。分唐以……懷姓九宗，……而封于夏墟。”

除姬姓之外，尚有很多異姓諸侯。單就魯襄公十一年蕭魚之會……已有“七姓十二國”。七姓者，姬，曹，子，姜，己，姒，任。而臯陶之後的六蓼；崇拜大皞的任，須，句，顓臾，滅盡漢上諸姬的楚；占領周墟的秦，春秋時代不與會盟的燕；斷髮文身的吳越；有的固然分過“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十史，官司彝器，大路少帛，積茂旂旌，”且有一定的禮儀授土授民；有的却只有“各撫其土”的命令。

周之王道  
的真面目

以上係說明周之封建制，大概建築於各種莊園制度上。周王既知道各地莊園制的經濟狀態，爲自足經濟，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指揮領主的農民，和耕種的事情；只好以一封號的名義，加委各莊園的領主，使其對中央負責。但是各地領主，因爲實際上操統治的權，同時有了許多土地和農奴，爲他們生產。所以得

有各自爲政的可能。此時的中央政府，一方因有軍事的開支，和其政務費；另一面因爲各貴族的消費很大，若只靠王畿內的收入——即王畿莊園上的貢稅——不足以供給。故對於畿外各地莊園的領主，不得不予以封號的美名，以圖他們的貢納。若欲貢稅之不發生問題，不得不以一種所謂“王道”的名義，以攫得畿外各莊園的信仰。即以其畿內而言，我們知道王所有的大地，有的用武力征服侵佔來的。如果不設法輟化，那末王畿的內部，也會發生危機。這是周之王道的動機。尤其應該注意的一般捧場的儒家——孔丘派，——替周室鼓吹得很，以籠絡一般民心。試看他們的言論如何？

孔丘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像這一類的恭維話，實在不勝枚舉，總而言之，孔子尊周攘夷，這是事實的。

至若周之所謂王道，實在是名不符實，不過借此名義以號召天下而已。所以他們的伐紂運動，也是用什麼人道主義的美名，與問罪之師。其實他們的本身，是人道主義的罪人，我們試看當日所施行的“仁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所謂“以九職任萬民”，即三農，園圃，虞衡，蕞牧，

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閭民等是。又有所謂“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即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等是。有所謂以九賦斂財賄，即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關市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等是。此外還有所謂力役之征。

第一種勞働即耕種方面，在領主監督之下實行：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甫田之詩）

第二是宮內的勞働。豳風七月之詩說道：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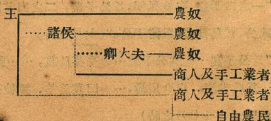
還有什麼狩獵和手工貢納的義務。

“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公，言私其墜，獻豝于公。”（七月之詩）

“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烹葵及菽，……剝棗，……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此兕觥。”（七月之詩）

除上述的農民負擔外，還有如歐洲的封建時代的新婚初夜權(Tus Primas Noctis)的無人道的事情，這同周的封建時代之對領民（即農奴），雖有式樣的不同，或程度的差異，而其對農奴的剝削則一。總之到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完全的變為一個榨取機關，只以上面的政績，完全是農奴奉公守法的寫真。

由是看來，即可證明周之講王道的真面目，僅為利用一種“王道”的名義，以欺騙一班無知識的農奴罷了。中央政府，則利用各地的封侯，以為剝削農奴的工具，而各地的封侯，也得借周天子的名義，及麻醉品似的周禮，以恐嚇一般農奴，而行使其直接統治的權利。此所謂上下交征利的政策，苦了一般農奴而已。再以新生命月刊二卷二號上方岳所著的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上)中的圖表，來證明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



在這表上看出：周之封建制，確實建築于各種莊園上面。莊園的主要生產者，即農奴。至若商人及手工業者，在當日還不算重要。商人僅僅是販賤賣貴，而手工業亦多為農奴的兼職。假使各地莊園的領主沒有大部分的農奴，那末不但對天子沒有納貢力量，即其自己集團的寄生物——公侯，卿大夫，士人等——也就沒生存的餘地。各種莊園，既然失了基本的骨幹——農奴，那末中央政府，也就沒有憑依。結果就是統一的名義，也無存在的根據了。這樣看來，周之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實建築於大集團的農奴身上。

王道之基礎的結論

由上述的看來，王道的基礎實建築於農奴制之上。而杜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論文中，却是偏要說：吾國古代王道的基礎，為奴隸制，他是以歐洲羅馬時代的封建社會，來證實吾國古代的社會制度。他說：

“……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西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與希臘羅馬奴隸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時代。”

但是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環境，和吾國古代的西周的環境是兩樣；希臘的文化發達最早，人民對於都市生活的認識，也較任何地方發展。羅馬也是因希臘的影響，而發生同樣的變遷。故希臘羅馬時代，因為都市生活的發展，結果形成商業的中心，和城市的國家。於是以都市的力量，征服外邊各部落。城裏的主要份子，即為商業貴族。商業貴族，因為發展商業的需要，不得不吸收許多很活動的游民——奴隸——以為其商業上的經營和運輸之用。因為當時交通不發展，警察事業，也沒有發展。所以商人欲到各地去營商，需要許多奴隸擔任運輸，及結隊以防盜之掠奪，同時商業須有商店，每商店裏頭，又需要奴隸為他經理。故商業愈發展，其所需的奴隸也愈多。至若吾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已由前面所說的證明，還是農業經濟自足的生活狀態。農業為固定的，所需要的勞働以農奴為最適合。這是吾國古代封建社會，和歐洲古代希臘羅馬以都市為中心的不同者一。而希臘羅馬因為商業經濟的關係，而人民的思想也較為活動。即以交通而論，也因受了商業資本的洗禮，較吾國古代為發展。所以他們的政治上統一，也有實在的可能性，得以名符其實。至若吾國古代；係以農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限於地理方面的影



響，和生產的固定，故其政治上的統治，名雖爲統一，而實爲分權的政體。這也已由前面說明，用不着申言。此爲中國古代封建政治，與希臘羅馬不同者二。至若說到封建社會之演進方面，中國古代封建制，與希臘羅馬也爲根本上的不同：周由游牧區域，而侵入農業區域。而希臘羅馬乃由商業區域侵入農業區域。故周的游牧貴族所到之地，則開墾農區；或把原來已開墾的熟地，沒爲己有。而希臘羅馬游牧貴族所到之地即開闢商埠，掠奪動產和奴隸。并且周代爲其經濟的固定，故其戰爭的原因，多爲農區而戰；而希臘羅馬經濟較爲流通，故其戰爭爲爭商業區而戰。這又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與希臘羅馬不同的理由。總之希臘羅馬的農業經濟，其衰落較吾國爲早；而吾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希臘羅馬爲遲。在周代的封建制，實以農業爲基礎；與周同時的歐洲希臘羅馬，其封建制已經發生變化；實以商業爲基礎的。雙方的經濟之基礎，既各異，則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政治上的形態，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這樣說來，尤其證明周之王道的基礎，實爲農奴制，故杜先生所說：西周時代爲奴隸制，是很錯誤的。

## 二 春秋戰國以後

春秋戰國商業經濟之發展及社會之變革

由周末到春秋戰國時代，農業方面，因為生產技術的發展，尤為進步。在耕種方面也定很普遍地用鐵器，因為當時已用鐵鑄鼎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可以推知當時的犁器，也已鐵製。再看下面的兩段話，更為證明。

據越絕書云：“當世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又江淹云：“古者以銅為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戰，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

由此看來，當時是用鐵器耕田，已無疑義。生產的技術既用鐵器，則其影響於他方面，也必重大。同時灌溉的方法，也已發展。

新生命月刊二卷第五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下：“春秋以後，中國農業又有一個特徵，這就是灌溉。灌溉從春秋以後，始逐漸推行于各地。史記河渠書載：‘西門豹引漳水灌鄆，以富魏之河內’秦之富，由于鄭國。河渠書載：‘韓……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抵瓠口爲渠，旁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他又說：

“灌溉農耕既須通河渠，所以嚴正明瞭的劃分土地爲獨立莊園，便不可能。這是與歐洲中世農業不同的一點。”

當時灌溉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打破舊日莊園制的一隅生活。另一方面愈促成農業經濟之發展。因爲農業的發展，生產品的增加，則各地供給之有餘者，必輸送供給較少的地方。因而引起交換的發展；由交換的發展，又產生錢幣制的交換。普通說：貨幣交換的發展，不外三個進程。

最初是現物交換的時期，例如：

一匹布 = 一石米，

這是單純的交換的經濟，由此時期進而第二個貨幣交換的時期，在這一期的交換，即爲現物交換的複雜化。如下列二表：

(一)一匹布 =	{	一石米
		一石二斗麥
		一支槍
		二柄斧
		三種陶器

但是交換之發展，還不止此，有剩餘的米，麥，槍，斧，或陶器者，不一定需要布。然而布可換得其牠東西。布就成了米，麥，槍，斧，或陶器等物的交換尺度，於是布就變成交換的貨幣，其形式由(一)圖而變成如下：

$$\begin{array}{l}
 \text{(一) 一石米} \\
 \text{(二) 一石二斗麥} \\
 \text{(二) 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一) 一石米} \\ \text{(二) 一石二斗麥} \\ \text{(二) 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right\} = \text{一匹布}$$

此一匹布成了交換的媒介，這所謂貨幣的交換。然而以布為貨幣的交換，却有兩方面的不便。(一)布為貨幣的尺度，其本身難得耐久，易受腐化。(二)布的本身大而重，如果交換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必感覺許多的不便。於是由貨幣交換的過程，進到錢幣交換的形式。如下圖：

$$\begin{array}{l}
 \text{一匹布}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一匹布}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right\} = \text{錢幣十枚}$$

這是以錢幣為交換的標準。在戰國時代以後以銅鑄幣的事情，必然發展，因為戰國時代的著作的國語周語載有周景王鑄錢時單穆公的貨幣。(紀元前二四年)他說道：

“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賑災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這種貨幣論非戰國時人說不出，恐怕是託古的經濟哲學，而不必是春秋時代實在的議論。然而由此知道春秋戰國以後的錢幣的鑄造，必已發展了。再看新生命月刊四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中)說：

“漢代鑄錢甚多。即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已二百八十億萬餘。’但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鄆江襄梁益用錢……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

由此數節之證明，知道當日爲錢幣的交換，可不成問題了。並且看出當日封建勢力派因爲錢幣交換的發展，影響其本身的動搖；以致曾經下令廢錢，以圖恢復自然經濟的狀態。然而錢幣的交換既發展，更促進商業之擴大。同時高利貸的資本，也已發展。結果商業資本，侵入農業資本，而引起土地買賣的問題。土地成了商品後，則原來守土的農奴，也就隨之而變化。結果一部分的農奴，也同樣的成了商品。韓非子六反篇說：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快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

這是商人致富的結果。再看貨殖傳上說：

“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遂，……三致千金。”  
左傳三十三有：

“鄒商人弦高，出其貨品以紓國難。”

左昭十六有：

“鄒商人與其國君，世有盟世。”

又如太史公的記載：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皂隸，抱關擊柝



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愈貴，夫然故上下遂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禮樂墮，諸侯刻桶丹楹，大夫山節藻梲，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於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再看戰國時代的商人，更出風頭。例如以一個呂不韋之富而擢得卿相之職；以一個牛馬商人的段干木竟能煊耀於魏君。以上所說的，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商人之抬頭。

春秋戰國後  
奴隸經濟的  
發展和政治  
上的變遷

到了春秋戰國以後，商人資本的勢力，更是一天天的發展。以董仲舒上書中說：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制，渝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據董仲舒的這端話，可見當日商業化的大地主，簡直埒于君侯，其土地被剝奪的，則變為奴隸，地主簡直操他們的

生死權，奴隸莫敢誰何！

商業的資本，高利貸的資本，二者和奴隸，此外還有許多的記載，茲再一一錄列於后，以表明奴隸的發展，和商業資本之勢力。

“重手指千，……子貨金錢千貫。”（前漢書貨殖傳）

“白圭……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卓氏富至童八百人”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數千萬。”

文獻通考戶口考關於婢奴數量的記載如下：

“揚可告緡遍天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官奴婢是有罪收沒為奴隸的。私奴婢是買賣而為奴婢的，當時奴婢太多了，所以哀帝時加以如左之限制，詔曰：

“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

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數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再石秦漢之交，大規模的生產是使用奴隸勞働。礦業已

經典起，如蜀卓氏、宛孔氏、邯鄲郭、曹、邴氏，諸多治鐵而致富的人。“與王業埒富。單氏家僮千人。其他富亦僮手指千。”至若關於商業的經營，也係使用奴隸。如白圭的“用事僮僕”，刁間的“豪奴”等是。所以當時的人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傳）

至于大土地的耕種也用奴隸，如任公之“力田蓄”，有家約以約束家人。“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這都使用奴隸的事實，而小土地的耕種，則由自耕農民及佃農。

春秋戰國後奴隸制的盛行，僅僅由上述的事實，已足驚人。還要從家事奴隸的數目看：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史記呂不韋傳）。張良家僮三百人（留侯世家）。

照着上面所舉的事實，可知當時社會制度的中心即為奴隸制。而奴隸制的發生，實因商業資本的發展。由商業經濟的發展，并打破以前限于一隅的莊園經濟。莊園制度的破壞，引起農民的游離農村生活，而集中于都市。同時舊日土地的大領主，也已為商業資本所融化。這就是舊日封建勢力之破壞。

方岳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語說：

“綜結三篇，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但是，便是這商人資本的發展，破壞國內市場，杜絕國外市場，促成大土地私有，於是有財政的掠奪組織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再建起來。”

由他的結論的解釋：也是說明舊日封建制的破壞，是由於春秋戰國後，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由是杜先生却要承認吾國東周以後，是由奴隸制而變為封建的社會，這種和我相反的解釋，實令我百思不解。不過還要預先申明者，我所說：吾國春秋戰國商業資本的勢力，却非歐洲的商業資本勢力；打破了封建的勢力，改為一個商人資本的政府，代理其統治權。中國春秋戰國後，商人資本雖有相當的發展，商人階級的地位，雖然也不差；然而終不如歐洲的商人，一樣的造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個見解與方岳氏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論，也是不約而同的。他說：

“……又向於商業資本及地租與租稅而競爭，構成封建軍事國家統一割據循環無端的歷史。若認定中國社會

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張。其實我們所覺的爲封建制度者，或是財政掠奪組織，或是前資本主義所保留之構成封建制度的個個條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隸的佃農，現物地租等等。反之，因爲中國早有商人資本，遂認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錯誤的。”

但是當日封建勢力雖經破壞，然新興的貴族，又把持政權。而新興的貴族，却以一班士人階級爲柱心。一般士人階級，因爲知識和才能的優越，得以彈冠相慶，被任於朝。及在朝握得政權後，那就一方利用新興的貴族的名義，以號召天下；也等於昔日莊園制度的領主，借天子的名義，以控制其領土上的農奴。同時一般士人，又利用那班在社會操縱經濟權的商人，以爲他們的後盾，而得把持朝政。至于商人階級的抬頭，不過盡了腐化封建的能事。換句話說：只是擾亂了封建社會的秩序；實際上却沒有力量掌握政權，改組一個商人政府，代理舊日封建的地位。這又是和歐洲封建社會變遷的不同。中國社會，自舊日封建勢力破壞後，因爲有這一班士大夫的身分階級，造成官僚的政府。以致弄得中國歷來的政體，瑕瑜互見。既沒有完全消滅封建的勢力，也沒有完全造成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政府。只是士大夫階級，

操縱于舊勢力——封建——和新興的勢力——資本商人——之間。對於雙方，都表示好感，以致後來還是一個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勢力，混合并存的社會。士人的官僚政府，簡直是這兩個新舊勢力——封建思想的，資本階級的——的紐扣。假使沒有這班兩頭蛇似的份子，介乎其間，那末不是封建勢力，消滅新興資本家的勢力；便是新興的勢力，完全消滅舊日的封建勢力，并代理其統治的地位。這是說明中國社會的特徵，商人資本的新勢力，雖經猛進，而實際上封建勢力，猶沒有完全消失殆盡。

春秋戰國後霸道的基礎

由上面說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勢力，雖沒有完全剷除；却此時的封建勢力，已變其原形。同時新興的商業資本家之勢力，縱然說還沒有完全成熟，而其潛勢力，實能影響於政府。假使沒有商業的力量，政府也會發生動搖，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照着這樣說來，春秋戰國後政府之對商人資本勢力，也猶如周之統一時，中央政府之依賴各地領主。因為此時商人資本，已能使土地買賣，有錢不但有土地，并得有奴隸——農奴化身的。以前統治權與土地所有權，打成一片；到此時商業經濟權，和土地經濟權，漸次融合。以



前政府的收入，多為農業，此時政府的收入，則以商業經濟為最（因為農業經濟即商業經濟的特化）。由是可說：昔日政府的基礎，為莊園的農業；而此時政府的基礎——春秋戰國後的政府——為商業。但是前面已經說明，昔日莊園制的基礎，又是建築于農奴制之上。然則此時商業資本的基礎，又築於誰的身上呢？換言之，商人資本何以能如是發展呢？這一個問題，前面已經舉了很多的事實，很容易答復的。茲根據以前的事實，再略加解釋。

莊園制度破壞後，由土地的買賣，而引起農奴生活的恐慌。結果一部分的農奴，限于生活之不固定，只好游離農村的勞働，而集中於都市。同時一般資本商人，一方面收買土地之後，鑒於農奴制之不利，改用佃戶制；另一方面因為商業運輸的需要，於是採用奴隸制。同時集中於都市的農奴，為了生活問題，也恰好遇到了供求適合的機會，變為商人的奴隸，這是商業資本奴隸制的成立。奴隸制發生後，奴隸的工作時間，既可由主人自由增加，復不要什麼工資的報酬；而且對於奴隸的飼養費，也可任意節省，這樣一來，商人資本，安得不日增月勝呢！一班商人既大家發現這個搖錢樹，又怎麼不相率效尤呢！這就是上述奴隸制盛行的由來。

都市奴隸的需要愈多，而農村原有的勞働者愈減。同時奴隸的大集團愈發展，結果更促進商業之發展。商業資本愈發展，則商人向外謀銷路的慾望，也更發展。並且因為本國商品之多，致有農產品的減少，於是爲了救濟糧食的恐慌，迫不得已行其對外侵略的政策。在這時候中國的社會由商業區侵入農業。也就是中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古代羅馬時代遲遲的證明。當日之官僚政府，爲了本身利益起見，不得不適合商人階級的心理，向外行武力的侵略。這種商業資本的勢力，侵佔農業經濟區的政策，即爲霸道的本質。由霸道而引起國與國的戰爭，或民族與民族間的血戰。故當時周初所封之國五十，到春秋就只有二十餘國；及戰國時僅僅七國。而七國之最雄者，以商業最發展的秦國，結果吞併六國，而成最大的霸業。國與國之間，固然講霸道，同時本國之政府，對於人民也是行使霸道。并且人民中之有經濟勢力者——商人資本，和商品化的土地資本——也對於無產階級的奴隸，更以霸道壓迫他們。然則春秋戰國後的霸道的起點，固屬於奴隸制之發展；而霸道的歸宿點，也是奴隸制。因爲無論國和國之霸道，或國家政府對人民之霸道，翻來覆去，結果終於集中于奴隸的身上。我所以說：霸道的基礎，爲

奴隸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釋的農奴制呵。

### 三 農奴制和奴隸制的比較

總結  
論

由前述的一，二兩段說明，可得一個農奴制與奴隸制的比較的結論如下：

周之統一時代的封建社會，和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制剛要破壞的社會，是顯然兩樣。前者為農業經濟自足的狀態，而後者為商業經濟流通的狀態。但在農業經濟——莊園制——的社會，只有農奴制為適合的條件。因為莊園制的生活是固定的，領主對於生產的勞働階級，實為固定的顧主。而顧主欲保持其固定的生活，不得不給勞働者——農奴——以使用權，使其安於土着。同時農奴方面的心理，也因環境的閉塞，其思想和慾望也就有限。只要能夠織而衣，耕而食就罷了；用不着三心兩意的活動，以圖優裕或奢望的滿足。至若商業資本發展的社會，以前莊園制的固定生活，忽然瓦解。於是生產的所有者，和生產的勞働者也就不能固定其生活。商業經濟既屬活動的，則其生產的組織，也不得不因而變化。故此時的商人，因鑒於農奴制之不適合，乃採取奴隸制。同時在奴隸方面說：因為土着性之游離，感受失業

的痛苦，則不得不集中於都市，任一般商人階級之支配。

然而奴隸因受都市生活的陶冶；非若莊園的農奴的馴性之可比。并且天天尾隨主人，東奔西走，所見所聞，又較農奴爲廣；故其思想方面，也是較爲活動。一般資產階級，因恐其反抗，或設計圖逃，於是用一種強迫的壓力，以對待奴隸，使其屈服。這就是霸道之必然性。至若莊園領主對於農奴，因視破他們的心理，所以只要用一種溫情主義的假面具，以輓化一般農奴，就可達到其剝削的目的。這也就是王道之由來。卽就實在的事實而論，而農奴的經濟上的地位，比較奴隸的，實際上也可說是高一籌。熊得山氏著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有一段說：

“但奴隸與農奴，其經濟上的地位亦可略爲分析，奴隸的待遇同牛馬一樣，只是主人的工具，並沒視爲有人格的人，他工作之後，雖亦得着飲食，猶之牛馬雖得芻糧，究不能對自己勞働的成果——農作物有任何與問權，其他身上的桎梏與寢處的牢禁，同牛馬之不自由一般。……至若農奴則較奴隸又高一籌，他雖然忙於領主的貢賦，而在自己的田內所收穫的，他自己仍能自由處理，這就是遠勝於奴隸了。”（二二〇頁）

由這種領主與農奴，和主人與奴隸之比較；可知二者的各方面關係的底細，即推想到王道的基礎為農奴制，而霸道的基礎為奴隸制了。我因為是這樣的結論，所以引起我對於杜先生所著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希望杜先生和讀者諸君的指教！

一九三〇，二，二十四，寫于上海江灣

國立勞働大學。

## 國際關係論

Buell 著 葉啓芳 合譯  
會豫生

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又是外交政策協會的材料搜集部主任，以研究國際政治知名於世。本書為作者研究國際政治之結晶，內分三部：（一）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間之問題，（二）帝國主義的問題，（三）國際爭端之解決。對於國際政治分析最精，立論最確者莫過於此書。不但研究國際政治者，宜人手一編，即一般欲瞭然國際大勢，亦不得不閱讀。譯文近百萬餘言，第一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



## 關於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者的 一些消息

陶希聖說：“豐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戰具，現在誰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所以他打算以後少寫文章，多搜材料。現在他已經去北平擔任北大的教授，北平圖書館是真夠滿



足他這個要求了。

嚴靈峯正準備寫一部中國經濟史，却一樣的忙於打仗，最近正在草一篇對布爾塞維克攻擊的答覆，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批評。

郭沫若現在在日本，專事潛心研究，不作其他活動。他最致力的是古代史乃至史前的部分，所以他說：“我近來很少注意書上的紀載，而專注意於地底的發掘。”

任曙的中國經濟的分析僅僅是其全部著作的序言，這真是洋洋大觀的研究了。“任曙是誰？”這是近來許多人見面必問的。嚴靈峯在他的駁辯的文中認作任卓宣，還有人疑是陳獨秀，其實任曙就是任曙，據說他曾參加過武漢中央農民部，搜集的材料不少，現在北平某大學教書。他和任卓宣同是四川人，也許是因此而誤會的吧？

靈峯寫信來問孫倬章是何許人，他也籍四川，新從四川出來的。他對於這篇文章最後的一部分認為是誤會，本想刪去，而雜誌已印好所以沒有刪。靈峯兄的辯難且待他的聲明出來以後再着筆何如？孫倬章這篇論文已單印成冊，大概本刊發賣的時候，該書也可出版。

朱新繁尚有近代思想的分析一文，是一篇很費力的文

章，可惜因為有些犯時諱的地方不克與讀者在本刊見面。

王亞南的文章印出以後，忽然得他希望暫緩發表的信，因為他自己認為有見解不成熟的地方。不過已經印好，只好請他再來一篇更正的文字吧！

陳邦國的主張，是和王平伯討論一致的。邦國因母喪回籍，以後也許由王平伯繼續寫。

物觀文學史叢稿，馬彥祥寫了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參加，可惜太長不能在本期發表。以後胡秋原打算努力參加這一個工作，也許能比較快一點完成一個輪廓。愚夫婦則正努力於宋代的部分。

——編者——

排後聲明：

據武漢中央農民部秘書陳克文說，從前農民部並未曾有過任曙其人。

# 中國社會史論戰

## 第一輯出版以後

——通信十一則——

編者

通信一 朱新繁

禮錫先生：

惠書收到。弟明晨返京，赴港係託辭；因弟在京有小職務，在滬時間每月僅三分之一耳。

論戰第一輯，弟尚未拜讀，但無論如何，此項刊物，在目前十分需要，故尚有第二輯，弟十分贊成也。唯弟頗慚愧，因第一輯上所發表之拙作，係十個月以前舊作，現在弟之見解

雖無更變，但對舊見解增加不少補充，故讀舊作，汗流不止！爲補救此缺點，故弟極願在第二輯上發表新作，現擬作“再論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論戰對像，除陳獨秀彭述之嚴靈峯外，復有李立三沈澤民及俄人米夫。此外，弟尙擬作“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主要對象，爲批評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因郭氏此作，見解荒謬已極，矛盾百出，而此書銷路頗佳，誠有痛斥之必要也。以上兩稿，數量不多，但在質的方面，當較前作不同矣。擬於十一月十五號前寄奉，未知來得及否？又弟著作名現已改爲其華，新繁舊名，不復再用矣。專此卽祝

大安！

弟亦明

十月廿九夜

亦明先生：

覆示讀悉。先生對於論戰的贊助，殊爲可感！這個論戰，爲着中國歷史材料之蕪雜與浩繁，現代經濟材料之不正確與缺乏，以及中國經濟發展中因各種關係使其不能依循正軌的種種，使牠成爲一個不容易得着正確的結論的問題。我們不但準備出第二輯，也許由二輯三輯乃至於月出一冊亦未可知。我相信，這是一個繁難的問題，而不是一個玄妙的問

題，結論雖是不容易得，但決不會得不着結論。所以我們的論戰希望繼續到得到結論的一天止。得到結論之後，也許轉到更具體更實際方面去。

先生對舊日見解有所增加與補充，乃至於“讀舊作，汗流不止”，這樣為學的精神是可佩服的。很希望早日能讀到新作，我想讀者也一樣熱烈的盼望。十一月十五號以前可以趕得上十二月號的專號。不過總盼望愈早愈好。

對於郭沫若古代社會研究之批評，亦極歡迎。現在正在這個題目下準備文章的有你的論敵嚴靈峯先生。還有與第一輯論戰中陳邦國先生同一意見的王伯平先生的批評文字，據說已託友人轉交，不過尚未收到。

以後著作名當遵改其華。即頌

著安！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三一。

通信二

徐松燾

讀書雜誌編輯先生：

久久渴慕的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今天畢竟到手了。這在目前校中熙熙擾擾抗日既中斷讀書又不能

的環境中，實在不能不算是破涕爲笑的事。對於中國經濟問題之論戰，誠有如王禮錫先生所說：“乃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于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現在我們雖然還只看到論戰的第一輯，但對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確實已向前推進了一步。“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喜，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同時我更完全贊成王禮錫先生的提議：“像這樣嚴重，繁難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我並且準備在同學中立刻發起這種研究的合作組織，現在比較困難的問題還是材料的缺乏，以我個人而論，僅在王禮錫先生篇後所開書目就有三分之二未曾寓目，而且有些簡直無處可買，再則我相信王禮錫先生所開書目中一定還遺漏掉許多重要的書報，就我已看到的來說，今年七月間春耕書局所出版華崗先生編著的“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與九月間新生命書局所出朱其華先生所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兩書都是對中國社會史研究極有價值的著作，尤其是



華崗先生所著之“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洋洋三十萬言，更可說是中國社會史書籍中之第一部巨製，雖然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華崗先生之論斷，有些我就很難同意，但是“中國大革命史”一書材料却異常豐富，而且他也提出很多新的見解，無論如何總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問題時極重要之著作。除此之外，一定還有不少重要的書報我們還不曾看到。我所以說明這番話的意思就是要請求王禮錫先生或他人能夠實際估量到我們讀者研究這一問題的需要並望儘可能幫助我們解決一些困難：

第一，我請求王禮錫在下一期讀書雜誌中做一個比較更詳細的研究中國社會史的書目，例如華崗先生所著“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與朱其華先生所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這一類比較重要的著作都應該搜集進去。

第二，我更請求王禮錫先生能夠把每一種重要書報的中心內容做一個扼要的介紹，並且分門別類較有系統編制一下，這樣對於我們開始研究這一問題的每個成員一定都很有幫助。

爲着發展中國研究中國經濟與社會史的利益，爲着誘發我們青年研究這種重要問題的空氣，我竭誠的希望王禮

錫先生能夠俯允我的要求，盡點精力來實現我的請求。自然依憑一二人的搜集一定不免顧此失彼，因此我更竭誠的請求一切讀書雜誌的讀者先生大家都來幫助解決這一困難，希望編輯先生將我這封短信在下一期讀書雜誌上發表，以引起多數讀者的注意。專此敬頌

撰安！

徐松齋寄自江灣復旦大學

十月二十八日

松齋先生：

來書承指出論戰號禮錫文中所開書目所遺漏的兩部書，殊為感謝。華崗先生所著的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史在前日才由不知誰何寄來，是用中共幹部派的觀點寫的，分訂三冊，洋洋三十萬言，真算目前一部鉅著。朱其華先生所著的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出版時錫適不在上海，後來便已成為禁書，我曾經向新生命書局要過，而新生命書局的朋友們也無存書了。此書我不但沒有看到牠的內容，就連名稱也僅是很模糊的知道，所以沒有列入。以錫之孤陋寡聞，一定還有許多沒有嘗過的“禁樹”。就現在所發現的，除你所列舉的兩部以外，還有革命行動上鄧演達一篇有關係的文章也在論戰第一輯出版以後才讀到。新思潮我也沒有全

份，大概裏面還有許多有關係的文章。論戰第二輯準備補充一個書目，並且準備加上日本人對於中國經濟研究的文章的目錄。關於這個工作，已寫信給日本友人田中忠夫等給我幫忙搜集。並且希望讀者們補助我的見聞不周的缺憾。

你所提出的第二個辦法，也許我可以從第二輯着手寫。除你所提出的兩個辦法以外，將來或者把難得的零篇集印起來，也是“材料困難”的一個補救辦法。 編者

一九三一，一〇，三一。

### 通信三

中國社會史研究組的同志們：

論戰專號發賣不上五天，而對於本組報名的已超過百數，可見中國思想界對於這問題的研究熱，這是如何可喜的一件事啊！

我們準備爲着通信和研究的便利起見，每五百人爲一集團，招滿一集團，即將各項進行的計劃通知。未發出通知以前，組員若有所質疑問難，仍設法於極短的時間內直接答覆，或在本誌發表。

中國社會史研究組通信處謹啓

一九三一，一〇，三一。

### 通信四

希聖吾兄：

自你去北方任教以來，我們便不通音問。我到了一次天津，本想去北平以圖一晤，又以急事折返，致不獲如願。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不知你看到否？爲着各方都給以幫助，所以打得頗爲熱鬧。獨以沒有你的文章爲憾！我們準備在十一月或十二月號出版論戰第二輯，甚盼彼時吾兄能有暇寫一篇文章參加。北平學者所聚，又有豐富的圖書館，想吾兄近必更多寫作也。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三一。

### 通信五

靈峯兄：

賜書讀悉。追擊與進攻決於十二月號論戰第二輯發表。郭沫若批判文亦盼早日惠寄。

弟錫

### 通信六

劉澄宇

禮錫兄：

在報上看見了讀書雜誌第四五期中國社會史論戰專號的廣告，於是馬上去找了一本來看，一天之內連看了好幾篇，這要算是我近來對於許多雜誌稀有的興趣。我想你們之提出這一問題，發刊專號無疑地會得到大多數青年的注意，因為在這飢荒的中國，什麼是中國社會的出路，不能不成爲中國青年最關切的問題。他們也將如我一樣的將這本雜誌於短時期內大體讀完，以冀得出一些研究方法，事實的分析和結論等供他們作比較的研究。

你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一文中提出了研究中國社會史所應注意的三個問題。可說是將關於這門學科的一切問題都包括進去了，這當然不是一個人在一時所能完全解答的，必須要分期的專門的研究。如果讀書雜誌能將這研究的結果常常發表出來，一方面可以刺激中國學術界使其不斷前進，一方面對於中國革命前途之確定方向，都有無上的益處。

在我所看過的幾篇文章中我覺得有兩點意見應當向你和讀者提出。

第一，我們的討論既然是學理的，則一切意氣的謾罵應極力避免，如嚴靈峯君罵人家爲行尸走肉，如劉夢雲君罵人

家給帝國主義或中國買辦做辯護士，都是些主觀意見，毫無科學價值。我承認嚴君或劉君批評他的反對者的地方有些是正確的，但說某人是行尸走肉，某人為買辦或帝國主義辯護，都無絲毫根據。

第二，有些淺薄的，或者自己尚未弄清楚，或沒有成熟的文章，我想請你割愛，以免耗費讀者時間。我所說的是朱伯康君之大文“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實在的說。這篇文章有些地方是人云亦云，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有些地方他自己就陷於矛盾。如他在有一處說：“在內地的鄉村間的經濟，大體上仍然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這樣，顯然的在鄉村中別種經濟是例外了。但下面接着說“這種生產商品化的現象……成為全中國普遍的顯著的現象。……中國的農村生產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見朱君文七至九頁）。我想請朱君等研究成熟和確定以後，再告訴我們，中國農村到底是“自給自足”的經濟還是“生產商品化”的經濟很普遍。例如他在又一處說“金價為什麼漲？銀價為什麼跌？這很簡單，因為外國的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統治着農村經濟的原故。”以後他更說了許多廢話，仍然說不出金貴銀賤之所以然，只有令人看了他的文章作嘔。



外國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商業資本……並不始於一九三〇年，何以銀價從去年起大跌特跌？難道去年中國商業資本脫離了金融資本的統治時，銀價就不跌麼？朱君在全篇文章中除了在“封建剝削關係”一段引用了一些事實外，其餘的各段盡是將一些名詞和觀念搬來搬去，令人看見頭昏。我不知什麼動機促成朱君發表這篇文章，但是我希望以後再不致有人想濫用你的寬大，做一些似通非通的文章，企圖刊登於讀書雜誌，以浪費讀者之時間與精力。

以上二點是我讀了專號以後的感想，未知你以為如何？

專此，敬祝

撰安！

弟劉澄宇

十月廿七日。

澄字兄：

讀書雜誌論戰專號出版不到五天，就已得到你的批評，這使我何等的高興！的確，這專號誠如你所揣測的，牠已有可“得到大多數青年的注意”的傾向，在這出版的短短的時間內，報名參加研究組的，已經很不少了。還希望對這問題有深刻的研究如兄等能予以更多量的幫助，則將在這論戰上更增加無限的光輝。

至於你所提出的兩點意見：一是對作者提出的，避免意氣的謾罵，一是對編者提出的，割棄不成熟的文章。在編者是極願能執行你的意見，只要在編者的眼力見得到時。對作者提出的一點，我想無問題的能得到作者們的同意。

不過所謂“成熟”，在未論定以前，也沒有絕對的標準。各有各的看法，就各有各的成熟。不過至少將自己滿意自己的看法，自己在自己的看法裏面找不出矛盾與破綻，這是起碼的標準。在你的說明裏面，似乎也是指此而言。至於你所舉的例，我得有一點關於朱伯康君的介紹：朱伯康君也是對於這問題很有興趣的人，而且他發表過許多關於這問題的文字，還有不少譯成了日文。這個介紹不是以他的文章譯成過日文來作誇張（專號中有許多在過去從未發表這類文章的人），是說明無論他的成績如何，總是值得注意的一個人。就像得着吾兄對他的非難，就算本誌不虛登此文，如更得着作者或讀者的非難之非難，則更是弟之“寬大”的成績。吾兄以為如何？

至於謾罵，以後真希望作者能夠極力避免。不過到自己“理直”而“氣盛”的時候，也難免說幾句罵人的話。中國近幾年來，每次有所論爭，必免不了謾罵，同時就免不了幾個出來

說公道話的人。很希望論戰的各方，都能尊重你的“公道”。

以後不但多多希望你給我們批評，還希望你多給我們寫文章。

弟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五。

## 通信七 似曾相識者

禮錫先生：

讀了中國社會史的論戰我真高興，這一顆射破寂靜的天空的流星，是如何地值得我們贊慕啊！

在一輯論戰中，裝來了許多戰鬥的火藥，但也有一兩顆不擊而自碎的炸彈，這不能不說是戰術的幼稚和藥力的不穩。意想射別人，却先炸了自己的腦殼。如：

(一)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二)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此外當然還有，不過一時不容盡言。如果先生肯指教的話，以後還要請教。——俠民說先生是誨人不倦的。

在這兩篇論文中，都是以任曙，嚴靈峯先生作箭靶的。我不想替任嚴二先生作辯護，我也無能替人家作辯護。因為嚴君的著作，只在南昌看過動力第一期的一部分，任君的是

幾先生前日才借來。(我寫這篇文，是試驗自己。)

鏡園先生是否認任先生所說的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他以為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資本主義無發展的餘地。所以他要中國的無產階級先去打倒帝國主義，給中國資本主義有健全的發展之機會，然後再來革這些可憐的資產階級的命。他的理由是“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大得多。資產階級不開工廠，可以將資本放在銀行裏生息，或購買公債或作投機生意，……但是中國工人因為失業者增加，找職業甚至要出運動費，於是抵抗力減弱，更容易為資本家摧殘，農民更易受高利貸者的剝削。”我們看了上面一段話，只要略有經濟學常識的人就知道鏡園先生是何等錯誤，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還大得多。這真是鏡園先生用新經濟方法的大發現，我敢問鏡園先生在英美資本主義有最高發展的國家，平民的痛苦就減少了嗎？中國產業落後使工人失業增加，但在產業興盛的國家，就無失業工人嗎？我勸鏡園先生去調查一下歐美失業工人的狀況再來和中國比比看。

鏡園先生的謬解，是不明白馬克斯所說的資本積累的

法則所給與無產階級的痛苦；不明白大工業進步及於工人階級的影響。我勸鏡園先生縱無時間去讀資本論，也得去研究近於馬克斯主義的初步經濟學，才不會鬧笑話。

鏡園先生或許不是專門研究經濟學的人，我們也不能過責。現在且看他的革命主張罷。“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成功後將是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是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這幾句話是多麼迷離。任何一國革命的成功都是要先奪取政權，因為政權在壓迫階級手裏是壓迫被壓迫階級的工具；在被壓迫階級手裏是打倒壓迫階級的武器，所以中國的革命，是要先奪取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權，（有人承認中國產資階級無政權，這真是莫明其妙）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中國革命成功可以促成世界革命潮流的高漲，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的獨裁制之勝利之序幕。”而鏡園先生怎樣呢，他是要工人去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打倒了之後，才是這一階級專政，才是社會革命。換言之，革命應先行世界革命，然後再來革自己的命。讀者諸君，這是不是鏡園先生在替中國資產階級求情。你們去打世界上的強者罷，何苦來欺負本國發

展未健全的資產階級呢！啊，好一個革命的策略，好一個資產階級的辯護者！

再，鏡園先生在評嚴先生著作中，花槍又變更了，他說嚴君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是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帝國主義在把持中國的財政，航業，鐵路，和開發中國以後，一切重要收入和財源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於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投資範圍，變得極其狹隘，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為高利貸，商業資本，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地產投機等等，剝削農民，使中國日趨於貧困化。”注意，中國資產階級是受帝國主義的壓迫，才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這“不得不用”四個字，就是鏡園先生給以中國資產階級莫大的仁慈與恩惠！但是中國果真沒有生產投資地麼？那麼鏡園先生未免太善忘了！鏡園先生是不是說過“如在南京武昌等城市還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的鐵路，中國海關每年進口，為什麼仍以棉紗正頭為大宗呢”。鏡園先生不會否認罷！不，鏡園先生是不會否認的，只是我小子不應將鏡園先生取任先生的話混與評嚴先生的文作為一談，因為這才是批評家的藝術手腕啦。鏡園先生是不會自己找黃土塞自己的嘴



吧的，只怪我小子讀人家的批評文太拘於聯繫的關鍵了。鏡園先生恕罪。

夢雲先生的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一文在理論方面比鏡園先生的較深刻，圓滑，其本質却是一樣的。夢雲先生反對任曙先生說的“經濟性質決定剝削方式”。反之倒是“剝削方式決定經濟性質”。其實，任先生的固然不對，但夢雲先生也未見得是。他倆都是想以機械的唯物論去說明經濟發展與性質，結果，雙方都陷於黑霧裏。以經濟性質去決定剝削方式是不明某一時期內的生產特質為一切社會關係的源動力。以剝削方式來決定經濟性質的却忘記了生產工具的轉變，生產組織的改換，和勞動積累的易形，因此人們謀生的方法亦隨之而變。剝削方式就是資本家在某種生產方法下，善加利用人們謀生的手段去發展他自己的資本。故剝削方式又可以說勞動榨取的特殊形式。

剝削方式只可決定支配和隸屬的關係，不能決定經濟性質。經濟性質，是指整個社會的經濟構造而言，是指社會生產的全程，而不能指為生產者的某種特殊關係。我認為經濟性質要依生產的特質而決定，因為一切經濟的性質，都只

是生產特質的反映。剝削方式也同樣是從生產本身生出來的，故說剝削方式是包括在經濟性質內亦未嘗不可。

夢雲先生和任君因方法的錯誤，就得兩種不同的結果。任君以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社會，可以實行推翻國內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夢雲先生則以中國是封建剝削方式而武斷中國還是受封建勢力支配的社會，應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我們不啻二者之中的是非，主要的還是去探討中國的經濟性質罷。

中國是產業落後的國家，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的高壓下生長，因此發展不平衡。依城市工業的生產性質而言，誰也不能否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但農村的生產關係並未變動，不過城市資本侵入，使生產物日漸商品化，促成封建勢力的衰潰與破滅，決不會使封建勢力更加長厚。中國的農村雖有很厚的封建勢力，却在逐日衰殘下去。故中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佔優勢。

但是夢雲先生怎樣說呢，他說：“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關係，（注意：中國資本主義企業及關係，是帝國主義創造的麼？你否認中國資本主義有自動的向上發展性麼？）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

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爲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爲它的附庸。爲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盡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夢雲先生以爲這幾句話足以致任君口塞，其實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帝國主義創造的，而是連別國的資本家一樣，從排擠中獨立掙扎出來的。帝國主義者雖不願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但中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因人不願而停滯其發展。帝國主義盡力去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正是中國資本主義已在單獨發展的證明。夢雲先生以爲帝國主義者阻礙中國資本的發展使中國經濟開倒車駛進封建時代中去，這才是不懂世故。我們知道帝國主義不但是和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衝突，就帝國主義者與帝國主義者之間也是衝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這衝突驟烈。但各帝國主義者還是不住地向前進展，一直到不能進展爲止。那麼夢雲先生怎可說中國的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的摧殘而不能發展呢？帝國主義固然不會有意地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也不能使中國的資本主義不發展。

夢雲先生也承認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破壞農村經濟——即自供自給的封建勢力支配下的經濟——所以夢雲先

生也說：“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當然使商品經濟在中國農村中爭得了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商品（不但工業品而且也包括農產品）輸入中國農村，中國農產品以及原料輸出外國，自然會使中國農民出賣自己的農產品而購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商品。”不錯，中國農村經濟不能避免帝國主義商品經濟的侵入，不能不使封建形式的農村經濟破壞。但夢雲先生對於這種被商品資本侵入後的農村經濟的分化却認為加強封建式的剝削，使封建關係增固。他接着又寫“但這種發展祇是加緊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剝削，造成大批的破產失業與空前的大飢荒，正因為生產力的不發展，所以數千百萬破產失業的農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萬餓死，數千百里的沃野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正因為生產力不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去當兵，當匪，以至當人家的牛馬。同時正因為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生產力不能發展，所以中國的有些民族資本家不能改弦易轍，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對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就是農民分化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富農階層，因為他們的剩餘資本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也樂於購買土地變成半地主與小地主。”看啊，我們的批評家一連幾個生產力不發

展，確定了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並說明中國農村資本經濟不得發展。所以帝國主義者是維持中國的封建剝削。

夢雲先生以爲生產力不發展，不能使農村生產增加速率使生產物過剩，所以使農民失業，使農村資本主義不能發展。但我覺得生產力愈發展，則排擠勞動力愈大使失業者愈多。中國農村失業者之多決不是因生產力不發達，而是因舊生產之失敗與貨幣關係之發展。正爲這樣使中國農村經濟逐漸向資本主義形式轉移，因爲失業衆多使勞動生產力集中，以破去封建社會的單獨靜止的狀態，作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故中國的農村資本主義經濟在發展中，正如夢雲先生自己說的，中國民族資本家把資本投到土地中去。

夢雲先生又以爲中國的富農仍可變做半地主或小地主，這根本就反對自己所說的高利貸剝削使農民破產這幾句話。富農是舊生產的殘餘，正如恩格斯所說賦稅，荒年，遺產的分割會把他陷入高利貸的口裏去。大資本併吞小資本這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夢雲先生敢說中國農村中沒有地主併吞小農的現象嗎？既有這樣的現象，那麼土地就會漸漸集中於少數人手裏日漸向資本主義的道上發展，封建關係日漸衰潰了。因爲夢雲先生是不信死數的人，所以我只敢作活

的解釋，不敢引用數字了。望夢雲先生不要說我沒有論證。

農村的破產，是因受商業資本的影響使生產者與手工業分離，使大半的農民全隸屬與土地，供地主的剝削。所以地主商人加緊農村的剝削，實是農村破產後之結果，而不是使農村破產失業之主因。正爲如此，中國農村資本主義漸漸抬頭，破壞舊的剝削方式。我不否認夢雲先生說的中國農村還是保持着封建形式的剝削，不過我不相信在舊的剝削方式下沒有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形式與新的剝削方式產生。歐洲的農村資本主義化據馬克斯說是自十六世紀正式開始，於十四世紀就有萌芽。夢雲先生何以說中國農村是行封建剝削方式，便是封建經濟性質，就武斷資本主義不得發展呢？中國的社會是不是要停滯於封建剝削，與封建關係裏？二十世紀的中國，何以不如十四，十五，十六世紀的西歐呢？中國的歷史是不是在開倒車？這才好笑哩。

夢雲先生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第一，必須在法律上‘自由的’（？）；第二，必須對於一切生產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說他必須沒有任何生產工具；（這句子是要人作旁解）第三，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是拿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中國的佃農呢？第一在法



律上沒有任何‘自由’，就是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們還有一些原始的生產的生產工具，他們就拿這原始的生產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第三，他們把佃租交納出去之後所剩下的經常的不夠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經常的利用高利貸度日。”啊，這一段寫得多漂亮，使你相信被資產階級剝削的無產階級工人過天仙般的“自由”日子。

工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嗎？鬼才曉得那自由是什麼。夢雲先生是否認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不能拿中國的工人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你去看“真正”的資本主義的英國工人是被恩格斯如何描寫着。工資是拿恢復工人勞動的最低生活費來決定？但你忘記了工人也有家庭負擔，你忘記了鬧飢荒餓死的首先就是工人，也許我們的理論家還在做夢罷！

佃農在法律上固沒有自由，但生產工具到是自由的（我真不解自由二字在夢雲先生筆下有許多曲折的意義）。佃租的意義，雖不能像嚴先生那種解釋，但地主把佃租看作購買工地資本應有的利息却還不錯。（注意，嚴先生是說利息，不是是利潤。）因為這些蠢如豬凶似狗的地主，是不能了解地租在經濟學上是什麼意義。至於佃租剝削了農人的工

資那要看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而不是經常的。農人所以會陷入高利貸的虎口，這是商人的剝削，即被商業資本主義的摧殘。故農民於收穫之時不得不以農作物拍賣以換取日常生活之所需，到了年關緊迫負欠累累的時候，就不得不忍受最苛酷的條件向商人或地主借貸了。佃農以農作物交租之餘就是所得的工資。但這些工資却又被商人騙去，被高利貸的利息榨去。決不是被地主的佃租吸去。我不承認商人的利潤是從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裏分出來的，商人的利潤是用狡猾的手段向農民榨去的。（商人榨取農民的利潤有超過商品販賣的買格20%至50%）因此使農村生活程度提高，但農產物反降低，使農民日趨窮苦，做人牛馬。

夢雲先生罵嚴先生的理論是空洞不合事實的。嚴先生是說中國的軍閥是封建制度的殘遺，受帝國主義的利用；做帝國主義的工具，一方又為資產階級利用圖謀資產階級的利益發展。但夢雲先生自己也說軍閥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自己也說軍閥是依靠帝國主義，幫帝國主義的忙。軍閥既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那麼他不幫資產階級利益的發展，又怎能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呢？夢雲先生才是合實際事實的理論家呀！

其實軍閥自身只是一種附屬品，牠是要依靠帝國主義的接濟以延其命。牠自身既沒有經濟根據，當然不能代表任何階級的利益。依夢雲先生等說帝國主義者是要阻止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軍閥也當然要和帝國主義者取一致的行動，幫助帝國主義行封建剝削，維持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但夢雲先生忽而說軍閥是依靠封建剝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忽而又說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忽而又說軍閥混戰是破壞資產階級民族工業的發展。真弄得人家莫明其妙，不知夢雲先生腦裏的軍閥到底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東西，也許可以說是過度時期中的舊封建勢力，國際帝國主義者，新興資產階級的混血兒罷！

現在我們再來看“合實際的理論”罷。“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佔着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經濟恐慌，所以這分化一方面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為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這簡直不明白社會經濟性質轉變時期中要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過渡時期，不明白這新舊相交的過渡時期中經濟特質。我前面

說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單獨的發展。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佔優勢而封建經濟日漸衰殘。形式論者却得其反，他們是握着歷史的尾巴而硬說是時代的中心。馬克斯，列寧之信徒正沈淪若此！

農村經濟恐慌，是資本主義經濟破壞農村封建經濟的象徵，地主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農民的剝削，是農村經濟日漸向資本主義趨移的象徵。夢雲先生怎得否認中國資本主義不能單獨的發展，中國農村經濟要停滯於封建勢力下?!原來形式論者只知道形式的遷移，而不研究量的緩變的趨向，故他們以為農村要有電氣，機器生產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而不明白在生產關係未起變化時，生產性質與生產量也會起變化。所以他們就一口咬定中國現在還是封建經濟佔優勢，而否認資本主義經濟有發展可能。

此外還有關於革命性質的討論，小子不敢與言，我不是屬於任何黨派之內，不應參於這種問題的討論。不過我覺得中國的無產階級羣衆作實際的鬥爭今已數年，而我們的理論家還在爭論革命的性質，這也許是行易知難罷！

最後，我希望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努力培植中國無產階級理論之成長，不要互相摧殘這成長的幼芽。更希望馬克斯

主義的學者，要做忠實的學者，不要做咬腰的批評家！禮錫先生你以為是麼？有見教請約面談，我是要先生指導。

晨安

“似曾相識者”

一九三一，十一，五。

“似曾相識者”先生：

從俠民處知道你是一位刻苦好學的青年，三個人擠着住在一個六塊錢一月的小亭子間裏，自己用火油爐燒飯；可想見滿房油煙氣味迷漫中埋頭讀書寫文章的精神！

你的來信，趕着在這裏給你披露，至於主張的是非，我不願贊一詞，讓作者直接答覆。

不過我願贊成澄字兄的意見，在可能範圍內，總以避免說意氣話為是。像你說“我勸鏡園先生縱無時間去讀資本論云云”，像我所知道的，鏡園先生對資本論是讀得很熟的。這點意見希望你能接受。

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六。

## 通信八

王宜昌先生：

據來函知道先生是讀書雜誌的一個讀者，本誌能得到

像先生一樣的讀者的幫助，牠的成長一定是能意外的飛躍。

在我個人雖然不贊同先生的“封建制度自五胡十六國起”的觀察，但自南北朝起劃一個時期是我素來所堅持的，並且特別着重於“資本主義列強，滿族，蒙古族，金，遼，突厥，五胡等”幾個異族的外力之侵入，也與我的意見不謀而合。至於在方法論上見解的卓越，尤為可佩！

甚盼在第二輯中能刊出你的更詳細的論文。通訊處亦盼示知，以便將稿費奉寄。

禮錫

一九三一，十一，六。

## 通信九 秋原

禮錫  
品清 兩兄：

看到讀書雜誌社會史論戰專號第一輯，那宏大的篇幅，五光十色的議論，以及許多派別的人物公開地拿着 Maxism 作這意義深長百倍于前此一切論戰的論爭，在中國雜誌史上真是空前的破天荒的壯舉。

昨夜別後匆匆跑到冷寂的夜的滬寧車站，車還未開之前，在冷夜與暗燈之下，兩點鐘的工夫，一口氣將論戰專號看完了。關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我們時常零碎地談過不少



了。好久本來預備作篇文章，整理一個系統的意見，然而一來因為行色匆匆，沒有埋頭查書的閑暇；其次因為見解尚有不充分的地方，未敢以不成熟之見發表。但看了這一期的內容，覺得有幾句話似乎一吐為快。

這一期中，一半的文章是“立”(主張)，一半文章是“破”(批評)。大概說來，破的文章是勝于立的。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劉夢雲劉鏡園及陳邦國三君的文章。因為有大部分意見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許多有價值的暗示之故。此外周紹濠與鄧靈峯的文章，亦有可取之處。

至于在那裏立論的諸公，實在有許多難于恭維的。他們因為要立，遂開口說這個武斷，那個機械，那個沒有政治經濟常識，皆儼然以十足辯證法唯物論者自居，而其實誰也不免自己所笑罵的“武斷”，“機械”和無常識。

掛羊頭賣狗肉的朱新繁君，罵旁人是機會主義，而他自己在是機會主義者之一。在他取陶希聖之處，也有很對的，然而他既懂封建制度之本質，同時僅知商業資本為流通的活動，而忘記促進商業資本活躍發展的一個基礎——手工工場制度(Manufacture System)之存在的事實，只知道

生存活剝幹部派之理論而莫明其所以然。自然受不住聰明的嚴靈峯君之一槍了。

孫倬章君的文章活現八股秀才覺悟追趕新潮的辛艱。他自己想一手打右的幹部派，一手打左的托洛斯基派，自命不凡，口口聲聲罵旁人是機械論；其實，孫先生甚至于連唯物辯證法與唯物史觀的區別都不懂；政治經濟的修養過于缺乏，只能抄幾句笨書。他這篇文章雖是兩反，其實是將幹部派理論與托派以及任曙理論“機械底地”湊合起來的一個雜種意見。結局無非是一句老生常談：中國有資本主義經濟，也有封建經濟而已。他說他這文章“讀者見了一定首尾不貫，莫明其妙”，這真是事實。弟因稍解其文之構成，遂得稍明其妙。尤其好玩的，他不懂歐洲資本主義社會起于何時，只根據馬克斯氏“資產階級掌握權力，不過百年”的證，遂推論歐洲資本主義社會之成立即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百年。這是如何可憐的老實！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成立之期，遠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前。就是警察禁止街上的人發笑，恐怕要聽見孫君的馬克斯主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要笑得牙齒落下來而警察都禁不住。孫君的勤勉，是可敬的；然其亂抄書本的銜學，是頗能使人失去尊敬之心。尤其是拾那不通的

任曙之唾餘而認為正確，更有失孫君真正陸稿荐的馬克思主義之尊嚴。

死抄中國年鑑而加上胡說的任曙君的大作，其不通已經劉夢雲君詳細地指出了；還有一點可笑的就是他的“比較”。什麼帆船錢莊土絲驛站代表封建經濟，輪船銀行廠絲郵局代表資本主義經濟，這樣比較其勢力之優越，而斷定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是否完全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就暫時放下，這樣的觀點也完全是笑談。他根本不懂輪船銀行之最大操縱勢力是帝國主義，而銀行與錢莊，輪船與帆船在中國有不可分離的關係。倘若，在雲南一個僻鎮有一個郵務分局，那地方也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了。有這樣的事麼？至于那種帆船錢莊驛站生絲代表封建經濟的主張，就根本荒謬。這謬論，只足以騙住老實的孫倬章君，以及神州國光社的小伙計。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比任曙君更其機械的活機械！

熊得山君的農民問題史的前部，依然是用他那一套的說書態度的講述，根本說不上什麼對與不對。

陶希聖主義（姑以此名之）之祖述者朱伯康君的文章又是一個新的“機械結合”。他在讀書雜誌第二期上的一篇文章

章，完全是陶希聖主義之重述，但在這篇文章中，陶希聖主義“與伏赫變”了一下，前面依然是他們的舊調，後面忽然接上一個現在無產政黨幹部派的新結論。這個結論實在比現在所有的結論比較高明一點，不過其前提與結論完全是硬紮起來的。然而，朱伯康君有這新的認識，無疑是可喜的。

王宣昌君的主張，是個新的主張。即是在研究程序上主張倒溯，而認中國封建社會起于五胡十六國，自周至晉完全劃入奴隸社會的範疇。這又是郭沫若主義的一個“與伏赫變”。然而以周漢制度的相類似作漢也是奴隸社會的證明，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周漢類似同樣可以證明周漢同是封建社會。至于以王莽禁止奴婢買賣來證明漢為奴隸社會更欠妥當。如果是一個真正奴隸社會，則在那社會，奴隸制必認為合理制度，例如大哲亞理士多德承認奴隸之必要。到了禁止奴隸買賣，已證明該社會非奴隸制了。其實漢代奴隸買賣我們應認為是貨幣經濟發達，農奴從土地崩潰出來成了一種商品的結果，是隨商業資本發展發生的現象。而且，我們不會因民國法律中禁止買賣人口就斷定中國現在還是奴隸社會罷。尤其不能令我們心服的，是王君無實際的數字資料，全憑主觀的臆測。至于王君錯誤的由來，一定是因為想

將歐洲經濟史的過程來規畫中國社會史的原故，以希臘羅馬的社會類擬周晉，以五胡十六國的事件來類擬歐洲羅馬之滅亡與封建制之形成。然而我預言，將來簽名于王君之發現者，必非少數。

王亞南君之封建制度論缺點在過于對封建制取學院式解釋，而忽視封建制的變型；其次過信理想之井田制為事實，而且信周代果有此制度。至于其中有幾處純然形式底結論，亞南兄自己都承認非正確了。

戴行軺君的文章收集了一些材料，加上常識的見解與好心腸的批評。然而，他的基礎理論完全是陶希聖主義，毫未探出官僚階級之真實基礎（容將來詳論之）。至其文中所作中國社會之分期，根本是笑話，大體同陶，不過將陶所謂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易為“過渡社會”（秦至清）的名稱。然而，過渡社會是什麼東西呢？說不出。而且，所謂過渡，恆指一個短的時期，然而在戴君目光中，中國社會有信史的三千多年的時間，完全在“過渡”中“過渡”了。我只有做戴君的得意腔調：“呀”，“啊呀”！奇妙的過渡史觀“哩”！

以上係弟看完此期後一點意見。這不能算是批評，只是一點隨感。弟既近預備寫一篇中國社會經濟史輪廓以及中

國文藝思想史序說兩短篇，正擬人事稍安，從事于材料之蒐集與整理；同時預備將最近數年來各家對於中國社會史的意見及本期諸人之主張，作一總的批評。何時始能如願，真不可知；不過聽說讀書雜誌不久將有社會史論戰第二輯之刊行，至少必定寫個概念的outline來，與兄等作一商榷也。草草！

衷心禱祝國光社及讀書雜誌偉大的計劃，並祝兄等為真理奮鬥的成功！

弟秋原

火車勞頓之餘于獸城狗窟之對面之客寓。

十一月三日夜。

秋原兄：

很愉快的，在第六期讀書雜誌全部排完的時候，還得着你在火車勞頓之餘很熱心地給論戰專號批評的信。

在論戰專號裏面“破的勝於立的”，我完全同意這個批評。亦惟其如此，這論戰才打得熱鬧，而且這熱鬧才能延長。自然，假使不致於延長，而很快的得到結論，則更是我們所盼望的。

至於各人的論文的不盡如人意，有些是有很顯然的詞



漏，而其論調已經得到社會的注意，所以我們很願意陳列出來給讀者批評。“得着你的非難就算我們披露這篇文章的成績”，這個理由在答澄宇兄的信裏提出過。諒你也贊成。還有一些人是在“學閥”裏沒有幫口的，像孫倬章先生從前在法國和一班朋友發起中國社會民主黨，這個倒臺的黨在中國已經沒有發言的地位，他自對於社會民主黨不滿意而退出以後，就連這倒臺的幫口也沒有了。所以類似這篇文章一樣的勤苦耕耘出來的東西他還有二三十萬言，終於找不着發表的地方。又像王宜昌先生也是大家不曾見過的作者，他的來信署名“一個讀書雜誌的讀者”，而且根據信封上寫信的地址，還不是來自都市，而似乎是從什麼窮鄉僻壤來的。他的“建立”，雖然並不見得怎樣成熟，却並不下於此道中的知名之士，並且不像是沒有經過鍛鍊的思想。想必也是被“幫口”排擠的人物。我們是很願意介紹這樣的人物與社會見面。

中國社會經濟史輪廓及中國文藝思想史序說希望至少有一篇在論戰第二輯發表，要使吾兄所認稱的讀書雜誌的偉大的計劃不僅僅永遠在計劃中，則要在兄等的預約不僅僅永遠是預約。即祝

預約的兌現。

禮錫  
晶清

一九三一，十一，七，

前信寫後，覺得還有幾句話不妨在此順便一提。

不僅中國社會發展史尚在層層的雲霧之中，就是歐洲社會經濟之史底發展，還有許多問題需要更深入的抽發。馬克斯以古代的，亞細亞的，封建的，有產者的生產方法，區分古今東西的經濟基礎。不幸馬克斯和恩格斯沒有給我們以詳細的分析與說明而去世了。後之論經濟史者，即根據古代社會（奴隸制），封建社會（農奴制），有產者社會（工錢奴隸制）三個階段，來劃分歐洲社會之發展。於是埃及巴比倫希伯來希臘羅馬社會，都給以奴隸社會的稱呼。然而，比整個歐洲史還要長的埃及史，借希臘人建國到亞歷山大東征的希臘史都認為是奴隸社會，我們能夠輕輕滿足嗎？著基督教之基礎的考茨基，著古代資本主義的薩爾維約里（Salvioli），著希臘資本主義的丘美涅夫（Tumenev），對於古代猶太希臘羅馬的社會，就不取這樣過于單純的解釋；研究藝術史的霍善斯坦因和佛理采却認埃及希臘的社會，經過歐洲社會同樣的階段，即是希臘社會也經過從奴隸制到封建制，到市民制的階段。自然，佛理采等的解釋，是不能使我們同

意的，至少，他沒有說明社會反覆之根本原因，沒有說明古代希臘市民社會與文藝復興時代市民社會，以及十八世紀歐洲市民社會之不同的姿態。然而另一方面，純粹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有產者社會的過程來劃分各國的社會，也是不夠的。至少，忽略了這個事實：以希臘人寫第一頁的歐洲史，是無數不同經濟生活的民族之發展所造成的一個連續；從希臘的奴隸社會到蠻族侵入後的羅馬帝國封建社會，到以意大利都市為中心的商業資本主義社會到近世布爾喬亞社會，是經過無數不同的經濟生活的民族集團之破壞，複合之過程的。換言之，歐洲社會史不是一個線的發展。我指出這些事實的意思是希望我國社會史的學者諸君對於歐洲經濟史還多下點切實研究。我們即退一步不談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之性質及其特徵的問題，對於歐洲經濟史之發展總要有一個正確而豐富的概念。不然，在這個論戰中不知要浪費多少。例如，在中國社會史論戰之戰上，甚至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商業資本社會之定義性質作用都生出許多不正確的理解的，真不知多少。‘必也正名乎’，我以為這個工作也是基本重要工作之一。因此我希望國光社對於論歐洲社會史的名著，還要多加介紹；不然，徒然根據一兩本講義以

及教科書式的山川均以至石濱知行唯物史觀經濟史經濟史概論，是不夠的。

前些時有兩個初見面的朋友，談起禮錫兄的李長吉評傳及南北朝文學，有些批評。自然，李長吉評傳是一本草創之作，而且因為對象之狹小，是不容易作的一本書，自然還有若干可以商榷補充之處，然而大體的意見，是沒有多大錯誤的。南北朝文學，雖然還沒有完成，然就前半而論，無論就材料來說，就見解而說，都比李長吉評傳好多了，並且比過去講南北朝文學的書，可說都要高明。那位朋友自然也是時下‘封建論’者，以為商業資本在歷史上所演的脚色只是副作用，商業資本的作用，只是在流通過程中，不是在生產過程中，他以為以商業資本之活動來解釋南北朝文學是不對的。中，他根本不能形成一個新的社會之基礎；所這個意見看起來似乎也有道理，其實是錯誤的。我當時只簡單說明三點：

(一)解釋 *ideologie* 之歷史與社會經濟史稍為有點不同，商業資本雖然不能單獨形成一個社會之真實基礎，但無論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以及近世有產者社會上，無疑他的作用是很大，而且與當時生產力發生分解及複合的作用，這雖然不能完全變更社會之基礎，必然引起上層構造之多少

變化；

(二)正是因為商業資本活動在流通過程中；不僅在流通過程中，尤其在消費過程中，與當時文化以莫大的影響。我們知道，在階級社會，文化和藝術大部分是支配階級，消費階級之專用品；而因此，忽視商業資本在流通及消費過程中之作用來理解文藝，是不可能的；

(三)商業資本固然是從奴隸社會到現代布爾喬亞社會所共有的一種經濟形態，然而商業資本最發達的時代，他比較獨立地在社會上演重要腳色的時代，就是手工業最發展的時代。這時代，在歐洲就是文藝復興期。手工業之發展（生產力），造成了商業資本的繁榮（經濟），形成專制主義（Absolutism）之確立（政治）。如果忽視商業資本之作用，我們如何了解文藝復興？那麼，文藝復興的文化是封建文化不成？

佛理采在其名著歐洲文學史概論中，二三兩章就是講商業資本主義及專制主義時代的文學。我相信，這是正確的。如何不明白商業資本在中國半封建社會史上所演的與土地資本分離融合及鬥爭之跡，那只有如某君講戲劇史一樣，開口封建，閉口封建，幾千年文學之發展，成了一個大謎

了。

還有許多話，不如在下次專號中再說了。

秋原又及 12,11,1931。

### 通信十 王宜昌

禮錫先生：

拜讀“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暨尊稿“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於僕智識，增進無量。昨更草就“中國奴隸社會史”一文，擬就正于各中國社會史研究家。茲謹寄上，即請教正。如能登載于讀書雜誌，無任盼禱。

拙稿“中國社會史短論”，蒙採入“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幸何如之！惟不識中國社會史論戰他集，幾時出版。僕擬再草“中國封建社會史”暨“中國資本社會史”——前已草就“中國經濟史緒論”九萬言，擬將此稿分別增訂如上。——投請登載。想先生當能讓僕一地盤，使能用武也。上專，即頌撰安！

王宜昌

十一月十二日

宜昌先生：

正發出一函，詢問你的通信處，已經付排了，忽得賜書



及大稿，喜何可言！“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決於十一月十二兩月再來一合刊。本輯出版政，不但讀者很擁擠，作者也很熱鬧，所以我們決定第二輯也來得快些。理由在希望各方面的戰士都有“用武”的戰場，不僅“打鐵趁熱”已也！

禮錫 1931, 11, 14.

### 通信十一 郭全和

禮錫先生：

我是一個正在努力讀書的青年；雖然自己也有很濃厚的讀書興趣，但是因為沒有人指導研究，只好在黑暗中去摸索了。

先生主編的讀書雜誌，真有惠我們青年不少。所恨此地沒有發售，未免令有些青年向隅，我就是其中的一個。然而我總設法從朋友地方或圖書館內，按期必借來一讀。

讀書雜誌，要算是我個人近幾年來所欽佩而愛讀的雜誌中的一種。這個原因，不消說，是由於其內容和我的脾胃十分相合的緣故。尤其是最近出版的第一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四五合期），更使我十分欣喜和欽佩！我希望以後二輯，三輯，……多多的出版！

我本是學史學的；因為新史學的基礎必須建築在進步的社會科學之上，所以也常常讀些關於社會科學的論著。尤其是愛讀關於中國社會史和中國革命問題的論著。

我在第一輯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拜讀先生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大作，非常欣喜！你對於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見解，曾有正確的糾正；同書內又有陳邦國君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和周紹濬君對於“詩書時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等文作嚴正的批評，使我很喜歡！我在一年前，對於郭氏大著，也曾作過比較嚴正的批評文字，與先生和陳周二君有許多暗同的地方，現在奉上，請先生不吝教的批評和指正！如先生認為有參與“論戰”的資格，請先生在貴刊上轉登一下，作我們同好者的一種參攷。

禮錫先生！此外我在一年前也曾發表些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的一類文章，與人們作論戰；雖然，這些都是短篇的，但在我個人讀書生活上說起來，也有搜集起來作個紀念的必要。近來因為讀書方向稍微有些轉變了，所以關於這類文章，就不大好寫了。現在讀了先生編輯的“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又把舊有的興趣喚起了！這是不能不感謝先生的。

這是第一次冒昧的和先生通訊，不知肯否賜教？此請  
撰安！

郭全和敬上十一月七日。

再：讀書雜誌從第一期起，不知貴社尚全有否？如有  
請示知，即匯洋購買。

全和先生：

賜書及霜劍都收到，尊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容  
拜讀後再作詳細答覆。至於轉載，頗為不便，因為篇幅不夠，  
同時本誌也沒有這個先例，盼原諒！論戰第二輯將有好幾篇  
批評郭著的文章，並且各人的觀點不同，或許可以供你的參  
考。

讀書雜誌第一至第三各期都在三版中，大約十日後就  
可以都有了。先生可以直接向發行所訂閱。

先生若有文章見寄，只要篇幅容許，自然是很歡迎的。

禮錫 1931, 11, 14。

# 神州讀書會驚人創舉

借閱万卷書

不費半文錢

每半年有

一百元讀書獎金之機會

學習日文英文  
以及各種科學  
僅取極低廉之講義費

繳會費三元贈書五元書券五元

繳會費五元贈書十元書券十元

繳會費十五元贈書十五元書券十五元

請參看讀書雜誌第二卷第十期或附郵二分索閱詳章均可

上海·南京 神州國光社 北平·廣州

(新分社：濟南西埠緯二路)

可借貸

一千元至五千元

之  
留學金